

GEORG RATZINGER
MEIN BRUDER, DER PAPST

我的教宗弟弟

喬治·拉辛格◎口述

米歇爾·黑澤曼 Michael Hesse mann ◎編著

鄒麗◎譯 房志榮◎校訂

舉世震驚！教宗本篤十六世請辭退位
他捍衛真理絕不妥協，擇善固執不畏爭議，
有誰比教宗的哥哥喬治·拉辛格更了解他？
最親密的哥哥揭開他真實的生活……



GEORG RATZINGER
MEIN BRUDER, DER PAPST

我的教宗弟弟

喬治·拉辛格◎口述

米歇爾·黑澤曼 Michael Hesemann ◎編著

鄒麗◎譯 房志榮◎校訂

舉世震驚！教宗本篤十六世請辭退位
他捍衛真理絕不妥協，擇善固執不畏爭議，
有誰比教宗的哥哥喬治·拉辛格更了解他？
最親密的哥哥揭開他真實的生活……



Copyright © 2011 by F. A. Herbig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München

Original German title: **Georg Ratzinger. Mein Bruder, der Papst**

Recorded by Michael Hesema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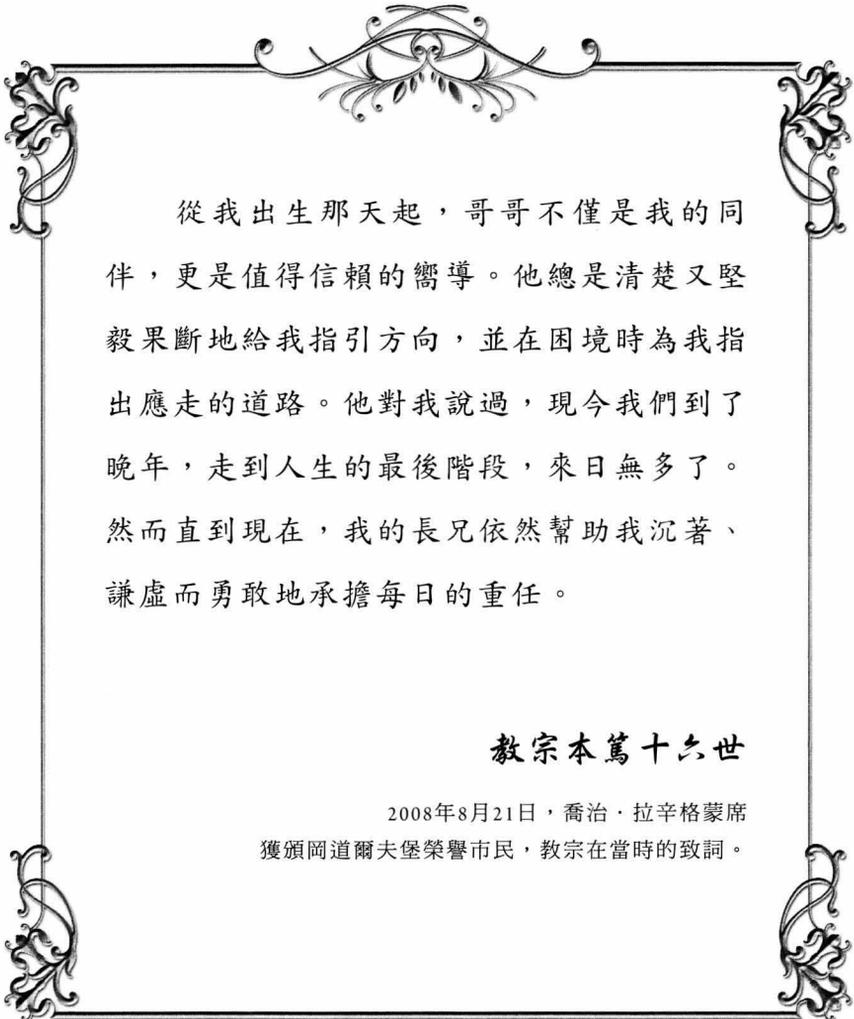
www.herbig.net

Translated by Zou Li

Cover photograph © L'Osservatore Romano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Wisdom Press

Taipei, Taiwan



從我出生那天起，哥哥不僅是我的同伴，更是值得信賴的嚮導。他總是清楚又堅毅果斷地給我指引方向，並在困境時為我指出應走的道路。他對我說過，現今我們到了晚年，走到人生的最後階段，來日無多了。然而直到現在，我的長兄依然幫助我沉著、謙虛而勇敢地承擔每日的重任。

教宗本篤十六世

2008年8月21日，喬治·拉辛格蒙席
獲頒岡道爾夫堡榮譽市民，教宗在當時的致詞。



目 錄

Georg Ratzinger.

Mein Bruder, der Papst

| | |
|--|-----|
| 校訂者序 | 6 |
| 前 言 | 8 |
| <i>Chapter 1</i> 根 | 17 |
| <i>Chapter 2</i> 馬克特爾 (1925-1929年) | 33 |
| <i>Chapter 3</i> 提特摩寧 (1929-1932年) | 53 |
| <i>Chapter 4</i> 阿紹 (1932-1937年) | 71 |
| <i>Chapter 5</i> 特勞斯坦 (1937-1946年) | 91 |
| <i>Chapter 6</i> 弗萊辛與福斯坦瑞 (1946-1951年) | 137 |
| <i>Chapter 7</i> 教授 (1951-1977年) | 183 |
| <i>Chapter 8</i> 樞機 (1977-2005年) | 229 |
| <i>Chapter 9</i> 教宗 (2005年~) | 249 |
| 後 記 晉鐸六十週年 (2011年) | 273 |
| 鳴 謝 | 282 |

校訂者序

教會內有關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書，我參與翻譯和校閱的已有兩本，即《地上的鹽》（房志榮譯，光啟：2005年）和《世界的光》（谷裕譯，聞道：2012年）。現在上智文化事業出版的這本《我的教宗弟弟》，與前兩本書形成一場和諧的三部曲，把拉辛格一家喬治和若瑟兄弟一生的坎坷，如立志修道、勤奮努力、自助天助、忠貞不二等，生龍活虎地描繪出來。

我收到本書的德文原版後，考慮要請誰來翻譯，很快就想到《世界的光》的譯者，北京大學外語學院的德文教授谷裕女士，我們當初合作出版《世界的光》的經驗很愉快。谷教授因忙別的譯作，給我介紹她正在德國求學的學生鄒麗小姐。鄒麗爽快地答應且即刻動工，譯完一章，就電郵給我校閱，三個月左右就完工了。感謝天主，也感謝鄒麗，在她忙碌的讀書生活中，能繳出這樣的成果。

本書除了編著者的前言，和描述拉辛格兩兄弟晉鐸六十週年慶的後記以外，共分成九章：第一章寫拉辛格家庭的根。第二章到第六章都以地名為標題，把一個警官家庭的調動執勤及孩子們的適應能力，生動有趣地寫出來。第七章到第九章則寫若瑟·拉辛格的服務生涯：教授（1951-1977年）、樞機（1977-2005年）、教宗（2005年～）。回顧這三段時期的人類歷史，不難看出他們兄弟

二人，好像站在兩座不同的瞭望台上，觀察整個世界的變局，現在把他們的觀感寫在書裡供讀者參考。

我除了感激鄒麗的譯文，還對她懷有殷切的祝望：步武谷裕老師的後塵，做一個文化人，求真求善，在東西普遍價值交流的路程上，扮演橋樑的角色。在此，引用我在《世界的光》〈校閱者語〉中對譯者谷裕教授寫的一段話，作為鼓勵鄒麗的祝福。

「譯者不僅理解力強，中德文基礎雄厚，並且十分認真地表現其敬業精神，面對真理不遑多讓，不甘妥協。好幾次，我的修訂未能把握原意或全局，她坦誠地回應，也許更好恢復原譯。這種求真心切的態度正是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特徵。國人求好（求善）之心是很普遍的，可惜多次沒有找到『真』。全球的華人多麼需要身為『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穌基督，《世界的光》是一個引介。」

現在這本《我的教宗弟弟》是最適當的補充。

房志榮神父

2013年2月21日，謹誌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前 言

撰寫本書的最初靈感，源自一個非常不尋常的地方——距奧地利帝羅爾省首都因斯布魯克不遠的阿布薩姆（Absam）聖母朝聖地。這座教堂裡恭敬的聖母像與眾不同，和波蘭琴斯托霍瓦的黑聖母像、萊茵河畔科韋拉（Kevelaer）的「憂苦之慰」聖母像，或是古歐洲眾多朝聖地中任何一幅聖母顯奇蹟像相比，這是唯一號稱「非出於人手」的聖像。或許只有墨西哥瓜達露佩的斗篷聖母像能與之相比。這幅聖像的由來至今成謎，科學界無法提出合理解釋。

1797年1月17日，一位名叫羅希娜·布赫（Rosina Bucher）的農家姑娘，坐在父母家中一樓的房間窗前做著針線活，夕陽的餘暉灑落在她身上。就在那一瞬間，正如羅希娜後來在正式紀錄中講述的，她看到一位年輕女士隔著玻璃窗凝視著她。那位女士的面容再也沒有消失，她的影像留印在玻璃窗上。聖母披著頭巾，頭微微偏向一側，雙唇緊閉。她那嚴肅、憂傷但又滿懷希望的目光，觸動每位瞻仰者的內心。看上去，她就像透過天父家中的窗戶，再次深深凝望這個世界。

對教會來說，1797年是舉步維艱的一年。啟蒙運動的寒風，早已無情地吹進帝羅爾最後一座山城。拿破崙的軍隊鼓吹法國大革命的價值觀，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同時

也朝著羅馬和教宗進攻。

因此，阿布薩姆的聖母顯現圖像，從一開始就不斷遭到質疑和拒絕。最初民眾以為這不過是一幅玻璃畫像，多次想把圖像擦掉。然而，聖母像只是暫時消失，玻璃窗乾了以後，馬上又出現更耀眼的圖像。後來有人還想把它磨平、拿強酸腐蝕，也都失敗了。最後，主教團祕書處調查完後，許可把聖像遷移到阿布薩姆的聖彌額爾教堂內。直至今日，這幅聖母像鑲嵌在金碧輝煌的金框裡，供成千上萬的朝聖者瞻仰。

阿布薩姆的聖母有求必應，朝聖者奉獻滿滿感謝聖母的禮品（通常是還願牌），就是最好的證明。很多人特別喜歡在阿布薩姆結婚，帝羅爾各地的情侶，都希望在奇蹟顯現的聖母像面前共結連理。來自巴伐利亞州穆勒巴赫的一對情侶，也不例外。

1885年7月13日，瑪利亞·陶博－派特納（Maria Tauber-Peintner，1855-1930年）與麵包師傅伊西多·李格爾（Isidor Rieger，1860-1912年），也選擇在阿布薩姆結婚。「新娘受過良好的宗教培育。」當時的神父在婚前面談的紀錄上這樣寫著。對一名普通的女傭來說，這實在難得。時隔卅五年後，他們的女兒瑪利亞也站在同一個祭台前舉行婚禮。這樁婚事可說是聖母親自安排撮合的。瑪利亞透過《阿爾多廷聖母福傳報》的徵婚啟事與丈夫結識，阿爾多廷（Altötting）是巴伐利亞地區最知名的聖母朝聖地，

該報則是當地的天主教週報。這則徵婚啟事寫道：

「中級公務員，43歲，單身，天主教徒，家世清白，出身農村。尋找心地善良、純潔的天主教姑娘為妻。女方要擅長烹飪、勤勞能幹、會縫紉。可以在短期內結婚者尤佳。」

這是鄉村警察若瑟·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的第二則徵婚啟事，他希望藉此找到理想的人生伴侶。他的第一次徵婚是在1920年3月，可是沒有下文。第二則徵婚啟事刊登於同年7月，這一次，瑪利亞·派特納¹和他聯繫。兩人一見鍾情，短短四個月後，1920年11月9日，他們就在阿爾多廷的普萊斯克辛（Pleiskirchen）舉行婚禮。

十三個月後，1921年12月7日，他們的長女出生，領洗聖名當然還是瑪利亞。1924年1月15日，長子也在普萊斯克辛出生，取名為喬治。1927年4月16日，次子在阿爾多廷的馬克特爾（Markt）出生，並依父親的名字取名為若瑟。2005年4月19日，天主教會的樞機選舉若瑟·拉辛格為第265位伯多祿宗徒的繼承人；從此，他的教宗名號

1. 1920年的婚姻登記上記錄道：「里姆斯廷（Rimsting）市政府在此提供婚前證明：廚師瑪利亞·派特納，出生於1884年1月8日，為麵包師傅伊西多和瑪利亞·李格爾（本姓派特納）所生之婚生女，居住於本市，未生育子女。瑪利亞跟從母姓而非父姓，是因為無法取得確認父女關係的證明文件；而帝羅爾省曾被義大利占領，也無法取得相關資料。1920年10月3日，里姆斯廷市長簽署。」

是本篤十六世。那年正逢若瑟的外祖父母在阿布薩姆結婚120週年。

就在這位來自巴伐利亞的教宗剛慶祝完就職五週年紀念日，前往杜林瞻仰耶穌殮布的同時，我正好返回德國，順道參觀了阿布薩姆。阿布薩姆是開啟一切的源頭，我希望在這裡探索到自阿德里安六世²後第一位德國籍教宗的祕密。2005年，在他剛當選教宗後不久，我與尤莉亞·特卡喬娃（Yuliya Tkachova）為參加科隆世界青年日的年輕人合寫了一本教宗的傳記*Benedetto!*從那時起，我就對他的人生歷程深感興趣。同時吸引我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能否從他的經歷中隱約看見天主預定的安排。年復一年，我越來越渴望有朝一日能深度採訪自兒時起就與教宗最親密、最信任的長兄喬治。

喬治·拉辛格已經高齡87歲，住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在這座主教城市裡，他簡直就是「活生生的傳奇」。他在擔任「雷根斯堡雲雀合唱團」指揮期間，將這個主教座堂少年合唱團推向了顛峰。因此，若瑟·拉辛格樞機在2005年當選為教宗之前，經常以「知名合唱團指揮的胞弟」來介紹自己。不過，自從教宗選舉祕密會議之後，儘管喬治·拉辛格已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

2. 教宗阿德里安六世（Andrian VI，1522-23年），來自荷蘭的烏特勒支，當時屬於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在阿德里安六世之前，最後一位德國籍的教宗是維克托二世（Viktor II，1055-57年），他原為艾希施塔特（Eichstätt）地區的主教，出身於多爾施坦—希爾施貝格伯爵（Dollstein-Hirschberg）家族。

為「宗座公署書記」³，早有一番卓越成就，但大眾對他的認識卻是「教宗的兄長」。

2010年12月，經由巴伐利亞效忠教宗協會「德國忠於聖座」⁴理事長羅絲維塔·比爾薩科（Roswitha Biersack）的介紹，我在雷根斯堡結識了當時86歲高齡的合唱團前指揮。在談話中，他對於接受長訪並據此出版一本書的主意似乎並不反對。不過在此之前，他得先動膝蓋手術。後來手術順利且術後恢復良好，2011年5月8日，他請我們到他雷根斯堡露岑街的家中做第一次訪談。我們總共做了五次訪談，每次兩個小時。

「現在，我就是您的彼德·席瓦德（Peter Seewald）。」我借用了《世界的光》裡頭的話，作為訪談的開場白，那本書是他的教宗弟弟接受慕尼黑記者席瓦德採訪後出版的訪談錄。我簡直找不到更好的時機來做這次訪談了！那天是復活期第三主日，讀經一誦讀的是伯多祿在五旬節當天，首次在耶路撒冷的講道。而一個星期之前，我和一百五十多萬信友，一同在羅馬參與了教宗本篤十六世為「摯愛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真福大典。5月7日，在訪談的前一天，「德國忠於聖座」協會邀我在慕尼黑奧登廣場的集會上演講。德國的天主教徒興高

3. 1994年，喬治·拉辛格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為宗座公署書記，官方的正確稱謂應為「最可敬的蒙席大人」，義大利文是Monsignore，音譯為「蒙席」。

4. 該協會的詳細介紹請見：www.deutschland-pro-papa.de

采烈地迎接九月教宗的到訪；拉辛格兄弟正籌備兩人一起慶祝「晉鐸六十週年鑽石慶」。六十年前，1951年6月29日，現在的教宗和其胞兄一同宣誓「我準備好了」，義無反顧地走上服事天主的道路。在我看來，這個共同的紀念日，是回顧他們蒙福的聖職生涯最好的時機。

首先簡短說明本書的架構：這是根據喬治·拉辛格蒙席的回憶，為了讓本書更流暢好讀，我不用死板的問答方式敘述。「主教座堂合唱團指揮先生」的回憶（在雷根斯堡，喬治最喜歡大家這樣稱呼他），經過編輯和補充，以明體字呈現；而我所穿插增添的考證說明和提問，則用楷體字區分。

本書的首要任務當然是為我們德國教宗的生平提供重要史料。他的兄長喬治的見證，為他擔任樞機時，在1997至98年間所撰寫的自傳《我的一生》（*Aus meinem Leben: Erinnerungen 1927-1977*）做了重要補充。這部自傳僅僅記載到他於1982年前往羅馬。在本書中，喬治·拉辛格精彩的人生歷程退居次角；不過，安東·祖博（Anton Zuber）在《教宗的兄長——喬治·拉辛格與雷根斯堡雲雀合唱團》這部出色又易讀的傳記作品中，已對他的生平做了翔實的報導。

除此以外，我還想深入探討最初吸引我採訪的問題：從鄉村警察之子到十三億天主教徒的首牧，這難得罕見的「德式成功之路」，應該不是單純偶然的機遇。十分

肯定的是，若瑟·拉辛格從未對教宗寶座孜孜以求；他一生中這個最重大的使命，同他生命中的其他職責一樣，都是天主託付給他的。他在擔任總主教時，以「真理的合作者」（《若望參書》一8）作為牧徽上的座右銘。

深入了解教宗的生平之後，我不禁聯想到阿爾多廷「厄瑪努耳」傳教學校的校訓：「奉獻所有，收穫更多！」若瑟·拉辛格一生中也總是不求回報，傾盡所有無私地付出，結果，他從天主那裡收穫了更多。因此本書能夠鼓勵有志走上司鐸道路（當神父）的年輕人，激勵他們克服種種內在和外在的阻礙，跟隨天主的召叫。這條聖召之路充滿豐厚的恩寵，賜給不求回報、盡心付出的人更多的賞報。

喬治·拉辛格描述教宗早年的成長過程，令我震撼。他描繪出的圖像是：他們的家庭活出信仰，而得以堅強抵禦了那時代的風暴，包括邪惡的納粹政權。現在婚姻失和、家庭破裂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因此，教宗的家庭無疑是我們的最佳榜樣。美國有句耳熟能詳的至理名言：「一同祈禱的家庭，必能凝聚在一起。」只有和好與付出愛的信仰力量，我們才能克服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危機，帶給孩子安全感，向他們傳遞打開美好未來大門的價值觀。

我衷心期望本書能引領更多的家庭發現基督信仰的力量和喜樂，延續與孩子一起祈禱、共同慶祝教會慶節的傳

統。家庭是教會的未來，用教宗的話來說就是：「天主在的地方，就有未來。」這是教宗在2011年9月到德國牧靈訪問時的主題。

我們從教宗的一生，看到這句話實在千真萬確。

米歇爾·黑澤曼（Michael Hesemann）

2011年6月29日寫於羅馬



Chapter 1

根

我們姊弟三人都是在著名的聖母朝聖地阿爾多廷附近出生，但並非在同一個鄉鎮。姊姊瑪利亞（生於1921年12月7日）和我（生於1924年1月15日）出生在普萊斯克辛；弟弟若瑟，即現任教宗（生於1927年4月16日），是在茵河畔的馬克特爾出生。我父親的職業是警察，因此工作地點經常調動，這種情形在當時很稀鬆平常。

我們全家曾數次前往阿爾多廷朝聖。這個聖母朝聖地有座美麗非凡的小教堂，歷史悠久輝煌，可追溯至八世紀加洛林王朝時期。不過，我們去那裡，不是因為阿爾多廷的歷史傳統，而是當地濃厚的信仰氛圍。我們的父親還是聖母會（基督生活團的前身）的成員，這個善會特別敬禮天主之母瑪利亞，當時在阿爾多廷設有分部，因此父親經常帶全家去那裡。

全家到著名的黑色聖母聖地朝聖，是我們童年時最美好的回憶。朝聖者熱心不斷的祈禱，這樣的信仰氛圍吸引了弟弟和我，直到現在對我們的人生仍有深遠影響。在阿爾多廷附近出生長大，對我們的一生，以及培養對聖母的崇敬之心，可說是扮演重要角色。我們都會把煩惱和擔憂交託給聖母——哪怕只是孩提時的小小煩惱，而且總是感受到聖母時時刻刻護佑著我們。

在我們家中，從沒有人提起過父母結婚前的事情，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外公外婆是在阿布薩姆聖母朝聖地結婚的。當我得知他們的婚姻也同樣受到聖母的祝福時，我感



到非常開心。

我母親的家族來自帝羅爾，她的父母都是麵包師傅。父親名叫伊西多·李格爾，他是巴伐利亞施瓦本（Schwaben）地區的人，1860年3月22日出生於威爾登（Welden）小鎮，據說那裡風光旖旎，美不勝收。母親的祖父母在南帝羅爾的布里克森（Brixen，義大利北部，當時屬於奧地利）附近有一座磨坊，卻因里恩茲河氾濫而被沖毀。後來，整個家族就遷居到巴伐利亞。我的外婆對家鄉一直懷念不忘。她在病危時，還時時念著：「只要喝一口家鄉的水，我就會好起來。」她堅信帝羅爾的水和巴伐利亞的水質截然不同。她還認為拿「帝羅爾的一把乾草」餵牛，比巴伐利亞一拖車的乾草營養多了。她深愛著故鄉帝羅爾。⁵

我的母親瑪利亞·拉辛格，本姓派特納，1884年1月8日出生於巴伐利亞東南邊境，羅斯海姆區奧伯勞多夫附近的穆勒巴赫，並在這裡的教堂領洗。這裡也是足球明星史汪斯泰格（Bastian Schweinsteiger）生長的地方。讀小學時，母親就到基姆湖畔的里姆斯廷讀書。母親的父母都是麵包師傅，顧客要求把剛出爐的小麵包和早餐麵包外送到家，因此孩子們每天清晨上學前必須挨家挨戶去送麵包。

母親一共讀了七年書，之後就在不同的地方幫傭做

5. 也許正因如此，雖然她在巴伐利亞的慕朵夫鎮（Mühdorf）住了很長時間，但她仍堅持要在帝羅爾的阿布薩姆舉行婚禮。

工。她的第一任雇主是薩爾茲堡的一位首席小提琴手，名叫秦科。他是捷克人，總是很勤奮地練琴，母親從他那裡接觸到音樂。當時，首席小提琴手的收入很低，他為了維持家計還得時常舉辦加場演奏會，也因此，母親的薪水十分微薄。後來，她到庫夫斯坦的一家麵包店工作，之後，她去了黑森州的哈瑙城，替策希將軍做事。最後，她來到了慕尼黑，那裡的新維特斯巴赫旅館在徵甜點師傅，那正是母親的專長。可以說在遇到父親之前，母親已經有過一些工作經歷。

我們小時候，母親的親切和藹正好與父親的嚴厲互補。她總是笑容滿面，對每個人都很友善。她在洗碗時，常常一邊哼著聖母歌。最值得一提的是，母親是能幹又出色的家庭主婦，她包辦所有家務，是名副其實的萬事通：她會縫紉，會做手工肥皂，還能用最簡單的食材做出美味的菜餚，尤其擅長做可口的甜點，那是我和弟弟最喜歡的美食。她做的巴伐利亞式小饅頭，下面一層厚厚的脆皮，再搭配香草醬，十分美味。我們還特別愛吃她做的蘋果酥卷。賢良的家庭主婦都知道，做道地的蘋果酥卷，要將外皮拉薄到透光，然後放進蘋果片、葡萄乾等內餡。餅皮薄如紙的蘋果酥卷，實在美味極了！再來，不得不提的是母親做的雞蛋煎餅配上Ribisl，也就是黑醋栗。Ribisl是帝羅爾的老叫法，在巴伐利亞很少人知道。最後，令我不能忘懷的還有「皇帝煎餅」，也是非常好吃。

在其他方面，我們日子過得很簡樸，生活節儉，因為一般警察的薪水微薄，禁不起揮霍。為了維持家庭開銷，父親不得不精打細算。即便如此，父母依然非常注重我們的儀表，要給人整潔得體的印象。幸好，母親很勤勞能幹，減少了家庭開支，她在自家的園子種些蔬菜，例如萵苣、高麗菜和胡蘿蔔，所以夏天都不必買菜。母親很愛在菜園裡勞動。當然，她也種植了許多花草，這給她帶來不少樂趣。

母親還勤於編織，舉凡帽子、毛衣、襪子、圍巾、手套，所有我們冬天穿的衣物都是她親手織成的。她只要



教宗的母親瑪利亞·派特納年輕時的照片。

買點毛線就行了，替父親省了不少錢。在當時的鄉下，還不習慣購買成衣。不過，我們倒是有兩種手套款式可以選擇，只分開大拇指的連指手套，或是五指手套。對父親和我們來說，有這樣的母親真是福氣。

我曾見過奶奶和外婆。我的外婆瑪利亞·李格爾－派特納一直住在里姆斯廷，1930年去世。我隨母親探望過她一回。不過，我聽說她常常罵人，不怎麼平易近人。

至於我的奶奶加大利納·拉辛格（本姓Schmid，1851-1937年），我只記得她是戴著黑頭巾的高齡婆婆，很可惜除此之外我對她沒有其他記憶。我只在1931年，她過八十大壽時見過她一面，所有親友歡聚一堂慶祝她的生日。慶生會應該是在多瑙河上游，奧地利的阿爾滕馬克特（Altenmarkt）舉行的。當時的家族照，還收錄在里姆斯廷的前任官員暨地方史學者若望·努斯保穆（Johann Nußbaum）探究我們家族起源的著作中。原始照片收藏在我們的親戚安東·梅瑟爾（Anton Messerer）家中，他住在施瓦內克辛附近的里克利英（Rickering bei Schwanenkirchen），我的父親也是在那裡出生。梅瑟爾的外公是我父親的兄弟。

我父親的叔叔，也就是我的叔公喬治·拉辛格博士，同樣來自里克利英，他是神父兼政治家，一直做到了帝國議會議員。父親常常提到叔公和他的大作《教會貧民救濟史》，這是他的博士論文，這本書是在著名教會史學

者德霖格（Ignaz von Döllinger）的啟發下寫成的。他在書中介紹了教會貧民救濟工作從中世紀到宗教改革的盛衰過程。他還寫了許多本書，例如《政治經濟的道德基礎》，在這本書中，他試著將經濟理論與基督宗教倫理重新結合，並著重在社會問題上。他曾因公開反對雇用童工而獲得讚賞。目前，特里爾的歷史學者高格斯（Karl-Heinz Gorges）博士正在撰寫一部關於他的著作。此外，雷根斯堡研究巴伐利亞史的學者阿珀爾（Tobias Appl）博士，也



慶祝奶奶加大利納·拉辛格八十大壽，拉辛格大家族在里克利英的拉辛格農莊合影：第一排左起坐著的是喬治（7歲），最右邊是若瑟（4歲），站在第二排穿淺色洋裝的是瑪利亞（9歲），同排最右邊那兩位是父母若瑟·拉辛格和瑪利亞·拉辛格。第二排左邊坐著的是當神父的叔叔阿羅伊斯，站在他後面的是叔叔安東。

發表過關於他的文章。2008年，阿珀爾博士在雷根斯堡舉行的研討會上，介紹了我叔公的生平與著作。

喬治·拉辛格博士（1844-99年）是巴伐利亞愛國黨黨員，1875至77年間擔任巴伐利亞州議會眾議院議員，1877至78年出任帝國議會議員。1893至99年，他再次獲選為巴伐利亞州議會議員，原本他是巴伐利亞農民聯盟的成員，自1894年起則成為獨立議員。1898他再度以獨立議員的身分留任帝國議會，直到1899年去世。

拉辛格博士是出了名好論戰的傑出作家。在帝國首相俾斯麥反天主教會而展開文化鬥爭的高峰期，他的著作遭到查禁，還被捕接受調查。拉辛格博士曾擔任過伍茲堡《法蘭克人民報》的主編，他是德國天主教會新聞界的重要先驅。拉辛格是保守派德霖格的弟子，他始終對國家和效忠政府的教會團體抱持懷疑，結果斷送了自己教會史學者的學術生涯。也因此，他開始從政。他自稱是「反日耳曼帝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的神職人員」。他反對普魯士軍國主義日漸增強，他認為軍國主義會將賦稅全壓在勞工和農民肩上，支持大資本的壟斷野心。早在1895年，拉辛格博士很有遠見地看出軍國主義的傾向勢必導致世界大戰。他確信唯有按照天主教會的社會訓導原則來重組國家，才能避免這一厄運。

拉辛格在世之時，他的學說曾遭到各方攻訐。今

天，作為天主教的社會改革家，他的成就無庸置疑，不過，他卻曾以羅伯特·瓦爾德豪森博士和戈特弗里德·伍爾夫博士這兩個匿名寫了兩篇反猶的文章，而使其生涯蒙上陰影。

父親跟我們談起過他，但是並沒有多做評論。我們僅僅知道有這位長輩，也很高興家族中出現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名人。不過，我們決定當神父，並不是受到他的影響。我們家中沒人讀過他的書，而他化名發表對猶太人的看法，我們也是一無所知。

茵河畔馬克特爾的教宗故居（現改為博物館）懸掛著一幅教宗的族譜，據此來看，拉辛格家族應該是世代務農。這族譜可以一路回溯到1600年。那一年，在帕紹（Passau）教區的文獻紀錄中，首次提到有位來自拉辛（Ratzing）的農民，名叫喬治·海辛格（Georg Rätzinger）。實際上，這家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

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場喬治·拉辛格博士的研討會上，歷史學者伍爾斯特（Herbert Wurster）指出，拉辛格家族可以追溯到十世紀末，帕紹教區贊德巴赫（Sandbach）一個叫拉齊（Razi）的人。根據947至970年間的記載，拉齊在帕紹的教堂工作，很可能他在距離贊德巴赫一公里

處建立了拉辛這個小村落。他的後代中有位叫迪特利庫斯·德·海辛格（Dietricus de Rezingen）的官員，弗恩巴赫（Vornbach）修道院1173至1200年的檔案中曾提到他。

1258年，有位亨里希·拉辛格（Hainrich Razinger）出任位於現今帕紹的茵施塔特（Innstadt）地區的地方法院院長，他被稱為「帕紹采邑主教底下能幹的高階官員」。顯然，當時的拉辛格家族比較富裕。在1318年的文獻上提到，茵施塔特有位市民叫奧托·拉辛格（Otto Ratzinger），擁有房產。根據伍爾斯特的推斷，兩位拉辛格的其中一位，在今天上奧地利的弗萊恩貝格（Freinberg）地區建立了第二個拉辛村，並擁有土地和農莊。

1304年，在帕紹主教座堂司鐸諮議會的文件中，首次提到了當地的「海辛」農莊，即後來「弗萊恩貝格下城的海辛格村」。正是在這個拉辛格農莊裡，原擁有房產和土地的拉辛格家族分出務農的分支，並從1600年起一代代不間斷地記錄在族譜中。1801年，拉辛格家族買下了里克利英的一個農莊。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祖父就在這裡出生。

父親同樣來自里克利英這個屬於施瓦內克辛堂區的小村莊。祖父母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名叫安娜，他們在婚前就生下她。接著出生的第二個孩子，就是我們的父親若瑟·拉辛格。父親在青少年時期日子過得並不輕鬆，因為他是家裡的長子，很小就得下田幫忙，做艱苦的粗活。

之後他開始上小學，當時的副本堂羅森貝格神父在學校任教，他對父親的影響深遠，在他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宗教課給學生寶貴又有深度的教導，父親很欣賞他。

還有音樂老師韋伯，他把稚齡的孩子帶到教堂合唱團，教他們演唱七聲部和八聲部的彌撒曲，父親也是其中一員。後來，父親常常跟我們提起，他還是小男孩的時候，就在韋伯老師的帶領下，加入了施瓦內克辛的教堂合唱團。正是從那時起，父親就對教會音樂情有獨鍾。看起來，教會音樂在堂區的信仰生活中舉足輕重。

父親對音樂的熱愛與日俱增。有一天，他買了一把齊特琴，還去上了幾堂音樂課，接下來全靠自學。他有一整盒的樂譜，就和齊特琴一起放在廚櫃上面。到了晚上，他常常把琴拿下來，邊彈邊唱歌給我們聽。我們圍坐在父親身邊，先聽他演奏一首輕快的進行曲，再唱一首當時的流行歌曲，那種氣氛很特別。那時的歌曲都帶點兒多愁善感，現在的人很難體會歌曲的意境，但兒時的我們卻深受感動。父親彈奏齊特琴的時光總是那麼美好，因而推動我走上音樂這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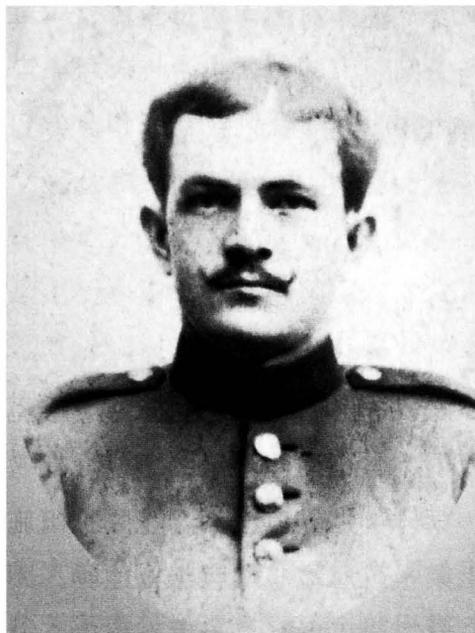
除此之外，父親是個非常嚴厲又講求公平的人。他總是告誡我們哪些事是錯的，但他從不無緣無故訓斥我們，只在我們真正做錯事時，他才會出言責備。儘管父親一向謙虛，對每個人都很和善，卻總令人肅然起敬。他留著當時十分流行的翹八字鬚，衣著筆挺，完美無缺。每逢有特

別活動的時候，母親都會用Sidel牌的清潔劑擦拭父親的鋼盔、佩劍和警察制服的皮帶，全都要擦得閃閃發亮。

父親小學畢業後，就去上假日學校——這是專為得在家幫忙農作、像我父親一樣的畢業生開設的。假日學校是星期天上課，雖然也教授其他課程，不過是以宗教課為主。

1897年10月20日，父親在二十歲那年到帕紹的軍營入伍。父親在軍中的表現，顯然比弟弟和我還要優秀。他當了士官，還曾佩戴特等射手勳章，他是相當傑出的射擊手，因此受到長官推薦而獲頒勳章。父親的軍旅生涯，沒有留下不好的回憶，不像我們。我必須承認，我不愛當兵，弟弟也不喜歡。父親很愛回憶他當兵的時光。他一開始是在帕紹的皇家第十六巴伐利亞步兵團服役兩年，再做三年的儲備兵，最後以士官身分退役。父親常常講他當兵時的故事給我們聽。例如那時有位自視甚高的少尉叫馮·哈齊（von Hazy）。當指揮官點名叫到「哈齊少尉」時，他毫無反應；指揮官再叫一次，「哈齊少尉」，他依然不作回應。第三次，指揮官喊出「馮·哈齊少尉」時，這一回，他馬上大聲應道：「報告上尉，有！」（譯註：馮在德語名字中是貴族的封號。）

軍隊生活結束後，父親返回家鄉。不久後他才得知，家裡的農場不是由他接手，而是給他的弟弟安東繼承。為什麼會如此安排，父親從沒跟我們提起。接下來，他必須決定未來的路該怎麼走。他四處探聽士官出身的背



教宗的父親若瑟·拉辛格，年輕時當警察的照片。

景能找到哪些好的工作機會，而得到的答案是：去鄉村警局，或是鐵路局。於是他前往鄉村警局應徵，而且被錄用了。至於他為什麼這樣選擇，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亞檔案館裡，還保存著若瑟·拉辛格的任職紀錄，這是里姆斯廷的地方史學者若望·努斯保穆在幾年前找到的。檔案上寫著：「拉辛格25歲，天主教徒，單身，身高164公分。」他被分發的第一個單位，是在施豪本豪森附近的下阿姆巴赫。經過幾次調動，六年半後，他在國王湖升職為下士。又過了八年半，1917年，他在科爾博莫升為副警官。再兩年後，他在下諾伊克辛升為

警官，1921年成為所長。在卅五年的警察生涯中，他一共被調動過十四次。

「他的外表看起來瘦高、果斷，還蓄著提早變灰白的鬍子。」努斯保穆採訪認識他的人之後做出這番描述，「他審慎嚴謹，身強體健，謙虛又沉默寡言。這是多瑙河畔和巴伐利亞森林那地區居民的典型性格。」

警察調動頻繁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事，這是為了避免「攀關係、走後門」。我根本數不清他待過的單位。他曾在國王湖和候勒道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因戈爾施塔特服務，當地有許多工業，政府擔心爆發工人運動，因此加強了警力部署。

年輕警察的薪水微薄，他自己大概認為靠這點收入很難養活一個家。他想等賺夠了錢再考慮終身大事，結果一轉眼就43歲了。我們從不知道父親是透過徵婚啟事與母親結識，他沒跟我們提過這件事。

儘管他已經43歲，按照當時的慣例，警察在結婚前必須申報上級核准。在巴伐利亞檔案館裡，努斯保穆找到了拉辛格的申請文件：「本人預定於1920年11月9日與1884年1月8日出生於羅斯海姆區穆勒巴赫的單身女廚師瑪利亞·派特納結婚，敬請惠予同意。」一週後，他就獲得了批准。

接著就是舉行婚禮。我猜想，婚禮應該是在普萊斯克辛舉行的，那也是姊姊和我出生的地方。父親當時住在附近的克里賓區，旁邊是個小湖泊，蛙鳴聲不絕於耳。

直到幾年前，我才在輔理主教弗呂格（Karl Flügel，2004年去世）的陪伴下，回到普萊斯克辛參觀。那地方真是山明水秀，有一座美麗的教堂和建於十一世紀的城堡。

母親住在湖邊那間偏僻的屋子裡，常常感到不安和恐懼。為此，父親養了一隻狗。雖然這隻狗很乖，可是似乎比母親還要膽小。

那個時期動盪不安，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買塊巴掌大的麵包居然要價兩億帝國馬克。當時，父親都是領日薪，不過錢還沒拿到手，就已經一文不值，因為物價又上漲了。後來父親告訴我，1924年我出生時，母親病得很嚴重，差點丟了性命。他說，那時他正在外面執勤，等他回到家，我已經出生躺在搖籃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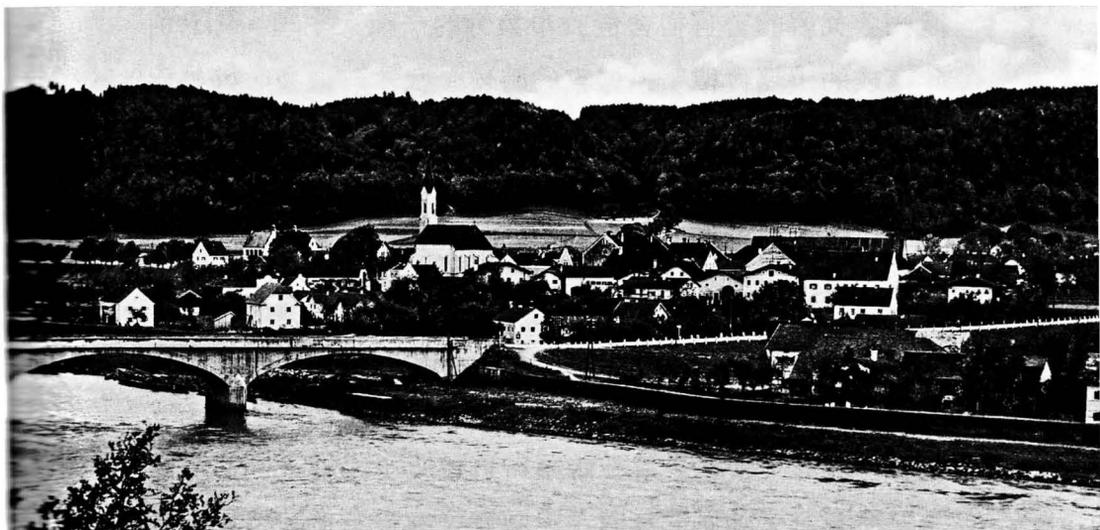
即便如此，我們依然有過美好的時光。母親總是說，孩子還小的時候，那段時光是最美妙的。一年後，1925年5月，父親被調到馬克特爾。我的弟弟就在那裡出生。

「巴伐利亞鄉村警察隊管理處」1925年4月22日的人事調動命令，這份原件也保存在巴伐利亞檔案館裡。根據人事命令，鄉村警隊所長將於5月1日在新單位「執行相同性質的任務，按照預算也將獲得同等的基本待遇」。1927

年11月1日，若瑟·拉辛格警官獲以「巴伐利亞自由州政府的名義」，任命為保安隊長，薪資等級為第六等，基本年薪為2124帝國馬克。拉辛格擔任馬克特爾派出所所長期間，是當地德高望重的人物。儘管如此，那時有許多人作證說，他始終謙虛內斂。「雖然他在馬克特爾服務的時間很短，卻憑藉著富於正義感、樂於助人和待人友善，很快贏得馬克特爾當地居民的敬重。」這是他在1929年調離馬克特爾時《布克豪澤日報》所做的報導。

若瑟·拉辛格當選為教宗後，《南德日報》寫道：馬克特爾簡直處於「天堂和地獄」之間，因為它正好位於阿爾多廷聖母朝聖地和奧地利的布勞瑙中間。1889年4月20日，有個人在布勞瑙出生，他給小若瑟和哥哥喬治的童年蒙上了沉重的陰影，這個人就是希特勒。

如果說天主在歷史中透過記號向我們說話，也許，這也是其中一個記號：馬克特爾距離布勞瑙約三十公里，而真福若望保祿二世的出生地瓦多維采距離奧斯維茲集中營也是三十公里。離瓦多維采二十公里外的Kalwaria Zebrzydowska也有一個聖母朝聖地，所敬禮的是「流淚」天主之母聖像畫。兩任教宗的出生地，正是象徵納粹主義崛起和慘無人道之地；然而他們的出生地，又同時處在戰勝邪惡的聖母的護佑之下。



Chapter 2

馬克特爾

1925-1929年

我最早的童年記憶，是我們一家住在馬克特爾的那段時光。父親的警官宿舍位於市集旁的一棟大宅裡，即1701年落成的「瑪竇樓」。搬家的時候，我才一歲多，姊姊已經四歲了。市中心就是教堂，當時的教堂只有一部分保存下來，納入後來重建的教堂當中。

這座教堂是由一位虔誠的伯爵，來自里歐貝格的貝爾恩加三世（逝世於1296年）所捐贈興建。教堂原本是哥德式，以聖奧斯華（St. Oswald of Northumbria，605-642年）為主保。1701年，由於遭受雷擊而引發火災，教堂和馬克特爾村大都付之一炬。僅僅一年過後，便開始重建教堂。時光荏苒，後來興建的教堂空間已經太小，於是在1853年拆



1930年左右的馬克特爾。



毀重建。1964年又進行第四次擴建，保留了十九世紀的部分建築，包括1857年的新哥德式祭台，融入新教堂中。

我還記得，教堂有一間小祈禱室，實際上是唱詩席。母親常常指著父親在聖詠團裡的身影給我們看。當時的本堂是柯佩爾神父，副本堂是若瑟·施坦格神父，他非常嚴厲，而本堂神父倒很和藹可親。神父的女管家叫奧爾嘉，她養了一隻狗，我常常把家中吃剩的骨頭拿給牠吃。

馬克特爾最叫我喜愛的人，就是鄉公所的祕書安德烈亞斯·艾希納，他曾在我弟弟的出生證明上簽名。他會彈管風琴，負責帶領教堂的聖詠團，還培訓了一支銅管小樂隊。他的個子不高，我們都叫他「小安德烈斯」，但他卻成為我第一個學習的榜樣。矮小的他吹奏的卻是體積最大的銅管樂器——低音號，每當他吹奏時，大家都會說：「看，小安德烈斯拿著他的大樂器！」由於父親也在聖詠團裡唱歌，所以我們一家都跟他很熟。我們幾個孩子當時還太小，不能每週去參加彌撒。不過，有時候父母也會帶我們去。

我們那棟房子裡還住了一個女牙醫，她是巴伐利亞的第一批女牙醫，名叫愛蜜麗·卡爾。單身的她，四處巡迴替人看診。村民都喜歡叫她「姑娘」，她可能是當時村裡唯一擁有新款機車的人。清晨她一發動機車，就會發出巨大的轟隆聲，這讓她在整個村裡很惹人注目。

我的姊姊瑪利亞在馬克特爾開始上小學，學校離我們家不遠。我每天都在等姊姊快點放學，因為早上只有我和母親在家，可是她要忙著做家事，或是外出買東西。姊姊回到家後，我們有時也會拌嘴，但很快又玩在一塊兒了，孩子都是這樣的。

姊姊總是井井有條，東西都會歸位放好，可是我卻有辦法弄得一團亂。我的房間總是亂七八糟，不過我要拿東西時，都知道那東西放在哪裡。姊姊常常幫我收拾房間，把所有的東西整理得井然有序，這時，我反而找不到我要的東西了，然後我們就會吵起來。女生通常愛乾淨整潔，男生卻是懶散隨便，而我也不怕承認，我的確有點邋遢。其實，我和姊姊平常都處得不錯。

姊姊有個同學叫瑪海爾，她在一二年級的時候就病死了，這件事對我們小孩子影響很深。有人說瑪海爾是吃了雪，才會生重病，因此大人不斷警告我們千萬不可以吃雪。這究竟真有事實根據，還是無稽之談，我到現在也沒弄清楚。

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們在馬克特爾的屋子有個閣樓，那裡堆放好多前房客留下的書，這些書勾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我們總愛爬上閣樓去翻書看圖，因為我們都還不識字。我們還在那裡找到了一面鼓，但是父母不准我們玩。後來，我在聖誕節收到了一面鼓，對它深深著迷。每當陽光灑到鼓面上，就會神奇地反射出各式各樣的圖案。

我心想，這裡頭一定藏著特別的東西，於是就戳破了鼓面一探究竟。本來完好的鼓就這樣壞掉了，而我想玩樂器的念頭也落空了。

之後，就是很多報導都提過的1927年4月16日，我弟弟若瑟誕生的日子。那天是聖週六，據說那天很冷，又下著大雪，天氣很糟。我只記得我醒來時，發現身邊沒有人。那時我還沒習慣獨自睡，都是父母和姊姊睡在我旁邊。可是在那個夜裡，更準確地說是在那個凌晨，突然間只有我一個人躺在床上，沒有人像平常那樣來叫我起床。我聽到紛亂的嘈雜聲、「砰」的關門聲、走廊上匆忙的腳步聲，還有人在大聲講話。後來，我終於聽到父親的聲音，於是大喊：「爸爸，我想要下床。」父親卻回答：「不行，你再等一下，我們家今天添了一個男寶寶了！」當時我不懂爸爸在說什麼。

教宗本篤十六世是在凌晨四點十五分出生，接著馬上就在早上八點三十分領洗。由於來不及通知他的代母安娜·拉辛格，就由阿德瑪·羅赫希施修女代替。

那時的復活前夕守夜禮是在聖週六的早上舉行，彌撒流程包括降福洗禮用水和聖洗禮儀，所以若瑟的父母毫不猶豫地決定：「既然孩子在今天出生，何不讓他馬上領洗呢！」這可說是特別的巧合，也是個好預兆。但是，喬治和瑪利亞這兩個孩子得待在家裡，因為外頭下著大雪，

父母擔心他們著涼。孩子的母親也不能去教堂，她剛生產完，身體還很虛弱，禁不起在雪中受凍。

於是，這名新生兒就用剛剛祝聖的聖水，第一個領了洗，聖名取為「若瑟·磊思」（Joseph Aloisius）。從此，有人使用「站在復活節的門前，但是尚未進入」來形容他的整个人生，從一開始就沉浸在逾越奧蹟當中。

小若瑟·磊思領洗的聖洗池很幸運地被保留下來，這個新哥德式的聖洗池是由多瑙河的淺色石灰石打造而成，周邊雕刻著六個天使頭像。1965年教堂在重建時，它被搬到了教堂的庭院裡，1992年，又被移到當地的博物館中。經由當時的考證得知，這是慕尼黑皇家雕塑師安瑟莫·希克林（Anselm Sickinger，1807-73年）的作品。他還參與過興建慕尼黑的凱旋門。若瑟·拉辛格當選為教宗之後，這個聖洗池被「獲准」重新放回教堂中。從那時起，聖洗池就矗立在聖奧斯華教堂新哥德式的祭台前，這祭台也是從舊教堂保留下來的。2006年的復活主日，恰好也是教宗的生日和領洗日，這一天，這個聖洗池重新用來給幾個孩子施洗。

幾天後，我終於見到了嬌嫩又柔弱的弟弟。母親產後身體尚未恢復，父親便請一位修女來協助母親。這位修女負責照顧弟弟，替他洗澡穿衣。那時候最讓我們擔心的是，弟弟每吃就吐。修女試過所有的嬰兒食品，可是弟弟

都不喜歡。後來，她突然想到可以餵他燕麥片，終於他沒再吐出來，而且還很愛吃。這真是救了他一命，因為當時修女已經束手無策了。弟弟從那時起就一直很喜歡吃燕麥片，這一點跟父親很像，而姊姊和我卻不怎麼喜歡。

弟弟小時候經常生病。有一次還得了嚴重的白喉，父親馬上請醫生過來。治療的過程非常痛苦，他疼得哇哇大哭。弟弟生病那天，我們幾個孩子正在種了漂亮草莓的園子裡玩耍。我們的房東，把房子出租給警察當宿舍的納恩哈馬先生，十分和藹可親。他看到我們對草莓垂涎欲滴，便讓我們摘幾個來吃。弟弟挑了一個又大又紅的，可是他根本吞不下去，因為白喉症已經讓他的鼻子和咽喉腫脹發炎了。他那時大概一兩歲，我記不大清楚了。

我們跟房東一家的關係不錯。納恩哈馬太太個性開朗，我還清楚記得她把手插在腰上哈哈大笑的模樣，那笑聲簡直震耳欲聾。她有兩個女兒，母親忙不過來的時候，就會請她的一個女兒來照顧我們。

我們家左斜對面是馬勒斯多夫修女會的小會院。我很尊敬的琵琶修女就住在那裡，她後來當上了院長。修女在村外還有一間房子——聖安東尼之家，幾年前還歸修女會所有，是收容無家可歸兒童的寄宿學校。

有一次，修女告訴父親，她們的菜園時常遭竊。她們有一個很大的菜園，裡面種了修女們和孩童三餐要吃的水果和蔬菜。父親很快就破了案，修院為了感謝父親抓到小

偷，特地送給他一大籃的禮物，裝滿了糖、麵粉及各種食品，母親深受感動。

當時在馬克特爾有間雷賀納百貨行，就在我們家對面，現在那裡變成一間大藥局。將臨節期間，商店的櫥窗會裝飾得很有節慶氣氛，我們三姊弟——姊姊走右邊，我走左邊，還不會走路的小若瑟在中間由我們牽著——常常跑到對面去欣賞櫥窗布置。那兒擺放了小孩子最想要的玩具，四周鋪滿了聖誕樹枝、金色紙片和銀絲彩帶。最吸引小若瑟的是一隻可愛的玩具熊。無論颳風下雨，我們每天都去看那隻小熊。我們都很喜歡它，弟弟更是愛極了，他多麼想把小熊抱在懷裡！有一天，很和善的老闆娘請我們



馬克特爾的雷賀納百貨行，小若瑟在這裡遇見了他的第一隻泰迪熊。



進去店裡，還告訴我們這隻熊叫做泰迪。可是，就在聖誕節的前幾天，我們又去看那隻泰迪熊的時候，它竟然不在櫥窗裡。弟弟馬上嚎啕大哭：「小泰迪熊不見了！」我們安慰他，但是他好傷心，連我們也很難過。然後，我們就失望地回家了。

聖誕節收禮物的時刻終於到了。小若瑟一踏進立著聖誕樹、有過節應景布置的房間，便開心地哈哈大笑。爸媽給我們的禮物已經擺在那裡，若瑟的泰迪熊也靜靜地坐著。耶穌聖嬰送來他最期盼的禮物，這隻泰迪熊給他的童年帶來無盡的歡樂。

我們家一向特別重視聖誕節，從將臨期第一主日起，我們就開始做準備。那時，「天降甘露彌撒」是在清晨六點舉行，神父身著白色祭衣。將臨期應穿紫色祭衣，不過「天降甘露彌撒」是特別的彌撒，這是為了紀念總領天使加俾額爾向聖母傳報喜訊，以及聖母回應：「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一38）。這段經文是「天降甘露彌撒」的主題，因此也稱作「天使彌撒」，神父會在彌撒中誦讀《路加福音》中的相關經文。上學後，我們會先參加清晨的彌撒，再到學校上課。外面天未破曉，漆黑一片，信友在寒風中打顫。然而，教堂溫暖的燭光，驅散了早起的困倦和踏雪而來的冰寒。信友帶來大大小小的蠟燭，點亮了漆黑的教堂，不僅帶來光明，還帶來了溫暖。彌撒結束後，我們先回家吃早餐，再去上

學。「天降甘露彌撒」奇妙地引導我們走向聖誕節。

12月24日早上，我們先把家裡的馬槽搭起來。我們每年都想把馬槽布置得更美麗。1929年，我們搬到了薩爾察赫河流域的提特摩寧（Tittmoning），我們在河邊撿了許多凝灰石。這類火山岩石的形狀千奇百怪，有的石頭上遍布孔洞，有的布滿凹紋，有的帶著鋒利的稜角，所以很適合用來裝飾聖誕馬槽。我們收集了一整籃的凝灰石，打造出旖旎的山谷秀色。弟弟到現在還留著用提特摩寧的凝灰石裝飾的小馬槽。每逢聖誕節，他就會把馬槽擺在宗座大樓教宗寓所的餐廳裡。我們還會收集雲杉枝條來作布景，這些樹枝與灰色的石頭相映成趣；我們還把樹皮上的苔蘚刮下來，充作牧羊人放牧的草場。我們家每一年的聖誕馬槽都有些許不同，擺飾越來越多。母親有時會添購一些裝飾品：幾隻羊、幾個牧羊人，有一次還加上一隻牧羊犬。

到了下午，母親會叫我們到外面散步。那時候屋外常常堆著厚厚的積雪，我們就出去滑雪橇，母親則待在家中裝飾聖誕樹。我們玩到傍晚才回家，接著全家一起誦念玫瑰經。我們家有念玫瑰經的習慣，有時每天念，至少每週六都會念。我們跪在廚房地上，前面放把椅子來支撐手肘，然後由一人——通常是父親，負責領經。

祈禱結束後，對面的起居室裡傳出一陣清脆的鈴聲，裡頭有棵小聖誕樹，禮物就擺在旁邊的桌子上。這棵雲杉樹上掛了蠟燭，耀眼的燭光令人難忘。我們放的可是

真的蠟燭，而且散發著清香。樹上還掛滿了彩球、天使像和銀絲彩帶等飾品，還有母親用金黃色榲桲果醬製成的星星、愛心和流星。

接著，父親會讀《路加福音》中的聖誕故事給我們聽，然後我們一起唱聖誕歌：《平安夜》、《主賜喜樂》，當然還有《孩子們快來》。1936年，我已經開始上人文中學，那年，我寫了一首短短的聖誕曲。我們三姊弟一起演奏，姊姊彈風琴，弟弟彈鋼琴，而我拉小提琴。母親感動得淚流滿面，父親雖然一派冷靜，但也深受感動。後來有好幾年，每逢聖誕節我都會創作幾首聖誕曲。

我們家拆禮物的時間比別人家早一些，因為我們實在等不及了。那個時刻有如童話般美妙。我們當然不會收到昂貴的禮物，而是一些實用的東西：母親親手織的衣服、襪子、帽子，或是我們正需要的某樣東西。我們每個孩子還會拿到一盤點心，裝滿了餅乾、黑棗乾、梨子乾及水果麵包。那都是非常棒的禮物，現在想起來還是很開心。

我們當然也可以說出自己想要的禮物。我還能一一細數我每年得到的聖誕禮物。1933年，我們已經搬到阿紹（Aschau），耶穌聖嬰送我一台菲莫利牌的投影機，可以把圖片投影在牆上。另外我還收到三本畫冊：一本介紹阿爾多廷，另一本講耶穌十字苦路的故事，第三本是介紹羅馬。我非常開心收到這些禮物。本堂神父聽說了，就要我在給本堂教友舉辦的羅馬講座上放映照片。神父在聖年時

（1933-34年），曾到永城羅馬朝聖，可惜當時照相機尚未普及，沒能拍照。於是，年僅十歲的我就負責放映羅馬名勝古蹟和知名教堂的圖片。如果沒有我的協助，神父就只能口頭描述。這事自然也引起一陣轟動。

1935年是我就讀寄宿學校的第一年，我那年的聖誕禮物是一本聖歌本《常用聖歌集》（*Liber Usualis*）。這是修道院專用的歌本，要價五塊帝國馬克。這本書很厚，有一千多頁，上面印著樂譜和拉丁文歌詞。若瑟很驚訝，歌本裡竟然連個德文也沒有；而讀到人文中學的我，已經上過拉丁文了。二年級時，我拿到的禮物是萊茵貝格（Joseph Rheinberger，1839-1901年）創作的《F小調彌撒曲》的總譜，我們在修道院合唱團唱過這首曲子。三年級時，我的禮物是《鐘之歌》的鋼琴琴譜，這是羅姆貝格（Andreas Romberg，1767-1821年）為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名詩所譜的曲子。

小時候，弟弟若瑟得到的禮物通常是動物布偶，而我拿到的多半是積木。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喜好和天分都不一樣。弟弟還收到另一隻泰迪熊、小馬、鴨子和小狗玩偶。他非常喜歡動物，所以父母總是送給他動物玩偶。還有一次，耶穌聖嬰送給他一套鐵路模型。

平安夜接下來的節目，就是分給我們小孩子五味酒——當然不會很烈，還有餅乾。之後，就得上床睡覺了。長大一點後，我們在子夜彌撒前先小睡一會兒，晚上

十一點再起床去參加彌撒。聖誕節的早上，有豐盛的早餐在等著我們，包括聖誕麵包和父親最喜歡的香醇咖啡。下午二點的時候我們會去參加晚禱，禮儀非常隆重，有聖詠團伴唱。

在我們家，父母的虔誠信仰和家鄉的宗教習俗，不是只有在聖誕節時才顯露出來。從父母身上，我們學到依靠天主助佑的重要性。每天三餐的餐前和餐後，我們都會一起祈禱，而主要的祈禱時間是在午餐後，特別為家庭的意向祈禱。我們還會念聖狄思馬斯祈禱文，他就是在加爾瓦略山同耶穌一起被釘十字架、最終幡然悔悟而懇求天主憐憫的那位「善心強盜」。他是悔過自新盜賊的主保，我們向他祈禱，希望他保護父親在工作崗位上一切平安。

警察是十分危險的職業，我們常常為父親擔驚受怕，尤其是他值夜班四處巡邏的時候。只要在他的轄區內發生犯罪案件，查明真相就是他的職責所在。父親經常工作到夜晚，有時候很晚才回到家。每到這種時候，母親和我們就會十分牽掛，大家便一起祈禱父親不要出事。幸好，父親一直平安無恙，對此我們真的很感恩。我們家的祈禱總是掛心父親。小時候父母送我們上床睡覺時，還會和我們一起晚禱。他們會念一段特別的祈禱文，重複念三遍。很可惜，我現在記不得那段禱詞了。接著念一段較長的禱詞。有一次我問父親這禱文的含意，父親只回答說：「我也不大明白。我小時候，父母在我床邊也是念同樣的

禱詞。」

我得承認，我們很少全家人一道參加彌撒，因為父親不是得在週日值勤，就是在聖詠團唱歌。長大後，我和弟弟時常在主日及平日彌撒當輔祭，但母親和姊姊卻是參加另一台彌撒。有時，我們一天參加兩台彌撒——清晨六點那台彌撒當輔祭，八點或八點半和家人一起參加第二台彌撒，下午二點再參加本堂的敬禮，慶節時則是晚禱。

我們將信仰虔誠地活出來，並時時在生活中實踐，這成為我們生命的特點。儘管現在我一天只舉行一台彌撒，但童年時代養成的習慣，伴隨著我們一生的成長。

我堅信，造成目前司鐸聖召短缺的原因，正是因為許多家庭失去了這種傳統的虔敬。今天，很多人偏向無神論而非基督宗教信仰。在某些方面，他們還保留一些信仰的痕跡，比如每逢教會重要慶節時會去教堂參加彌撒。然而，他們的信仰薄弱，而且早已與生活脫節，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可有可無。一開始，他們坐在餐桌前準備用餐，卻壓根兒沒想到要祈禱，到後來就不再進堂參加彌撒。然後，這種近似異教徒的生活方式生了根。如果在家庭中沒能實踐信仰，那麼，這樣的生活習慣會影響往後的人生。我常常和其他的神職同袍聊天，發現他們小時候都跟父母一起祈禱，一道去參加彌撒。這影響了他們整個人生，引領他們走向天主。所以，他們聖召的種子是落在沃土上。

美國有句俗語：「一同祈禱的家庭，必能凝聚在一起。」現在，離婚早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婚姻破裂和單親家庭越來越多。背後的原因會不會出在，越來越少的家庭願意把問題和煩惱交託給天主？難道家庭正是因為缺乏信仰和祈禱而走向破裂？婚姻失敗的原因，是否因為沒有給天主騰出空間？

我也這麼認為。如果我們把所有事情都放在屬人的層面，就失去了解決問題最關鍵的向度。

那麼，拉辛格家如何處理婚姻與家庭紛爭呢？

我們不是很清楚，每個人設法自己解決，或是向天主懇求。我們家不談論這些問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們家當然也不例外，但是紛爭的問題成了我們祈禱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把煩惱帶進祈禱，而找到解決的方法。

富爾達已故總主教若望·狄巴（Johannes Dyba，1929-2000年），據說來自非常情緒化的家庭，家人相處經常發生摩擦。不過，只要去告解，家人就會重歸於好，一片融洽。可惜的是，辦告解不再受到重視，但其實這是天主賜給我們最慷慨的恩寵。我們家每個月都會去辦告解。我在特勞斯坦（Traunstein）修道院讀書時，有位耶穌會神父曾建議我們每週去辦一次告解。說實話，我們沒人能真正做

到。不過我認為，每月辦一次告解對每個人來說是正確而必要的。

我們整年的生活是照教會節日來安排。而排在第一位的節日，當然是復活節，比聖誕節還重要。貫穿整個四旬期的是「橄欖山」祈禱敬禮。在都市裡，這個敬禮通常在週四舉行，那一天耶穌在革責瑪尼山園裡熱切地祈禱。而在鄉下，出於現實考量則移到主日舉行。先是一段很長的四旬期講道，才進入紀念耶穌三次跪地的祈禱敬禮——耶穌在橄欖山三次俯首至地，因此禮儀也分為三個部分：首先由聖詠團演唱，通常先是男聲獨唱，接著全體合唱，最後神父誦念祈禱文，然後靜默片刻。隨後，一陣嘹亮的鐘聲打破了沉靜，營造出令人難忘的氣氛。

我曾在道芬（Dorfen）當過四年（1953-57年）副本堂，那兒的教堂有一座巴洛克式的祭台，上面雕刻著耶穌祈禱的樣貌。「橄欖山」祈禱敬禮的禮儀中，管堂員轉動搖桿，將天使像從天花板上緩緩降下。天使像懸掛在一條繩子上，手持聖爵，昭示耶穌即將到來的苦難與死亡。眾所周知，在巴洛克時期，大家都喜歡禮儀中有這種演出。不過，有時候也發生搖桿壞掉的情況，這時天使像就會從天上「栽下來」。儘管如此，「橄欖山」敬禮依然是度過四旬期美好又感人的方式。

我前面提過復活前夕守夜禮，包括降福洗禮用水和點燃復活蠟燭，是在聖週六上午舉行。下午則是以另一種巴

洛克式的敬禮，慶祝主耶穌的復活。當時許多地方的教堂裡，包括提特摩寧和阿紹，都有一座「聖墓」，也就是把祭台布置成耶穌的墳墓。祭台上恭放聖體，聖體外蓋著一條白而透明的薄紗。祭台下方，是耶穌安眠墓中的塑像，四周以鮮花和彩色球形玻璃杯點綴，玻璃杯裡面裝有紅色、黃色和綠色的液體。聖墓的造型處處令人驚嘆。

舉行復活慶典時，教堂的所有窗戶都會掛上黑色窗簾，整個教堂晦暗無光。神父穿著節慶祭衣和大圓帽，連唱三遍「基督復活了」，第三遍時，聖詠團唱「阿肋路亞」應答。本來，神父應該每唱一遍就要提高一個音階，不過大部分的神父不擅長音樂，抓不住音準。教堂每扇窗前都站著一個人，當神父唱第三遍「基督復活了」時，他們就會一起扯下窗簾。在阿紹時，我和弟弟有段時間也做過這個工作。春天的陽光立刻照射進來，教堂裡洋溢著復活節的美好氣氛。

最後則是遊行，遊行時聖詠團會演唱一首復活節的聖歌。例如在特勞斯坦，聖詠團唱的是伊特（Caspar Ett，1788-1847年）的作品：《城門，請提高你們的門楣》（Attolite Portas），這位慕尼黑的作曲家曾在聖彌額爾教堂服務。聖體遊行是在陣陣乳香中，用「華蓋」（聖體傘）遮蔽聖體，緩緩前行。教會透過如此隆重的慶典，將基督復活的喜訊，深深烙印到信友心中。

此外，還有一些慶祝復活節的民間習俗，例如家家戶

戶都會將食物，如燻肉或培根、鹽、雞蛋等帶到教堂，請神父祝聖。當然，復活節彩蛋也不可或缺。母親和其他家庭主婦會用洋蔥皮將雞蛋染成褐色，這是最省錢的方式。當然，也可以到雜貨店買染料，回家自製五顏六色的雞蛋，再帶到教堂祝聖。我們還會帶復活節麵包，這是一種澆上糖漿的辮子麵包，禮儀結束後可以享用。母親還會做「逾越節羔羊」造型的麵包，給我們當作早餐。

我對聖母月也留下美好回憶。五月是敬禮聖母月，教堂每天都有祈禱活動，我們都很樂意去參加，因為教堂布置得十分喜慶，簇擁的鮮花不僅賞心悅目，散發出芬芳的花香，還有聖詠團及兒童合唱團獻唱。

天主之母時刻陪伴著我們。在我們家的廚房裡，十字架左邊掛著基督像，右邊則是聖母像。前面說過，我們家幾乎天天念玫瑰經，到了十月的玫瑰月，我們會到教堂念玫瑰經。

那時候，教會年曆還有個重要節日，就是2月2日慶祝聖母取潔瞻禮。如今，這天已經變成主的慶日——獻耶穌於聖殿，紀念耶穌第一次進入天父的殿宇。但在當時，這主要是聖母的慶日。到了這天，我們家會用一種特別的音調誦念玫瑰經。每個人前面的椅子上點燃一根細長的蠟燭，念經時蠟燭繼續燃燒。那時的人相信，蠟燭先熄滅的人會最早死。當然，這不過是種迷信。

這一天也稱為聖燭節，到現在我還收藏了好幾根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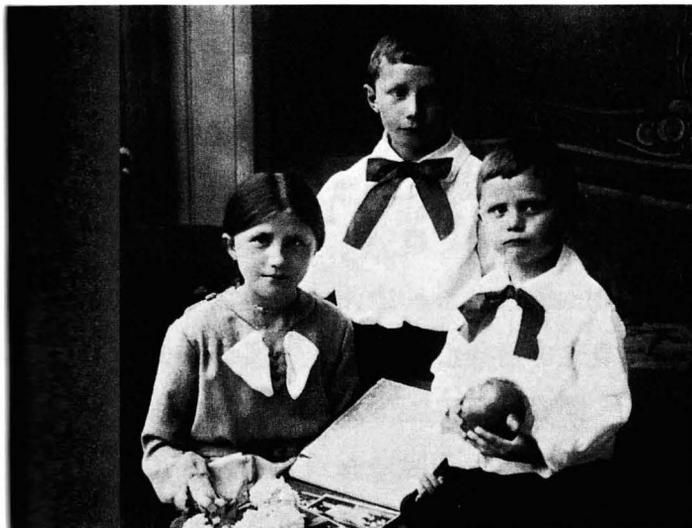
蠟燭。那時的婦女經常帶長蠟燭到教堂，彌撒時把蠟燭點燃。蠟燭有簡單素面，也有裝飾繁複的。以前的農場聘雇男工和女僕，這種長蠟燭在農場有特殊的作用。女僕要照料男工的生活起居，例如鋪床、補襪子等。男工為了感謝女僕的照顧，就在聖母取潔日這天送她一根長蠟燭。

2月2日也是所謂的「搬遷日」，住在雇主家的傭工可以搬家換新工作。如果某人想到別處工作，那麼原本的雇傭契約就在聖母取潔日這天終止。農場主人會事先詢問家裡的男工和女僕是否願意留下來，如果他們同意，那天就能領到五塊馬克。至少在巴伐利亞，這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農民曆上，這是重要的節日，也是不必工作的假日。到了晚上，以誦念玫瑰經和發送蠟燭作為結束。

我們家還很重視主保日：瑪利亞是9月12日，若瑟是3月19日，喬治是4月23日。每個人的主保日那天，母親都會換上特別的餐桌巾，這塊桌巾我到現在還留著。每年我的主保日，我的管家雅妮·海恩德女士就會把那條桌巾拿出來鋪在餐桌上。主保日的清晨，我們家會喝香醇咖啡，配母親親手烤的蛋糕，父親還會買一瓶葡萄酒來慶祝。住在阿紹時，我們比較大了，那時就有「馬拉加」或「薩摩斯」這兩種葡萄酒，我們小孩子也能分到一小杯。這一天家裡會吃大餐，還能拿禮物。不過，我們家反而沒那麼重視生日，生日那天只簡單向壽星說聲生日快樂。

我太快提到阿紹了，其實1932年搬到阿紹之前，我們

在1929年從馬克特爾搬到了提特摩寧。當時我們對提特摩寧這個小城非常嚮往，因為和鄉村味濃厚的馬克特爾相比，它很城市化。這座美麗的小城，有南部風格的廣場，四周各種小店林立。在接下來的三年裡，那兒成了我們的家鄉。



Chapter 3

提特摩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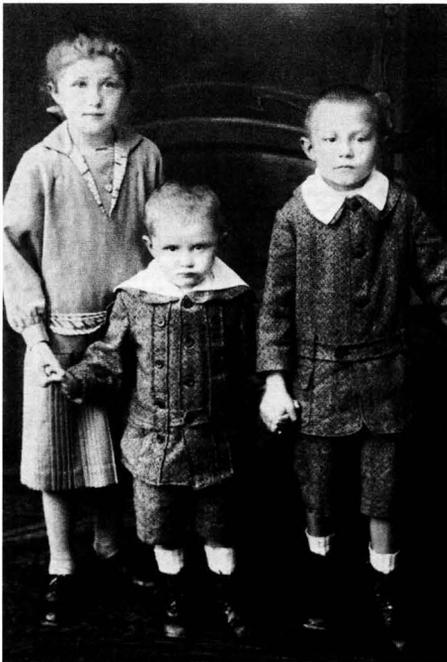
1929-1932年

拉辛格家的下一站——提特摩寧，位於薩爾察赫河流域，該河是德國與奧地利的界河。若瑟·拉辛格在自傳《我的一生》中，稱這座小城為「童年的夢想之鄉」。提特摩寧有個大廣場，中央是一座典雅的噴水池；市政廳的外觀富麗堂皇，壁龕鑲嵌著羅馬皇帝的頭像。古老大宅、中世紀城門，以及十二世紀的城堡（這座城堡建於高處，俯瞰著整座城市，自十七世紀起就是薩爾茲堡主教的夏宮，可是實際使用的次數屈指可數），這裡的這一切，都給若瑟留下極深的印象。當然，令他銘記於心的還有小城的教會歷史。十七世紀的神祕家赫爾茲豪澤（Bartholomäus Holzhauser），不僅在這裡記錄下他的末日神視，還建立了一個教區神父的團體。從此，大家稱本堂神父為「主任」，稱其他神父為「詠禱司鐸」，而他們團體的住所就建在城的制高點，看起來就像一座可愛的小城堡。

鄉村警察隊，包括拉辛格一家，就住在這座歷史小城的一棟美麗建築，以前叫做施圖本勞赫樓。這棟房子就在廣場旁，曾經是教區神父團體的房產，現在則是一間本地銀行，只有瓦格納街三號的一塊牌子標示出這個出名的家庭曾住在這裡。令人讚嘆的外觀及美麗的八角窗，讓人一時難以想像這棟房子以前老舊的樣子。不過，拉辛格家的孩子並不在意。他們覺得這裡神祕又有趣，好像住在古老的騎士城堡裡。



提特摩寧深受薩爾茲堡影響，畢竟這裡曾是薩爾茲堡主教的駐地，而早期從事鹽業貿易，造就當地的繁榮富裕。我們住的房子，之前歸薩爾茲堡的主教座堂司鐸諮議會所有。我們家有個非常大的房間，以前是諮議會的會議廳，可是這個住宅並不實用：大理石地面滿是裂縫，木頭樓梯陡峭難走，還嘎吱作響；取暖也十分不便，得爬又窄又陡的樓梯，把煤塊和柴火搬上來。母親經常要把沉重的草筐搬到樓上，實在過於吃力，於是她就去訂做一個有背帶的小背篋。幸好夏天不必取暖，母親只需搬廚房爐灶要用的柴火。但是一到冬天，搬柴火的差事真是苦不堪言。



拉辛格家三姊弟：瑪利亞、若瑟與喬治。

一樓是雜貨店，賣些餐具、鐵器、針線等生活用品。我們的房東叫施圖本勞赫，個性有點古怪。他的耳朵大概重聽，要很大聲跟他講話，他才聽得清楚。房東先生有個女僕名叫羅莎，她常常跑來跟父親哭訴，然後父親就得替他們排解紛爭。

搬家後，我還遇到羅莎幾次。她後來到特勞斯坦的修道院當女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又遇到她。那時我在特勞斯坦附近的幾個堂區擔任副管風琴師，她則在特勞斯坦附近一位神父那裡當管家。

提特摩寧有一名更夫，剛搬到那裡時，我很怕他。我們在馬克特爾時，根本不知道有更夫這號人物。某個深夜，我和弟弟被嚇醒了，因為更夫在外面大聲唱著：「大家聽著，我告訴你們，現在鐘敲了十二下。」我跟父母說：「外面有個怪人在大吼大叫，發生什麼事？」那時我們全家一起睡在那個大房間裡。父母先安撫我，然後跟我解釋那個人是更夫，他四處巡邏，確保城裡家家平安。

提特摩寧大致上來說，是一座十分浪漫的小城。每當我回憶起提特摩寧，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漂亮的神父會館教堂。那兒對我們小孩子來說，有無窮的魅力。教堂裡敬禮耶穌受難像，畫像栩栩如生，耶穌的目光彷彿直視著你。城裡還有一間修道院教堂，同時也是學校教堂，學校的彌撒都是在那兒舉行。修道院的教堂有個善會，每個月都會舉行一場隆重的敬禮和遊行。遊行的時候，由兩個男孩負

責舉著印有修會會徽的小旗桿。我也舉過那個小旗桿，而深感自豪。我們穿上和修士一樣的長白衣並繫上皮帶，才可以加入遊行。母親為了來看我，每個月都會帶姊姊和弟弟來參加這個敬禮遊行。

提特摩寧還有一座十分漂亮的朝聖地教堂——蓬拉赫（Ponlach）小教堂，正式的名稱是Maria Brunn教堂，位於提特摩寧的上城。提特摩寧有一面被丘陵環繞，山上有一座雄偉的城堡，後來成為當地的寄宿學校。不過，我們對城堡附近的蓬拉赫朝聖地更感興趣。我們常常和母親一起去這座洛可可風格、明亮又親切的小教堂。教堂坐落在森林深處的溪谷旁，蓬拉赫溪水潺潺流過。那華美的教堂、幽深的溪谷、涓涓的溪流，無一不給我們留下美好的印象。我們非常喜歡在山谷中漫步。

朝聖地教堂的主體建築是巴洛克晚期風格，於1717年建成，有前階梯和流出泉水的壁龕。在當時，椴木雕刻的聖母像吸引了眾多朝聖者前來瞻仰。這座聖母顯奇蹟像是由薩爾茲堡的雕塑家裴尼格（Hans Pernegger）在1639至40年間，即三十年戰爭中期雕刻完成。直到後來，信友才為聖母穿上華麗的衣飾。教堂兩側的祭台飾有提特摩寧雕塑家伊策費德納（Johann Georg Itzfeldner）雕刻的塑像，天花板的畫像取自瑪利亞一生中的四個場景。唱詩席上面有九幅壁畫，分別是歐洲的九處聖母朝聖地，上面寫著：

「佩萊恩（Plain）聖母是眾人的安慰；
阿爾多廷恩寵滿溢；
艾塔爾（Ettal）恩寵時時臨在；
帕紹的護佑者救助世人；
策爾（Zell）聖母護佑身體與靈魂；
施尼（Schnee）聖母撫慰傷痛；
洛雷托（Loretto）由上天美化，繁花盛開；
艾因西登（Einsiedeln）由天主聖化，遠離塵囂；
蒙塞拉特（Monserat）為整個基督教會帶來喜悅。」
蓬拉赫泉水豐沛，溪流經幽谷，形成幾處小瀑布。

提特摩寧還有一個養蜂園，那是專供市民養蜂的小公園，母親很喜歡帶我們去那裡散步。母親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做著針線活，我們在一旁玩耍，就這樣陪伴我們度過一整個下午。我們閒暇時常去的另一個地方，就在提特摩寧的監獄附近。那裡其實是校園的一部分，屬於姊姊瑪利亞就讀的那間女校，後牆有一排長椅，我們夏天時很愛去那裡玩。市廣場周圍，有兩座古老的城門：布克豪澤門和勞芬納門。穿過勞芬納門，就是火車站；蒸汽火車每次進站時，都會發出巨大的轟鳴聲，並揚起陣陣煙塵。車站有列車開往阿爾茲河畔的威斯米爾（Wiesmühl an der Alz），我們常去那兒郊遊。

火車站後面是墓園和美麗的小教堂，我們常常去那間

教堂參觀。有位馬克斯·奧爾先生住在墓園附近，我們都叫他奧爾·馬克斯爾。他家有一架風琴，他總是很樂意把家中的風琴秀給每位客人看。那時我常常央求母親：「我們可以去奧爾·馬克斯爾家看風琴嗎？」母親答應後我們就趕快跑去他家，他還允許我在琴鍵上彈一彈呢！可是，我用兩根手指頭敲打出的音調並不怎麼悅耳。

提特摩寧城建於高處，邊境關口設在地勢較低的薩爾察赫河橋上。這條河是德國和奧地利的邊界河。橋上有個收費亭，旅客過橋時只要付十塊芬尼就能出國了，我們小孩子都感到驚奇有趣。母親和邊境官的太太關係不錯，每次我們過橋到奧地利玩時，她們總會閒聊兩句。

薩爾察赫河對岸的第一個小鎮叫奧斯特米廷（Ostermiething），街上有間打鐵鋪。弟弟很小時，有一次我們路過那裡，他大聲問說：「那個人是鐵匠嗎？」這時，有聲音從店裡傳出來：「是薑餅師傅才對。」可見那個老闆十分風趣。在邊境附近，奧斯特米廷的北邊，有個叫聖拉德貢德的小鎮，特別敬禮聖拉德貢德（St. Radegund，518-587年），這位聖女的人生經歷相當精彩。

拉德貢德是圖林根的公主，梅洛溫國王克洛塔爾一世打敗她的父親後，她和弟弟就被當作人質軟禁在法蘭克的王宮。後來，拉德貢德在那裡領受了洗禮。克洛塔爾在王妃去世後，強娶了拉德貢德為妻。婚後，拉德貢德決定奉

獻一生做補贖和善工，結果不斷和國王丈夫產生衝突。弟弟被殺害後，拉德貢德逃亡投奔法國努瓦永的主教，並在主教的降福下發願成為修女。560年，她在普瓦捷建立了一所女修道院，潛心修道。不久，全國婦女紛紛效仿她，立志作修女。就連拜占庭皇帝也聽聞了這位前王妃的虔誠事蹟，於569年送給她一片耶穌受難的十字架真木，她也因此將修道院改名為聖十字架修道院。

聖拉德貢德鎮定期演出耶穌受難劇，我曾和母親一起去欣賞。我們也在提特摩寧的露天劇院觀賞了英雄人物安德烈亞斯·霍法（Andreas Hofer）的一齣戲。我們一家人都很愛戲劇。有一次，我們的朋友自導自演了一齣木偶劇，小若瑟看了非常開心。

不得不提的是，提特摩寧非常浪漫。尤其在將臨期那段時間，市廣場四周的商店櫥窗布置得有濃濃節慶氣氛，出奇美麗。如果剛好又飄過雪，景色更是美不勝收。在馬克特爾，只有一家店會裝飾聖誕櫥窗，就是前面提過的雷賀納百貨行。而在提特摩寧，每間店都競相裝飾自家的櫥窗。我們隔壁是一家普斯忒特書店，由歷史悠久的書商家族經營。書店創始人是弗利德里希·普斯忒特（Friedrich Pustet，1789-1882年），他出生於帕紹，後來搬到雷根斯堡。普斯忒特先成立了一家出版社，然後在許多城市開設書店；他的書店不僅開在巴伐利亞州，後來更遍布全球。



他的侄子安東也在薩爾茲堡成立了安東·普斯忒特出版社，因此提特摩寧也有一家普斯忒特書店。這間書店的櫥窗總是布置得美輪美奐，到了聖誕節的時候尤其漂亮。

書籍在我們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母親常常把她剛讀過的故事講給我們聽。她最愛看小說，像是描述金融世家富格爾家族這類的歷史故事（這本書很好看，我也收藏一本）。母親也喜歡浪漫的故事，我還記得她讀過艾門丁爾（Kurt Allmendinger）於1930年出版的一部小說，書名是《羅馬——永城的明珠》。那時我剛開始學習拉丁文，心想羅馬一定是指羅馬城，不過這也是女主角的名字。母親給我們講過許多好聽的故事，包括宗教故事，因為她讀的



老舊明信片上的提特摩寧市廣場。左前方有八角窗的那棟房子就是「施圖本勞赫樓」，拉辛格一家曾在此居住。

大多是天主教知名作家的作品。

父親每到週六必看的書就是「高飛內」——大家習慣這樣簡稱高飛內神父（Leonhard Goffiné，1648-1719年）的代表作 *Christkatholische Handpostille*。這本書涵蓋了主日和慶節的彌撒讀經，清楚闡釋經文，並結合每日靈修的主題，父親常常念給我們聽。我們必讀的書當然還有「邵特」，這個簡稱取自本篤會神父安瑟莫·邵特（Anselm Schott，1843-96年）的姓氏。他於1884年出版了第一部《信友彌撒經本》，此後他的姓氏就成了德文各種信友彌撒經本的總稱。

小時候，我們有一本兒童的彌撒書，這本小書用圖片和簡短圖說講解彌撒的程序，幫助孩子參與禮儀、了解彌撒的意義。後來，我們得到了一本兒童專用的「邵特」，裡面收錄了彌撒禮儀的主要經文。拿到書後，我們都很認真閱讀。我們父母手上那本當然是貨真價實的「邵特」，那是1920年他們結婚時本堂神父送的禮物。我們就這樣一步步被領入彌撒禮儀的奧祕，並且隨著身心成長，對彌撒聖祭越來越感興趣。

1930年秋天，我們兄弟在提特摩寧的生活變得不再輕鬆。六歲的我開始上小學，弟弟則在奧斯定修道院的一樓讀幼稚園，那時還叫做「托兒所」。弟弟的幼稚園是英國貞女會的修女辦的，園長是瑪利亞修女（Maria Korbiniana Kreuzburg），她的身材嬌小卻很有活力。

我小時候很愛上幼稚園，弟弟一開始並不喜歡，他



若瑟·拉辛格（已圈出）在提特摩寧的幼稚園。

比較想和母親待在家裡。過一陣子之後，他才開心地去上學。有一天，弟弟放學回到家，他說當天的課程讓他感到很震撼。十二月六日是聖尼各老節，相傳這一天聖尼各老會帶著隨從——怪獸坎卜斯（Krampus）去拜訪小朋友。修女們用這個傳說當作機會教育，還安排了一段表演：有個修女扮演坎卜斯在門外大聲喊叫，一邊使勁地敲著門，教室內的兩位修女用力頂住門，不讓坎卜斯進來。接著，修女告訴小朋友坎卜斯是什麼人物，要他們當乖孩子才不會受罰。修女用這種方式讓孩子對邪惡產生適當的畏懼。

他們童年的田園生活聽起來真是美好。最初確實是如此，但不久之後發生一連串事件，打破了原本的寧靜。提特摩寧也面臨貧窮和失業問題，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選舉接二連三，整個城市貼滿刺眼的廣告和醒目的標語。政治集會一再演變成暴亂，因此拉辛格警官得不斷出面制止暴動。尤其是納粹黨，經常四處滋事，引發暴力衝突。他們刻意煽動民眾、製造假象，讓人民以為納粹政黨是時下混亂局面的唯一出路。

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提特摩寧有許多面牆是用來張貼競選海報，上面貼滿了各黨的宣傳廣告和集會活動的訊息公告。由於經常出現群情激憤的情況，當警察的父親必須在場維持秩序，有好幾次情勢十分危險。父親回家後會把當天的狀況講給我們聽，不過我們並沒有親歷這樣的場面。

五歲的小若瑟和哥哥察覺到父親對未來日益擔憂。納粹黨自封救世主的希特勒，令這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十分反感。這時，拉辛格警官成了《直路報》（*Der gerade Weg*）的忠實讀者。這份報紙是關心政治的基督徒的發聲管道，總編輯是葛里希博士（Fritz Michael Gerlich）。他直言不諱，辛辣地鞭撻希特勒的行徑。

1932年7月31日，葛里希發表了一篇社論〈納粹主義

是一場瘟疫〉，他有如先知般預言說：「納粹主義就是指對外敵視鄰國，對內恐怖統治，引發內戰和國際戰爭。納粹等同於謊言、仇恨、骨肉相殘和永無止境的苦難。希特勒宣揚的正義不過是一派胡言，受他暴力統治謊言欺騙的民眾，快醒醒吧！這攸關你們與後代子孫，以及德國的命運！」

希特勒上台後，這位勇敢的警世者就為仗義執言賠上自己的性命。納粹衝鋒隊衝進葛里希博士的辦公室把他打個半死，隨後將他拘捕。他被關了十五個月，不斷遭到嚴刑拷打，最後被送到達豪集中營處死。

我不確定父親是否訂了《直路報》，但我清楚記得在家中經常看到這份報紙，大家對它評價甚高。那時候，父親很少跟我們聊到政治話題，他深信一句俗語：「孩子和傻子會說出真話。」他擔心我們在無意中透露一些訊息而惹禍上身。母親則直率一些，說得也比較多。不過，父母從不諱言自己反對納粹，也毫不掩飾心中對希特勒的厭惡。總之，他們都很佩服葛里希博士的勇氣。

父親會看《直路報》，當然是因為這份報紙道出他的心聲。此外，他還訂了反映巴伐利亞人民黨觀點的《慕尼黑黑日報》。人民黨是當時巴伐利亞的天主教政黨，也是納粹黨在鄉下地區最強勁的對手。可惜的是，納粹黨奪取政權後，人民黨就被迫解散了。

教會在當時也曾公開反對希特勒的作為。早在1930年10月，梵蒂岡報紙《羅馬觀察報》就在頭版文章中聲明：加入納粹黨組織「違背天主教徒的良心」。慕尼黑的總主教福爾哈貝爾樞機（Michael von Faulhaber）則用更明確的措辭，斥責納粹意識型態為褻神的「異端邪說」。天主教神職人員「嚴禁」以任何方式支持納粹。德國主教團先向各教區做出一連串類似的指示，隨後又於1932年8月發表了對抗納粹的一貫指導方針。教會宣告納粹黨綱為「邪說」，公開譴責這場「反天主教」的褐色運動。天主教徒不得加入納粹黨，違反者則禁止領受聖事。天主教與納粹主義顯然勢不兩立。

弟弟和我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很早就對音樂著迷，尤其是教會音樂。這是在馬克特爾開始萌芽，我當時的榜樣是小安德烈斯；後來我在提特摩寧認識了奧爾·馬克斯爾和他的風琴之後，對音樂的喜好日益加深。我在教堂看到神職人員演奏管風琴、教友帶領聖詠團，我對教會音樂漸漸產生濃厚興趣而無法自拔。

我很幸福，因為父母從一開始就很支持我的喜好。快搬離提特摩寧時，父親在報紙上看到出售二手風琴的廣告。我還清楚記得那架風琴要價241塊帝國馬克，過不久風琴就送到了我們在阿紹的新家。我的音樂生涯就此展開，最後還當上了主教座堂合唱團指揮。有一次我問父



拉辛格姊弟盛裝打扮到照相館拍照。相片右邊、手上拿著金色皮球的男孩，後來當選為教宗。

親，在主教座堂帶領合唱團的那個人，應該怎麼稱呼他？父親告訴我，他叫主教座堂合唱團指揮。我對父親說：「我長大後要當主教座堂的合唱團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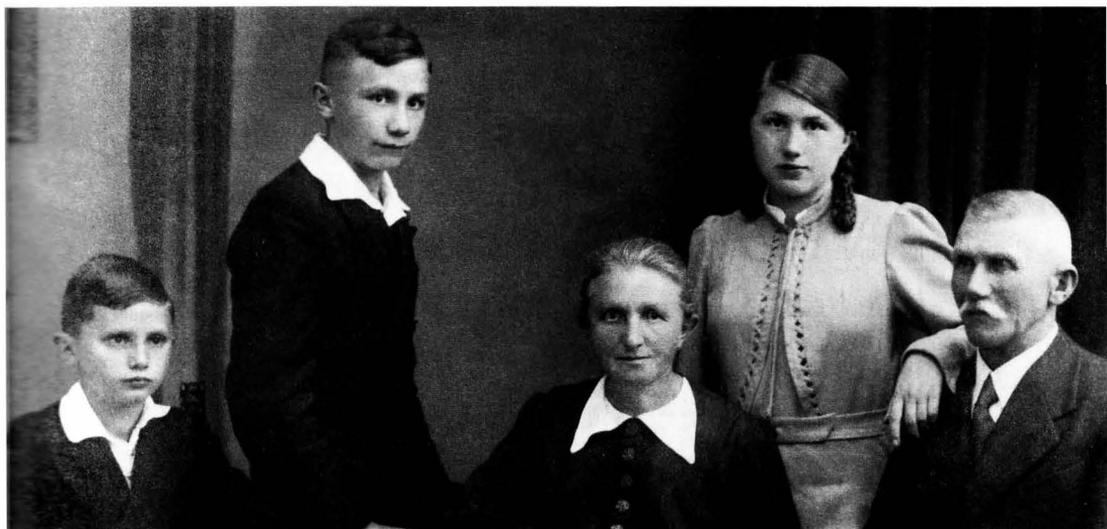
後來，我對這個決定也有過懷疑，但當時的我年幼天真，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在提特摩寧，弟弟也曾深信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樞機。說穿了，這不過是小孩子的童言童語。我們根本沒想到自己說過的願望，有一天竟然全都實現了。

有一次，慕尼黑和弗萊辛（Freising）的總主教福爾哈貝爾樞機，到提特摩寧來舉行堅振聖事⁶。他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搭乘一輛黑色大轎車抵達提特摩寧，那時這裡還沒有這種車款，我們從沒見過這樣氣派的轎車。司機緩緩停下車，可是車門並沒有打開，當警官的父親立刻上前替樞機拉開車門——為了這次的活動，父親特意穿上潔白如新的制服，佩戴擦得晶亮的佩劍、鋼盔和皮帶。樞機威風凜凜地走下車，他用肅穆的目光望向四周的民眾。這一幕讓我們印象深刻，弟弟更是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我也要當樞機！」

幾天之後，父母請一位油漆師傅來粉刷我們的房子。他的動作熟練，弟弟第一次看人刷油漆看得很入迷，欣賞完後他向我們宣布說：「我長大後也要當油漆師

6. 根據慕尼黑總教區檔案館內保存的紀錄，那天是1931年6月19日；若瑟·拉辛格當時年僅四歲。

傅！」樞機和油漆師傅，當然是天差地別的兩種職業。不過，他還有很長的時間決定未來的志向。



Chapter 4

阿紹

1932-1937年

納粹執政之前，父親就和納粹衝鋒隊有過正面交鋒，曾驅散他們的集會，所以他的政治立場等同於反對納粹，這在提特摩寧可說是眾所皆知。不過，他在家裡很少談論這些事，大概是為了保護我們。後來，納粹掌權已成定局，父親的長官認為他繼續留在這裡可能遭遇危險，建議他調離提特摩寧。因此，在這座小城僅僅任職三年，父親就請調到鄉下服務，於是我們一家搬到了阿紹。

1932年12月中旬，再過不久就是聖誕節，距離希特勒上台只有六週時間，拉辛格一家五口搬到了茵河畔的阿紹。若瑟·拉辛格在自傳《我的一生》中描述：新家鄉「是富裕的農村，有許多遼闊壯麗的農場。就如同巴伐利



阿紹的主要街道，拉辛格一家曾住在最右邊的那棟房子。

亞常見的景象，村子中央有一座大啤酒廠，附設的餐館是每到週日男人聊天聚會的地方。農村廣場其實位於村子的另一端，附近也有一家不錯的餐館，還有教堂和學校。」他們的新居有八角窗和陽台，按照當時的標準，十分現代化。房東是富有的農民，把房子出租給警察使用。教宗曾提到這裡是他「溫馨的家」。

阿紹村地勢狹長，有條長長的街道，我們的新居就位在離教堂最遠的那一端。這棟房子很漂亮，可住兩個家庭。母親第一眼看到時馬上脫口而出：「這真的是一棟別墅。」一樓是警局的辦公室，父親的副手住在一樓，我們一家住在二樓。村民多因鄰里糾紛到父親的辦公室請求調解仲裁。像在提特摩寧一樣，父親的辦公室裡也有一支電話，不過只能用於公務，父親不准我們碰它。那時，我們家還沒有電話。

這棟房子有個漂亮的八角窗，我們一見就十分喜歡。二樓有很大的廚房和餐廳，裡面有灶台、餐桌、沙發和風琴，我們搬來不久，父親買的風琴就送過來了。廚房對面是舒適的起居室，不過冬天的時候總是不夠暖。這裡還有兩間臥室：一間是父親和我們兩個男孩睡的房間，母親和姊姊睡在另一間。搬進來沒幾天，我們就在走道上布置了聖誕馬槽，所以很快就在這裡找到了家的感覺。

我們屋外有一間小側房，用來當作拘留室，供被父親

逮捕的罪犯過夜。然後，隔天清早，父親或他的副手警官再徒步押送他們到十七公里外慕朵夫鎮的監獄。警察還得為被逮的犯人準備食物，所以我們家吃什麼，他們就跟著吃什麼。母親的廚藝精湛，他們真的很有口福。

我們新家還有一個美麗的花園，給母親帶來許多歡樂。花園裡有個小池塘，裡面養了鯉魚。池塘旁邊有個小斜坡，那時調皮的小若瑟總是喜歡沿著斜坡滑下來，結果有次差點溺水。幸好父母反應迅速，很快把他從水中救上來，才保住他一命。過不久，我們便把池塘填平了，如今沒有人知道當時的池塘在哪個位置。弟弟當選教宗之後，我受邀到阿紹為獻給他的一座紀念碑揭幕。當地的市長很親切，我和他提起那個池塘，結果發現他也不記得那裡曾有池塘。

教堂附近有一家小商店，其實村子裡有好幾間商店，但這間是最重要的。老闆娘巴斯特太太有好幾個小孩，我跟她的一個兒子是同班同學。日常所需的一切，無論食品雜貨、甜品、糖果、巧克力、鉛筆、鋼筆、書本、紙張，還是母親和姊姊做圍裙及衣服所需的布料，這間店裡應有盡有。對我們小孩子來說，一踏進店裡就彷彿置身於童話王國。

村子的另一頭是個叫坦恩（Thann）的小村落，那裡有個年輕人叫克勞恩貝格（Franz Xaver Kronberger，1913-2010年），大家都謔稱他「大學生」，實際上他才剛剛中

學畢業。我還清楚記得，他頭戴一頂紅色天鵝絨畢業生帽，上面印著中學畢業的標誌，配上一條掛在懷錶上象徵畢業的三角巾，以及一條紅白相間的畢業綬帶，這一身裝扮讓我們印象十分深刻。後來，他進了神學院，還當了慕尼黑天主教堂的副本堂。我們在慕尼黑再次相遇，成了很好的朋友。

阿紹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村裡的伊格爾神父。神父的助手叫喬治·林澤，他是作家路易絲·林澤的叔父。路易絲有點難相處，但她的叔父十分平易近人。喬治·林澤曾被大黃蜂蟄咬，結果生了一場大病，在療養院休養一段時間，康復後有點不良於行。他的女管家叫愛麗絲，和「麗絲」這個大眾名相比，愛麗絲聽起來比較高雅。每次碰到她，她都會送我們小禮物，例如核桃等小點心。她樂此不疲地給訪客送上驚喜，所以我們都很喜歡去她家。

阿紹德高望重的人物，包括中學校長和老師，以及幾個富有的農民。可惜的是，後來有些人成了邪惡的納粹。再來，當地的警官，也就是我們的父親，也很受村民敬重。雖然父親只會抓犯罪的成年人，可是大人經常嚇唬小孩子說，警察會把不聽話的孩子抓去處罰。

村裡有位巧手工匠叫布藍德，他的正職是理髮師，但他也是鐘錶師傅、電工師傅、保險員、加油站站長和攝影師。我們家孩子的第一組照片，就是他拍的。我記得他站在那台大照相機背後，然後一邊對我們說：「現在安靜下

來！」不過，他每次都會先出點差錯。他是個慢郎中，十分沉默寡言，但在任何領域都能得心應手。

大概在1934或35年時，我們家買了一台簡單的柯達相機，要價三塊半或四塊半馬克。這台照相機讓我們自豪了一陣子，雖然照片拍出來的品質，遠遠比不上布藍德在攝影棚裡拍出來的效果。後來，美軍於1945年占領我們在特勞斯坦的房子，把這台相機搜走了，令我們非常傷心。

我們家附近是阿麥斯畢希勒家的啤酒廠，他們是地方上最富有的家庭，有五個子女：長子多瑪斯在讀寄宿學校；次子也叫喬治，他和我同班；四女貝柏兒和弟弟同年，1933年讀小學時是弟弟的同班同學。他們倆上學都走同一條路，常常一塊兒出發，還成了好朋友。

其實我們那個年紀的男孩子，很少跟女生打交道，因為男生的個性完全不同。在班上，男生和女生分開坐，女生坐左邊，男生坐右邊。所以，男生都玩在一塊兒，女生也都是和女生交朋友。在我們家差不多也是如此：剛開始時，因為弟弟年紀較小，我常和年紀相近的姊姊瑪利亞一起玩耍；後來，我們兩兄弟越來越要好，姊姊反而越來越黏母親。

姊姊很會講故事，放學後她常常一五一十把學校裡的事說給我們聽。我和弟弟對學校的生活充滿好奇，總是聽得聚精會神。不過，我們三姊弟好像從來沒有一起玩耍。我和若瑟是很團結友愛的兩兄弟，我們當然也曾拌嘴打



架，這是免不了的。但總體而言，我們算是形影不離，在往後的歲月也是如此。

你們算是乖乖牌，還是淘氣鬼？

大概介於兩者之間吧！我們肯定沒有那麼聽話，但弟弟比我乖一些。可是我們也不是那種調皮搗蛋、整日胡鬧的淘氣鬼。

淘氣鬼都是怎樣胡鬧的呢？

舉個例子來說吧，我們家另一邊住著一位小農，他家有一輛牛車。拉牛車時，他都是先向前走五步，然後向後吆喝一聲「駕」。你知道趕牲畜時的口命吧？出發時喊「駕」，停車時喊「迂」，向右喊「呵」，向左則喊「喂」。這個鄰居農夫習慣自己走在前面一邊喊口令，幾乎從不轉身往後看。於是，經常有「可惡」的淘氣鬼在後面偷偷把牛車停下來。結果，農民獨自回到家，這才發現牛車根本沒有跟在後面！

阿紹村的生活，當然與提特摩寧這種都市化的生活截然不同。不過，對我們沒有太大的影響。雖然我們也會去田裡工作，例如春天時去採摘野萵苣。不過，我們基本上很少做農活。那時候我們兄弟已經十分清楚，我們的志向

是屬於另一片天地，阿紹只是通往那段路程的一個驛站。

十九世紀時，當地出了一位深受愛戴的聖人——帕茲哈姆的康辣德（Konrad von Parzham，1818-94年）。他是農民，卅一歲時加入阿爾多廷的嘉布遣會，終其一生擔任門房，為到當地朝聖的民眾服務。康辣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樂於對每個向他求助的人伸出援手。即使年邁而時有病痛，他仍然每天工作長達十八小時。直到最後他精疲力竭，在臨死前才請求院長免除自己的職務。三天後，溘然長逝。

教宗庇護十一世於1930年為康辣德修士宣福，1934年封聖，理由是：「他身上閃耀著純潔、謙卑、忠於職守，而且熱愛天主與鄰人」——這些美德對幼小的若瑟·拉辛格同樣影響至深。後來，他常常自問：為什麼在平凡人身上，天主最能清晰地彰顯自己？這同時也激勵他，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根，也不要想做萬眾矚目的非凡人物。

1934年5月20日，康辣德修士的封聖大典是在聖神降臨節這天舉行，我至今仍記憶猶新。這一天，我們全家再次前往阿爾多廷朝聖。我們三姊弟和母親在街上看到盛大的燭光遊行，成千上萬的民眾從我們身邊經過，虔誠地祈禱：「聖母瑪利亞，請幫助我！聖母瑪利亞，求妳憐憫，請扶助我可憐的罪人。」對年僅十歲的我來說，很難理解

這一幕。可是看到那麼多人拿著蠟燭向聖母祈禱，又讓我歷久難忘。

阿爾多廷修道院內的教堂，十分令我神往，不過最吸引我的還是恩慈小教堂。迴廊上掛滿了還願牌，信友感謝聖母有求必應，幫助他們走出困境。對我們來說，這是奇蹟的可見記號，是聖母了解苦難和憂愁的最好見證。那時，有的人還會面向迴廊跪著誦念玫瑰經。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們都知道他們心中有重要的意向和煩惱，虔誠地祈求聖母護佑與幫助。懺悔、下跪祈禱是做補贖，也能加深祈禱。

封聖當天的焦點當然是康辣德修士。實際上，我們當時對他的事蹟知之甚少。只聽說他心地善良、十分勇敢，虔誠善度基督徒的生活，最後上天堂享永福。這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激勵我們以他為榜樣。我們知道家鄉附近出了這樣一位聖人，他已經進入天國、回到慈愛的天主身邊，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令我們感到滿心歡喜。

不過，那天也充滿戲劇性。我們在英國貞女會修道院吃午餐時，居然有隻馬蜂掉進湯裡，牠狠狠螫了弟弟的眼皮。若瑟對蜂毒過敏，他的眼睛四周立刻腫了大包，整個下午都很不舒服。

在阿爾多廷，我對賣聖物用品的小攤子很感興趣。攤子上可以找到許多漂亮的小玩意兒，供我們男孩子玩扮演神父的遊戲使用：小聖體匣、小聖爵、燭台等等，當然

各式各樣的蠟燭也必不可少。弟弟和我很喜歡玩扮演神父的遊戲。在當時的天主教家庭裡，這樣的遊戲很受歡迎，因為能培養男孩子長大後在彌撒中擔任輔祭，並引導他們走上當神父之路。幾乎在每間玩具店裡都能找到附有小聖爵、聖體匣及其他彌撒用品的兒童祭台，我們家當然也有一個。

不過我們家的兒童祭台不是買來的，而是住在里姆斯廷的叔叔班諾親手做的。這個祭台十分精緻漂亮，令人驚嘆的是還有可以轉動的聖體龕，而酒水瓶和聖爵則是錫製品。在模仿「成聖血」時，我們用的當然是水而不是酒。我們還有一個乳香爐，不過常常一搖晃鏈子就纏在一起。幫母親和姊姊做衣服的裁縫師，還替我們縫製了祭披。她叫吳莉·科芬爾，住在阿紹溪的對岸，通往她家的路是一條羊腸小徑。

她的姊姊叫做范妮，常年癱瘓在床。作輔祭時，我每天跟著神父穿過那條羊腸小徑去為范妮送聖體。神父穿著長白衣和領帶，手上拿著聖體盒。我手持銅鈴走在前面，一邊輕輕搖鈴。迎面碰上我們的民眾知道我們帶著聖體，就在路邊跪下來劃十字聖號。我們每天都會去范妮家送聖體，無論嚴寒酷暑，風雨無阻。冬天的時候，小路上會結一層薄冰，十分難走。阿紹大部分的居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這裡還有好幾個修會團體，他們在修會慶節那天都會盛大慶祝。

搬家後不久，父親買的風琴直接送到了阿紹的新家，風琴送來時我們都高興地歡呼。我到現在還很懷念那架出色的風琴，它有十三個音栓，最特別是還有一條風弦，即低音區的二分音域。音栓則根據相應的音色分為八分、十六分和四分音域。這一切讓我們感到十分神奇，不過我們都還不會彈奏。於是，父親拜託神父替姊姊和我找個音樂老師。神父唯一能介紹給我們的人選，就是還在就讀女子中學的艾爾澤·珀澤爾。

在當時，家境較好的女孩讀完小學後，就會進這類的女子中學繼續升學。艾爾澤每週給我們姊弟各上半個小時的音樂課，教我們基礎樂理，因為更深的樂理她也不懂。父親會給她一點零用錢當作酬勞。艾爾澤的姊姊希爾德和我的姊姊瑪利亞是同班同學，婚後育有五子，其中三個參加了我們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團。我跟他們一家到現在還保持聯絡。

我開始當教堂音樂師的過程，有點出人意料。我們的一位老師，他也是堂區的管風琴師和教堂音樂師。可惜的是，他後來走偏了加入納粹，甚至穿著褐色軍服來給我們上課，最後戰死沙場。當時，不知道從哪天起，他突然不肯再到教堂演奏管風琴。他認為「元首」不喜歡他去教堂，他只能待在學校教書。

我們學校每天早上都有彌撒，神父不希望整台彌撒沒有音樂伴奏，於是他買了一架風琴，詢問我是否可以幫忙

司琴。我學琴已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的演奏技巧足以勝任，就一口答應了。那是1934年，我年僅十歲。每天司琴前，我會先去拿管風琴的樂譜，結果有一天樂譜不見了，我心想這該怎麼辦？最後我決定憑印象去彈。後來，懂音樂的神父告訴我，我完全沒有彈錯。當時我才十歲，就能在沒有樂譜的情況下順利完成伴奏，說實在的，我內心有一絲竊喜。我流暢的演奏令母親十分開心，但父親什麼話都沒說。他的個性內斂，這符合他一貫的做風。

1934年12月20日，阿紹的堂區日誌上記錄著：「一位五年級生」，亦即喬治·拉辛格，「今天為德文詠唱彌撒和拉丁文彌撒伴奏，表現出色。」

長大一些後，弟弟若瑟也開始學風琴。那時，姊姊瑪利亞已經在奧爾修道院的女子學校讀書，年輕女孩可以在那裡學到許多實用的技能，例如速記、記帳、用打字機打字，以及管理家庭財務等。因此，我們跟奧爾修道院的修女很熟。瑪利亞是跟一位修女學彈風琴。後來，母親也把若瑟送去她那裡學琴，每週上一次課，所以弟弟是跟修女學會彈風琴的。

弟弟到神學院讀書後，還學會彈鋼琴。鋼琴當然才是真正的鍵盤樂器，風琴不過是管風琴的初級版。想要精通鍵盤樂器的人，都該先學鋼琴。不過，我們學習的順序卻

是顛倒的。直到1937年我們家搬到特勞斯坦，聽說城郊的英國貞女會修道院要出售一架二手鋼琴，父親於是買下了鋼琴，我們才終於有機會上鋼琴課。

您是主教座堂合唱團的前指揮，您怎麼看教宗的音樂才華？

音樂對我來說比較容易，不過弟弟也有優異的音樂天分。他從音樂中獲得很多歡樂，他的技巧也很嫻熟。學音樂也需要動腦筋，他很快就學會讀譜，並將樂理知識融會貫通，這對培養他開放的思維方式和敏捷的反應能力大有幫助。不過，與我不同的是，他在音樂方面不夠奔放。音樂是我的摯愛，讓我時時充滿熱情，但弟弟則比較內斂，雖然他也很有音樂才華。

2005年，他把鋼琴從樞機府邸運到宗座大樓，真是費了一番工夫。

的確如此。現在，這架鋼琴放置在宗座大樓餐廳旁邊的起居室裡。

他常常彈琴嗎？

他說他很少彈，不過他平時彈的大多是教會的樂曲。馬克斯·艾哈姆（Max Eham）先後當過弗萊辛和慕尼黑主教座堂的合唱團指揮，在弗萊辛期間，他為神學院聖詠團寫過許多歌曲，並結集出版一本詩歌集。那本歌譜弟弟保存至今，經常出現在他的譜架上。他也會彈現在最流行的聖歌，譜架上有時也會出現一些難度較高的琴譜。很可惜的是，自從他的手受傷後（2009年6月17日），他就很少彈琴了，而且年紀越來越大，他的手指也比較不靈活。我也漸漸感受到自己的音樂能力，正隨著歲月流逝不斷退化。

可惜美好的田園生活、拉辛格兄弟看似無憂無慮的童年，只是表面上的平靜，阿紹村也無法躲過這場政治風暴。1933年1月30日，帝國國會議長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帝國總理，這是納粹掌權的標記。「這的確是納粹奪取政權的記號，」若瑟·拉辛格後來在自傳《我的一生》中寫道：「他們從一開始就肆無忌憚地賣弄權力。」

我們搬到阿紹才六個星期，就聽說希特勒當上了帝國總理，大多數的民眾都感到震驚。官方規定，所有小學生要在阿紹村遊行，慶祝「元首」上台。前面提過，阿紹是地勢狹長的村莊，學校和教堂在同一端，我們必須走到村子的另一端再走回來。遊行當天下著傾盆大雨，我們不得

不鼓起勇氣在泥濘中前行，這是多麼可笑的一幕！

父親對那時的政治情勢深感憤怒，同時也憂心忡忡。我們只是從父母那裡得知希特勒非常邪惡，是十惡不赦的罪犯，而「希特勒集團」——他們這樣稱呼納粹主義——也是糟糕透頂。除此之外我們一無所知。村民的反應不一，有些人之前不敢表露自己對褐色煽動者的好感，現在則光明正大投入納粹陣營；有些人則小心應付當前的新危局。幾個納粹黨員成立了納粹小組，不斷向父親施壓，要求他加入納粹黨。父親表明他絕對不會加入納粹黨，但為了不讓我們全家陷入危險，他建議母親去參加納粹婦女組織的活動。

婦女組織的領導人是A女士⁷，她很虔誠，走路時還一邊念玫瑰經。她在行納粹的舉手禮時，手中居然還握著玫瑰念珠！母親參加完阿紹納粹婦女組織的活動後，她會把聚會的過程說給我們聽。她們並沒有評論希特勒，而是相互交換做菜食譜，交流整理花園的經驗，有時還一起念玫瑰經。這是特別例外的「納粹」聚會，跟褐色意識型態扯不上任何關係。

父親的副手警官W先生雖然不是納粹黨員，卻十分急功近利。有一次，他聽說伽斯的一位神父要來阿紹堂區講道，W先生便想趁機抓住他的把柄。當時，警察舉報神父反對納粹就會獲得嘉獎。於是，W先生帶了筆記本到教

7. 為了保護當事人及家屬，喬治·拉辛格蒙席刻意隱瞞他們的真實姓名。

堂，心想如果神父在講道中攻擊納粹，他就可以打小報告作為升官的踏板。不過，我們的本堂神父事先聽說了W先生的預謀，提前提醒那位神父不要講道。當時恰逢四旬期，神父便和教友一起拜苦路取代講道。結果，那位警官不但沒能抓到把柄，還得跟著教友一起跪下十四次、起立十四次。他來這裡是別有用心，大家當然都心知肚明，所以看著他不情願地「起立跪下」，不禁有些幸災樂禍。

對於納粹在1933年奪取政權，若瑟·拉辛格警官有其獨特而明智的反應。他對家人宣布：「現在，就要開戰了，我們家應該有屬於自己的房子。」同年，他花了全部的積蓄——5500帝國馬克，在特勞斯坦附近的胡石拉（Hufschlag）買了一棟建於1726年的老舊農舍。他預計退休後全家可以搬到那裡居住。

不久後，若瑟開始上小學。從那時的一張班級合照上可以看到，他微微彎著身體坐在教室的第三排，眼神有點迷惘。一位目光嚴厲的女老師站在講台，黑板上寫著孩子學的第一道數學題： $1+1=2$ 。新生也開始學識字，黑板上寫的是「噢，我的鼻子」。牆上掛著耶穌苦像，旁邊還有帝國國會議長興登堡和希特勒的照片。

阿紹村的居民分成兩派，大多數的村民對新政府抱持觀望的態度。若瑟·拉辛格至今還記得，自1933年起，希特勒政府發動了對教會學校的鬥爭。在此之前，大部分

的學校都是天主教會興辦的，神父或副本堂同時也是學校的宗教課老師，在課堂上講授教理問答。納粹想切斷學校和教會的聯繫，學校應該完全歸國家掌控，必須宣揚「元首」的意識型態，而非基督宗教信仰。

為了安撫教會，希特勒上台後跟教會簽署了條約，承諾保障教會的基本權利。主教們原本希望藉此避免更壞的情形發生，所以願意和希特勒政府談判。但他們沒有料到，新政府根本沒有誠意遵守這些條約。直到很久以後，主教才開始在牧函中提醒教友新政府的錯謬行為。但事後的發展證明這些努力全都於事無補。

若瑟的老師當中只有少數是虔誠的基督徒，許多老一輩的教師對教會懷恨在心，對神職人員監管學校深感束



1933年的阿紹，剛上一年級的若瑟·拉辛格（第三排右二）。

縛。而年輕的一輩則有許多堅定的納粹黨員。有人甚至試圖改變深受教會禮儀年影響的傳統鄉村生活。他自行發起慶祝夏至節和冬至節，宣稱信仰神聖自然和種族出身的時刻已經到來，相信罪與救贖不過是猶太人老掉牙的觀念，是占領德國領土的羅馬人灌輸給德國人的。現在，打破這外來宗教枷鎖的時刻來到了。

5月1日那天，他叫人立起一棵五月樹。他在自創的祈禱文中，將這棵樹稱為「生命力蓬勃的記號」，代表趕走基督宗教、重拾德國人的信仰。不過，阿紹土生土長的農民都對他不以為然。村裡的孩子則對五月樹上懸掛的沙漠模型更感興趣，誰能先爬上去，模型就歸誰所有。

納粹的勢力也深入小學校園，若瑟很小就得表明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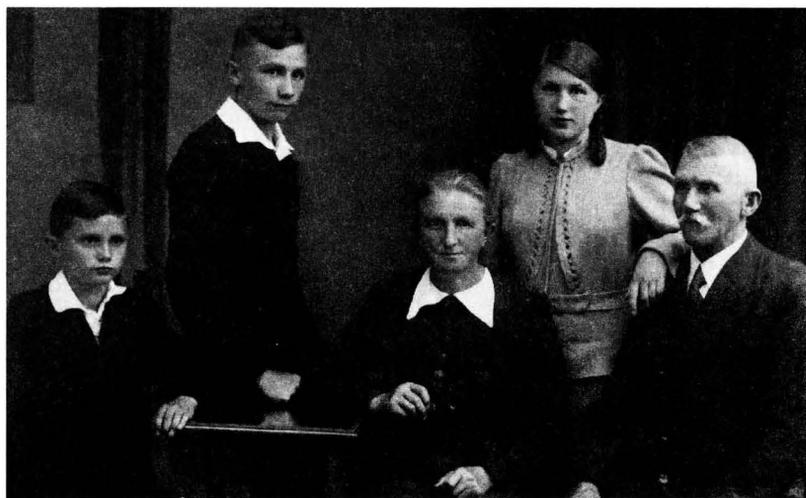


1936年，若瑟·拉辛格初領聖體（第一排左邊第二個）。

的立場，不斷為自己的信仰辯護。好在，他受過嚴謹的宗教教育，讓他能夠堅定地和褐色幽靈劃清界限。

1934年，若瑟·拉辛格開始準備初領聖體。父親送給他一本「邵特」，這是將拉丁文彌撒經書翻譯成德文的信友彌撒經本。這本書是簡易版，希望引導信友認識用拉丁文舉行的彌撒，進入聖事禮儀的奧秘世界。對虔誠的小孩子來說，理解聖事禮儀是一段真實的發現之旅。「探索神祕未知的世界，對孩子和年輕人來說是最美好的事。」若瑟後來這樣描述當時的興奮之情，「透過這種方式，能夠讓他們在聖事禮儀中培養出熱愛之情，而教會真正的核心也能及早奠定根基，並答覆內心的幻想和夢想。」

若瑟在參加彌撒時不僅認真投入，他還越來越希望自



1937年左右，拉辛格全家福。

己也能成為祭台上的一分子。他說：「不參與其中，讓我感到自己似乎被最重要的那部分排除在外。」於是，緊跟著哥哥的步伐，他也成為輔祭。

不知從何時起，鄰近阿紹的冬山上，突然間聳立起一座燈塔。到了夜晚，耀眼的光芒直達天際，就如遠方的閃電一般，昭示著不知名的危險。不久後村裡流言四起，村民紛紛猜測設燈塔是為了偵查敵機。當時，阿紹的上空從沒飛機飛過，更遑論敵機了。空氣中瀰漫著不確定，如同地平線上那烏雲密布的晦暗天空。我們猜測，有個計畫正在暗地裡進行。然而，村民並不願意承認事實。或許父親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納粹打算發動戰爭。



Chapter 5

特勞斯坦

1937-1946年

希特勒上台之後，父親就巴不得能早日退休，要他效忠這個罪犯領導人的政府，讓他的內心深受煎熬。他一心想提前退休，畢竟當初就職公務員時，他是向國王宣誓效忠，而不是向那個「來路不正的惡棍」——這是他對希特勒的稱呼。儘管如此，父親還是在內心交戰中堅持下來，因為堅守崗位到退休日的公務員，將得到一筆幾千馬克的補助，而我們家又亟需這筆錢。他甚至託病休個長假，和若瑟展開幾次長途旅行——此時，我們三姊弟中只有若瑟還留在父母身邊。當時我已經開始上寄宿學校，在特勞斯坦的總教區聖米歇爾小修道院就讀。旅遊時，若瑟常常拜託父親：「爸爸，給我講個故事吧！」我們的父親正好是說故事高手，馬上就能即興編出有趣的故事。故事的開頭總是「從前，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住在……」，場景則是在巴伐利亞森林的某一處。

1937年3月6日，拉辛格警官終於年滿六十歲，可以正式退休。一家人搬到了特勞斯坦附近胡石拉的老舊農舍，這是他在納粹上台後購置的房產，他們租車喬遷新居。時值春光明媚的四月天，院子裡的草地上開滿了報春花。房舍十分簡樸，屋頂鋪設的還是木瓦片，上面壓著沉重的石塊，以免屋頂被狂風掀翻。那時還沒有自來水，他們只能從井裡汲取清水，到了炎熱的夏日，井水甚至會完全乾涸。然而，對年僅十歲的若瑟來說，新家卻有如天堂

一般，他「簡直想像不出比這更美的地方了」。在他眼中，新家的一切浪漫鮮活，充滿驚險與神祕。屋後是一片樹林，清晨推開臥室的窗，特勞斯坦的兩座「標誌性山脈」——霍菲恩山和霍格恩山，就若隱若現地浮現眼前，彷彿觸手可及。若瑟感到十分幸福。

由於姊姊和哥哥都已外出求學，他常常獨自一人待在農舍旁的倉房裡做白日夢，而更多時候，他在那裡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書籍。他在這段時期第一次嘗試寫作，並持續創作了一系列關於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浪漫詩篇。到了週末假期，哥哥喬治從寄宿學校返家，兩兄弟就到院子的草地上踢球、到樹林裡採摘野果或撿拾柴火。

那是一棟十分老舊的農舍，陽台上還刻著建於1726年。房子的前半部是住家，後面則是馬廄及堆放柴火和乾草的地方。一進門，右手邊是廚房，有母親做菜的灶台和我們吃飯的餐桌椅。戰爭爆發後，父親買了一台收音機，他很清楚納粹提供的消息都是漫天謊言。他想知道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這台收音機可以接收到國外的電台，父親把它擺在廚房裡。這在當時若被納粹發現是會遭到嚴懲的，不過父親並不在乎。而對我來說，能用這台收音機收聽音樂節目，才是最重要的。與政治相比，我對音樂的興趣要大得多。

順帶一提，當時可不是只有父親這麼做。戰爭爆發

後，父親續任鄉村警官。有一次，一位同事問他，有沒有收聽PTT電台的節目。這是法國史特拉斯堡的電台，十分客觀中立地報導局勢的發展。後來，父親也收聽法國和英國的軍方電台，出於宣傳目的，這些電台不停向外播送德語節目。實際上，每個對納粹主義持懷疑態度的德國人，都在偷偷收聽這些電台，雖然納粹明令禁止。因為隔牆有耳，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收聽，提防著不被別人發現，並且盡量把音量調到最低，以免引起他人注意。由於納粹想盡辦法干擾，我們接收到的信號總是很差。不過收聽德國電台毫無意義，那都是為納粹宣傳和煽動造勢。父親常常感慨：「德國電台唯一可信的，大概就只有報時了，或許還可以加上天氣預報。」

父親買的這塊地，一頭牲口差不多要耕一天，大概占地 5.6 英畝。我們的房子建在農地中心，前後都有差不多大的院子。前院母親用來種植我們日常所需的香草和蔬菜：豆角、小水蘿蔔，還有草莓，當然，還有她喜愛的花花草草。母親也很喜歡鳥雀，為此我們特地做了一個鳥籠，她會在籠子裡放上一小塊麵包，撒上鳥食，幫助鳥兒度過嚴冬。前院種了梨樹和蘋果樹，結的果子雖然不大，卻很香甜。後院種了幾顆李子樹和櫻桃樹，此外還有一大片草場，父親都從那兒割草。在戰期食物短缺時，他用草料餵養了一隻羊。後來，父親又把收割的草料出售，稍微補貼了我們家的收入。農舍還有一個堆放草料的倉房，我

們兩個男孩子很喜歡爬到頂棚上玩耍，而我們在特勞斯坦養的小貓咪，也時常跳到上面玩得不亦樂乎。

我記得有本書寫我們兩兄弟曾偷抽菸，事實並非如此。弟弟不曾抽菸，而我生平只抽過兩次：一次是我從青年義務勞動軍退伍，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個男子漢都得嘗試抽菸的滋味，於是我抽了一根。攻讀神學時，學校裡有位教授叫做若翰·奧爾，他為我們講授信理學與信理學史。6月24日是聖若翰洗者誕辰慶節，也是他的主保日，那天我們為他獻唱了一首小夜曲，於是教授送給我們每人一支香菸。結果，才吸一口我就咳個不停。我心想，自己一天到晚咳嗽，哪裡還需要再抽菸呢？

但我們的父親很愛抽菸，他最喜歡弗吉尼亞牌的雪茄。當然，他絕不會在上班時間抽，而是在晚上回家後放鬆一下。父親一整天只抽一支雪茄，不斷地掐滅再點燃，好能延長吞雲吐霧的時間。弗吉尼亞牌雪茄價格不斐，他得分成幾次享受。我們兄弟倆則從未抽過雪茄。

特勞斯坦的農舍，是我們真正的家鄉和小小天堂。我們剛搬家不久，就趕上了喬治賽馬節，到現在每年的聖週一仍然舉辦紀念聖喬治的活動。賽馬節當天萬人空巷。先由一隊人馬在市廣場上表演中世紀的劍舞，接著才是騎馬比賽，終點是艾特多夫（Ettendorf）教堂。艾特多夫是胡石拉的鄰村，兩村相距大概十分鐘的路程。市長和本堂神父乘坐馬車，但也有一些神職人員參加騎馬比賽。這是盛

大的節日，也是全城的大事，有多達數百匹裝飾華麗的賽馬和數百位騎師參與盛會。

直到今天，教宗仍然稱特勞斯坦為真正的「故鄉」。在這兒，十歲的若瑟·拉辛格步入了人生的嶄新階段。他開始就讀「人文中學」一年級，人文中學是人文中學的舊稱。從家裡走到學校要花半個小時，不過他並不喊苦，因為他終於「有充裕的時間觀察和思考，還可以在途中複習上課內容」。他非常喜歡拉丁文課。在隨後的歲月裡，他都對自己能夠在「舊式學校系統下嚴格而深入地」學習這門教會語言，心存感恩。成為神學家後，他能夠熟練地運用拉丁文，並閱讀兩千多年以來教會歷史文獻的原稿。課程安排中還有古希臘文這門《新約》原文所使用的語言。這兩門古代語言都是若瑟最喜愛的課程。

更讓他欣喜的是，在特勞斯坦的人文中學，納粹還未像在阿紹公立小學那樣站穩腳跟。若瑟·拉辛格曾兩度親眼目睹校長因不願對納粹屈膝逢迎而遭撤職，這讓他逐漸意識到，古典人文教育以及對古希臘、古羅馬精神世界的探索，與褐色黨員的荒唐理念水火不容。音樂課本中除了納粹歌曲外，也有許多古典曲目，音樂老師翻開樂譜後，立即告訴學生把「猶大死亡」的字眼劃掉，改寫成「困境轉折」。然而，短短一年後，這片精神自由的小島也遭到納粹荼毒。法律規定，帝國內所有的人文中學，都要跟實

用中學一起合併為「高級中學」。此後，古希臘文課程徹底從課表中消失了，拉丁文課程也縮減了，直到三年級才開課。相反的，現代語言和自然科學占了更大比重。隨著新學制普及，學校裡的老師也被大批更換，新來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忠貞的納粹黨員。過不久，宗教課完全刪除，體育課的時間增加不少。

我很難說清楚，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回應聖召而踏上修道之路，因為一直以來我都對自己的使命歸屬胸有成竹。我當輔祭在祭台上服務時，就明白這是我的最終歸宿：現在我是輔祭，以後我要站在神父的位置上。對此我從未有過遲疑，一切就像呼吸般自然。我幾乎從未對選擇這條路有過存疑分辨，因為，我對自己的使命信心百倍。

當然，每位神父接受聖召的過程各有不同。比如我認識的一位神父，他最開始選擇的是職場生涯。當時，他的家鄉正好有位年輕的新神父要舉行首祭。他原來根本不想參加，可是正好有人邀他一起前往觀禮。進了教堂，他先遠遠地站在後排，後來卻被人群擠到前面。到彌撒快結束時，他居然不知不覺已站在祭台的正前方。就在那一瞬間，他突然領悟到自己是屬於祭台的，之後便選擇踏上當神父之路。

在接受聖召方面，沒有什麼「金科玉律」，也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就我個人而言，我的心意堅定，在做

決定時從未有過掙扎。從一開始我就對自己的選擇堅定不移，這是從當輔祭的經驗中培養的。另一方面，我們家一直以來的虔敬氛圍，為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我來說，一切都是那樣自然而然。

我不清楚自己的選擇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弟弟的榜樣。至少，他在決定追隨我的腳步時，能從我身上看到原來人生可以這樣安排。我們沒有直接談論過這個話題，但我可以想像我的堅定對他是股激勵，讓他日後在做決定時更矢志不渝。當然，身處於反基督宗教的時代，也激發了我們的鬥志。現在更是義無反顧地選擇這條路，無論付出何種代價都要忠於聖召的時刻！

早在1935年我們一家還住在阿紹時，我已經進入特勞斯坦的總教區聖米歇爾小修道院讀書。小修道院沒有中學課程，所以我繼續在特勞斯坦的人文中學上課。1937年，若瑟考上同一所中學，不過往後的兩年內他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1939年，若瑟也進了小修道院。弟弟是人文中學最後一屆的學生，在他之後就改制為國家高級中學。

在我就讀的人文中學一年級班上，共有卅八個學生，其中女生只有三位，都是新教徒。這裡的居民多半務農或從事手工業，讓女孩讀中學繼續升學的做法並不普遍。學校的老師大多是老先生，思想保守，信仰虔誠；在那個年代，我們中學還沒有女教師。後來，學校又增聘了幾位年輕老師，其中不乏狂熱的納粹黨員，他們給學校帶



來了不同的詭譎氣氛。我們的新校長也是納粹，他是在老校長因肺炎去世後上任的。不過，大多數老師都不是納粹，並與小修道院保持良好關係。

那時人文中學的學年分為三個學期，不像現在是兩個學期。新學年是從復活節開始，復活節之後我們要上三個月的課，再來便是漫長的暑假——我們稱為「大假」。九月到聖誕節是第二學期，之後放聖誕節假期，假期過後開始第三學期的課程。直到後來，學年的開始才改到秋季。

新學期開始，學校舉行升旗典禮。全體學生在旗杆下呈方陣形列隊，代理校長先慷慨激昂地發表一段納粹演講，之後，升旗儀式正式開始。我們合唱德國國歌之前，



1940年學校遠足，若瑟·拉辛格（第二排左四）在團體活動時有一絲拘束。

學校的音樂師會先起音。他先行「德意志禮」，然後伸開雙手指揮我們演唱，旗杆下則由一個旗手負責升起帝國的國旗。這一幕場景，真是難以形容的荒唐。到了學期末，就把國旗降下來。

我們的代理校長 K 先生，也是我們的數學老師。他是薩爾州人，個子矮小卻有個啤酒肚，我們便給他取綽號叫「大肚凱利」。他是個虔誠的教友，卻又是堅定的納粹黨員。我到現在都無法理解，他怎麼能把這二者融為一身。升完國旗後，他會行納粹禮向元首肖像致敬，這時候他常常語無倫次：「向我們親愛的、摯愛的、敬愛的元首阿道夫·勝利。啊，不對！應該是向我們敬愛的、摯愛的元首阿道夫·勝利……」正確的說法是：「阿道夫·希特勒，勝利萬歲！」但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辦法完整念出這段話，他只要一開口，「阿道夫·勝利」便脫口而出。我們在台下忍得很辛苦，才能不笑出聲來。

我畢業之後，有個慕尼黑希特勒青年團州指揮部的納粹頭頭，時常到我們學校視察，並多次對學校的保守立場大肆批判，讓人十分反感。

在人文中學讀書時，我上過拉丁文課。我們的拉丁文老師 K 博士是研究古語言學的學者。他的兒子後來成為神父，在特勞斯貝格當了很久的本堂神父。這位 K 博士很喜歡在課堂上大談政治話題。我們便善用這一點，常常在他的課堂上提問戰事動向，然後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地發

表高論。我們當然不是對政治感興趣，只是為了讓拉丁文課的時間快點過去，好讓他沒時間檢查我們的家庭作業。

再講講週六。原本我們不必在週六上課，可是不久後，學校開了新課程「納粹思想課」，而這門課偏偏排在週六。學校的老師每週輪流講一個有關納粹的主題。我還清楚記得，有位十分正直保守的老師：阿姆貝格的馮納爾，他堅決不肯與納粹同流合汙。輪到他給我們上課時，他選擇了《論國外德僑協會》作為講授主題，這是海外德國學校的聯合會，他自己也是會員。協會成立於1908年，當然跟納粹毫無關連。

另一位老師每次都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話題，而且老是用制定「一戰作戰計畫」的參謀總長施里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 1833-1913年）的臨終遺言作為結語：「要確保右翼強大！」納粹思想課基本上就是這樣。上完課後，我們還要到運動場上做體能訓練，確保每個學生的體能都符合作戰要求。

弟弟一直以來都是優異的學生，成績比我還好。在我1942年被迫服兵役後，有一次母親寫信告訴我，他在人文中學全校排名第三。只有「體操課」——當時我們對體育課的稱呼，不是他的強項，他的體育一直很差。此外，繪畫課他也不在行——當時我們稱藝術教育課為繪畫課。因此他只能「屈居」第三，而在人文和自然科學學科方面，他一向是最優秀的。

說實話，我們十分討厭體育課。父親常講他在帕紹當兵的經歷給我們聽，那時士兵必須練習頭肩翻滾來加強體能訓練。他評論說：「在農村時，我們常常得下田幹活，那麼重的粗活都沒把我累垮，現在我來到帕紹，卻要練習什麼頭肩翻滾！」父親的經驗，讓我們徹底對體育喪失興趣。我們兄弟兩個本來在體育方面就缺乏天分，如今再加上發自內心的厭惡，體育成績不好，也就在所難免。

1939年初，哈斯拉赫（Haslach）的神父布魯姆（Stefan Blum，胡石拉隸屬於他負責的堂區）推薦十二歲的若瑟進入總教區的小修道院讀書，真正接受有系統的培育，進入修道生活。這讓若瑟十分興奮。他的哥哥已經在寄宿學校裡讀了四年，每次回家都會給他講述小修道院生活的種種優點。若瑟也已經跟好幾位小修生成為好朋友。

然而，對若瑟的父母來說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因為這代表全家要承受更大的經濟壓力。父親的退休金僅僅夠用而已，為了補貼家用，母親只好在度假旺季到溫克爾雷特（Reit im Winkl）一家旅館的廚房工作。好在姊姊已經中學畢業，也完成了女孩法定的農業義務年，開始在特勞斯坦一間大商場裡當職員，才稍微緩解拉辛格家的經濟壓力。

若瑟·拉辛格後來回憶說，由於全家人一起勤儉度日，家中凝聚了「團結友愛……讓我們全家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家人的共同犧牲下，1939年復活節過後，新

學年的第一天，4月16日，若瑟就進入特勞斯坦的總教區聖米歇爾小修道院就讀。這所小修道院是十年前由福爾哈貝爾樞機創辦。

1939年3月4日，在父親老拉辛格交給修道院的推薦信上，特勞斯坦人文中學的參議教師珀萊恩（Hubert Pöhlein）盛讚小若瑟「聽話、勤奮且可靠」。凱勒醫生（Paul Keller）開具的醫生證明裡，強調「孩子的飲食和體格狀況」已有「大幅改善」，雖然體重較輕，但健康狀況良好。在入學考試中，若瑟以宗教課1分、閱讀課1-2分、語文1分、正字法2分、寫作1分的成績順利通過。老拉辛格每月的退休金是242德國馬克，經過精打細算後，他估計自己每年可以提供兩個兒子700德國馬克，於是兄弟倆的學費支出就限定在這個預算內。

家庭中兩個兒子都選擇修道生活，實際上並不罕見。我一生中就碰過好幾個例子，比如慕尼黑聖方濟各教堂前任的本堂神父瓦莫丁爾就是一例。他出生瓦澤堡，父親是當地送麵包的司機，他的兄弟也當了神父。我還記得，有一次特勞斯坦的聖奧斯瓦爾德教堂請我們修道院的合唱團在彌撒中獻唱，因為他們本堂的聖詠團要去昂爾演唱，那裡有兩兄弟要一起舉行首祭。由此可見，一家幾個兄弟都當神父、姊妹都做修女，這種情形在當時很常見。然而，對我們父母來說，這代表要扛起龐大的經濟壓力。

也因此，我們的母親得在度假旺季到溫克爾雷特當廚師貼補家用。「你要好好照顧小若瑟！」她在我們出發前仔細叮囑我，因為弟弟對寄宿學校的團體生活十分陌生，很不適應。

寄宿學校的生活並未對我造成太大的影響，我從一開始就在這裡找到歸屬感。若瑟卻不怎麼喜歡團體生活，更確切地說，他一點兒都不喜歡這裡。不過，今天連他自己都承認，寄宿學校的生活其實讓他獲益匪淺。因為如果他一直住在家裡，極有可能變得性格孤僻、離群索居。寄宿學校的團體生活雖然讓他有些不適應，並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價，但他在這裡接觸到團體生活，也學到了在別處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學會的寶貴經驗。

這是他迄今人生中最大的轉折。年幼的若瑟·拉辛格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寄宿學校的生活。「在家裡的時候，我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學習和生活，隨意構建自己的童年世界，」本篤十六世寫道，「但現在，要跟六十個同學一起待在大自習室裡讀書，真是無比的折磨。原本學習對我是輕而易舉，突然間變得難上加難。」對熱愛自由的他來說，一下子要跟六十位同伴共用一間大寢室，更是前所未有的經歷。「我非常不習慣這裡的束縛，必須努力讓自己適應這裡的模式，這對我是極大的挑戰。」他如此承認。



修道院對修生的時間安排有嚴格的規定。起床時間是五點二十分，現代人實在很難想像。梳洗穿衣後，我們就開始準備五點四十分的彌撒。修道院全體修生都要參加清晨的彌撒。

那時候，神父面向正祭台舉行彌撒。正祭台上方的油畫蔚為壯觀，畫的是耶穌遺體從十字架上被取下來的場景，可惜不久前發生火災全燒毀了。此外，兩側各有一個祭台。修道院由五位神父一起管理：一位院長、三位導師及一位輔導神師。所以，除了正祭台外，我們也可以在兩側祭台舉行彌撒。由於每位修生都要上前恭領聖體，彌撒進行的時間總是很長。



這間大寢室讓若瑟·拉辛格受到「前所未有的束縛」。

清晨彌撒後，我們開始上早自習，直到七點十分，接著是早餐時間。早餐後，我們收拾好書包，於七點半下樓集合。五分鐘後，全修道院九個班級的學生，排成兩列前往學校，八點鐘正式上課。

上午的課程結束，我們先吃午餐，之後要到運動場鍛鍊，但我對運動一直提不起興趣。供我們選擇的體育項目種類繁多，除了踢足球被禁止外，我們可以玩手球、獵兔球、推球等各種球類遊戲。

到了下午三點，我們要到大自習室念書。四點整，會有短暫的休息時間，有咖啡和小圓麵包可以享用。四點五十五分，我們開始為主課做準備，七點則是晚餐時間。之後，我們終於輕鬆了，這時我們通常在大自習室裡玩打彈珠遊戲或下棋，不過也常常閱讀書籍。

八點五分是誦讀聖言時間，八點二十分，大家集合去小堂晚禱。每逢此時，漆黑一片的小堂裡迴盪著修生們的祈禱聲，很有虔敬氛圍。晚禱結束，一位導師會走上前為修道院的全體學生降福。然後，我們要在一片靜默中返回寢室。那是很大的公共寢室，每間容納42個床位，這在今日簡直不可思議，不過我們當時從未有過抱怨。睡在寢室下鋪的一向都是兩位高年級的修生，以防夜裡發生意外，或有人需要幫助。寢室裡徹夜都點著一盞深紅色的小燈。

走廊上，每位修生都有一個內務櫃。在自習室裡，每人書桌上立著一個閱覽架。我們也有自己的儲物櫃，用來



存放我們從家裡帶來的食物。我在修道院的前幾年，弟弟每次從家裡回來，都會幫我帶母親為我準備的點心。

對我來說這樣的生活還不賴，我很快就在修道院交了許多新朋友。但對弟弟來說，卻是非常嚴峻的考驗。在人文中學，我們修道院的修生占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自成一體。剩餘三分之二的學生則是跟父母同住，每天通勤上學。他們當中不乏頑固的納粹黨員，兩派學生之間難免時有摩擦。

我還清楚記得1940年，我們去當時已作為鄉間寄宿學校的提特摩寧城堡郊遊。那時幾個納粹黨員唱起了嘲諷教會的歌曲，因此引發激烈衝突。我們幾個修生團結在一起，同他們據理力爭，若不是老師及時趕到，吵架就快演變為打鬥。過來調停的老師也是納粹黨員，不過他想表現公正的一面。我們深知自己是納粹的眼中釘，也時常有切身的體會。

1936年12月1日頒布《希特勒青年團法案》後，所有年滿十四歲的男孩都必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1939年3月25日《第二執行條例》公布後，國家可以不顧家長的意願強制執行法律規定。此後，就有了「希特勒青年核心團」和「希特勒青年義務團」的區分：前者指之前自願加入的團員，後者則是因為法律被迫加入的團員。與「核心團員」相比，「義務團員」沒有配備制服，他們也因此淪為

了德國年輕人中的二等公民。女孩則必須加入「德國女青年聯盟」。為了在形式上履行法律義務，避免違法受罰，修道院為所有屆齡的修生報名參加希特勒青年團，喬治·拉辛格不得不成為青年團團員；兩年後，若瑟也躲不過這一規定。

早在1938年，我們就由修道院出面報名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然後按照年級分到各個小組。這是人人無法逃脫的法律，如果修道院不遵守就會面臨整肅。直到戰事爆發，修道院被迫關閉且徵充為戰地醫院後，情況才有所改觀。此時，全體修生各自返家與父母或親戚同住。這樣一來，希特勒青年義務團形同瓦解，徒留一紙空文。我們當然不再覺得有參加青年團活動的義務。

1938年8月9日，巴伐利亞教育文化部下達一條命令：今後只有參加希特勒青年團活動的學生，才有資格減免學費。雖然若瑟·拉辛格警官的退休金每月只有微薄的242德國馬克，他卻沒有為了獲取這項優惠而讓兒子參加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

我們鄰居家的孩子阿爾伯特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團長。他的母親總是遊說我們的母親，快點讓喬治及若瑟跟著阿爾伯特參加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這樣就能減輕家裡

的重擔。不過，父親不同意，我們也不願意，雖然減免學費可以大大緩解我們家的經濟壓力。此外，前面提到的那位校長兼數學老師，他是堅貞的納粹黨員，他也希望弟弟參加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憑此獲得減免學費的資格。無論如何，我們得承認他是出於好意。但弟弟堅決地對他說：「不要，我不會這樣做。」那位老師雖然是納粹的忠實信徒，倒也沒有為難弟弟，只回應說：「那就這樣吧！」從此，若瑟就不必再參加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了。

在席瓦德的一次訪談中，教宗本篤十六世曾就此事解釋道：「一離開修道院，我就再也沒有參加過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這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在當時迫切需要減免學費，卻必須拿到希特勒青年團開具的證明才有這項資格。幸運的是，我遇到一位通情達理的數學老師。他也是納粹，卻十分耿直。他勸我說：『哪怕為了減免學費，你也應該去參加幾次青年團的活動。』當他看到我百般不情願，就說道：『我能理解你的做法，我會處理好這件事。』之後，我就被免除了參加青年團活動的義務。」

英國媒體大肆宣揚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拉辛格」，純屬無稽之談，這一點可由《法蘭克福彙報》尋訪到的幾位特勞斯坦耆老來做見證。施密特（Joseph Friedrich Schmitt）當時雖然是實用中學的學生，卻在校園裡和若瑟·拉辛格結識，他回憶道：「特勞斯坦修道院的修生被

免除參加青年團活動的義務，這是很有可能的。」要知道這些未來的神父本來就被納粹視為眼中釘。

米特海特爾（Franz Mitterreiter）不久前過世的兩位兄弟：阿羅伊斯和路德維希曾與拉辛格兄弟一起就讀於修道院。他證實說，通勤生規定參加希特勒青年團活動的次數，不過一兩次而已，之後也不是非去不可。更何況納粹黨員根本就不希望修道院修生加入，他們認為修生會暗中反抗，削弱其他團員對納粹政權的信仰。

在修道院中，我們還經歷了教宗庇護十一世（1922-39年）逝世，以及庇護十二世（1939-58年）當選為繼任者。我們童年時都是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位，這是我們生平第一次經歷一個宗座時代結束，以及新的宗座時代開始。我還清楚記得當時的情形：某個主日清晨，一位很懂電訊的導師，用他的收音機接收到羅馬關於新教宗的報導，並用自習室裡找到的喇叭播放給我們聽。大家都對這消息很感興趣，個個聽得聚精會神。

我們修道院的邁耶爾院長（Johann Evangelist Mair）是備受敬重、文化學養很高的神父，他曾在電話中向我們的本堂神父預告，教廷國務卿巴契利（Eugenio Pacelli）將當選為新任教宗。本堂神父不相信，兩人便打賭。結果當然是校長贏了，這讓他在我們中間的聲望如日中天。事後他為我們解析，巴契利學識豐富、睿智能幹，由他當選實至

名歸。校長可能是在教宗庇護十二世擔任駐德宗座使節時認識他的——他起先被派駐慕尼黑，後來又到柏林。我們對新教宗懷著極大的崇敬之情，認為他是伯多祿職位的正確人選。

1939年9月，戰爭爆發的直接後果，就是我們的修道院被軍隊強行徵用，於是我們回家住，每天再到學校上課。我並不清楚那時是否有傷患被送來特勞斯坦治療。不管怎樣，幾個月之後軍隊歸還修道院，我們便回到那兒生活。但沒過多久再度被徵用，我們則分散到新的住處，有的搬到斯巴茲（Sparz）的前英國貞女會學校，我們當中約有二十個修生搬到瓦京（Waging）的神父那兒，他有一間閒置的大宅，之前曾有神父團體在此靜修。這段期間越來越多教會房產被納粹強行徵收，一開始他們還暗著來，後來則明目張膽。

若瑟和喬治搬到前英國貞女會女子學校居住。納粹關閉這所修院學校後，房子就閒置下來。對若瑟來說，新的寄宿學校最明顯的優點就是沒有運動場。學生午後在廣袤的森林裡漫步，或在附近溪水旁玩耍當作運動。他們搭起攔截溪水的堤壩來捕捉魚蝦，若瑟很喜歡這類活動。於是，他漸漸融入團體生活，並且承認團體生活中的付出與收穫，讓他在往後人生中獲益匪淺。

若瑟逐漸融入修道院的生活，結交了許多好朋友，也很喜歡與他們一起活動。一切不再那麼難以忍受，雖然跟住在父母身邊相比，寄宿學校的生活確實比較艱辛。

拉辛格兩兄弟在動盪的環境中努力學習。1938年初，希特勒的軍隊占領奧地利，往後七年這個多瑙河流域的國家臣服於第三帝國。希特勒上台之後，遭到封鎖的德奧邊境重新開放，兄弟倆又可以暢通無阻前往薩爾茲堡。他們因此接觸到莫札特的音樂，這對兩人此後的人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實際上，我們接觸到莫札特的時間非常晚。以前學風琴和鋼琴時，我們幾乎沒彈過他的作品。直到在特勞斯坦的節慶彌撒中聽到他的彌撒曲，以及從收音機聽到他的作品後，我們才對莫札特稍微有點印象。

不過，我們真正與莫札特相遇，是在我們又能前往奧地利旅行之後，即所謂的「結盟」之後。我們一直很喜歡到薩爾茲堡旅行，常常全家人一起前往佩萊恩「憂苦之慰」聖母顯奇蹟像朝聖，我們通常會待到傍晚參加彌撒。之所以提到佩萊恩聖母，是因為莫札特著名的《加冕彌撒曲》的首演，正是為了慶祝這裡的聖母顯奇蹟像加冕。1939、1940年間，慕尼黑主教座堂合唱團在薩爾茲堡的莫札特大學演唱莫札特的《安魂曲》，這是我們首次聆聽

莫札特的音樂會。當時的樂隊指揮是國家劇院指揮查林格（Meinhard von Zallinger，1897-1990年），他後來在慕尼黑小有名氣。整場音樂會我們聽得如癡如醉。

1941年，為紀念莫札特逝世一百五十週年，薩爾茲堡將這一年定為「莫札特年」。那時，聽說施雷姆斯（Theobald Schrems）帶領的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團將前來獻演，我當然不想錯過這場演出。主教座堂合唱團實際上很少演唱莫札特的曲目，因為他的作品大多需要樂器伴奏，而合唱團多是無伴奏合唱。我騎車到薩爾茲堡，提早買好了我和若瑟的門票。演出前一天，若瑟和我騎車過去，投宿一家叫「老虎」的旅館，當時的住宿費是三塊半德國馬克，含早餐。在今天，這價格實在便宜得令人難以想像，但當時對我們可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我們聆聽了合唱團精彩絕倫的演唱，時至今日我仍對當天的曲目記憶猶新。合唱團由莫札特大學的一位音樂家指揮，演唱的是莫札特《安魂曲》的部分樂章。幾個男生還表演了喜劇風三重唱，當然，唱腔旋律經過了簡化處理，因為這裡面著實有幾個高難度的段落。音樂如此美妙，我們情不自禁陶醉其中。當時的我根本沒料到，廿三年後我竟然能成為這知名主教座堂合唱團的指揮。不過，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

我們後來又到薩爾茲堡聆聽在聖伯多祿教堂演出的莫札特《C小調彌撒曲》。現在這間教堂在特定節日也會有

同樣演出。這場演出把我們兩兄弟帶入一片全新的天地，讓我們深受感動，沉醉不已。在阿紹和特勞斯坦都不曾舉辦類似的音樂會，欣賞這類音樂就好比發現新大陸。這場音樂會精彩詮釋出音樂大師的經典作品，我們生平第一次聆聽如此高水準的演出，心中難以忘懷。也因此，莫札特直至今日仍是弟弟最喜愛的作曲家。他對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例如巴赫精彩的《受難曲》和《H小調彌撒曲》、海頓傑出的彌撒曲也推崇備至。不過，莫札特自始至終最深獲他心。

約莫同一時期，若瑟開始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在人文中學的德文課上，我們閱讀了許多文學大師的經典作品，激發了他對文學的愛好。除了閱讀課堂上必讀的書外，他還懷著極大的熱情大量閱讀課外讀物。他對雷克拉姆出版社所出版的一系列名著最為喜愛，最薄的那本只要45塊芬尼就能買到。當時，弟弟最喜愛的作家是施托姆（Theodor Storm），我們也都很喜歡他。弟弟讀過他的《木偶戲子保羅》、《白馬騎士》及其他有趣的作品⁸。他喜愛的另一部作品是默里克（Eduard Mörike）創作的《莫札特在往布拉格路上》。希勒不怎麼合弟弟的口味，對他來說，希勒太過於激情澎湃。不過，弟弟十分欣賞歌

8. 北德作家施托姆（1817-88年）來自胡蘇姆（Husum），他是詩人和作家，以創作帶有北德色彩的現實主義市民小說和散文著稱。他最後也是最出名的一部作品——《白馬騎士》，時至今日依然深受德國中學生喜愛。

德。說實話，我直到後來才知道，他在這段時間已經開始嘗試創作。

1940年希特勒歡慶巨大勝利之時，德國上下都亢奮不已。然而，老拉辛格依然固執己見。他說，希特勒的勝利，絕不等同於德國勝利。這只是反基督者的勝利，他必把所有人民都帶往末日。一年後的某天，若瑟的班級在附近的湖上泛舟時，傳來了德軍進攻蘇聯的消息。惡夢似乎要成真了。現在，連小若瑟也深信希特勒必像拿破崙一樣，在俄國廣袤無垠的國土上一敗塗地。

父親認為希特勒徹徹底底反對基督，儘管當時他並沒有明確地這麼說。他沒有料到希特勒會勢如破竹，接連勝利。後來他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波蘭僅僅數週就全面淪陷，隔年初法國也潰不成軍。父親本來對法國寄予厚望，法國淪陷尤其讓他難以置信。畢竟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修建了馬其諾防線，這是精心設計的防禦工程，號稱固若金湯，法國人也堅信在德軍面前絕對安全無虞。然而，向來肆無忌憚的希特勒朝和平中立的比利時進軍，繞過馬其諾防線突襲法國。我們開始擔心希特勒會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這事絕不能發生，後果更令人無法想像。

當時，家家戶戶每到晚上必須遮蔽窗戶以防空襲，我們都切身感受到眼下正是戰時。納粹規定，房屋裡絕不允

許透出燈光，還發放遮蔽燈光的紙張。到了晚上，我們必須用橫條把紙固定在每扇窗戶上。納粹會嚴格監督，確保沒有燈光透出來。

此外，納粹開始發放「配給券」。民眾不能再照個人需求購買食物，每個有登記戶口的民眾，只能憑券購買配給的定量食品，油、肉、糖和麵粉都精算配給，人民必須設法度過食物短缺的難關。幸好父親和特勞斯坦近郊的幾個農民關係不錯，他常常騎車去那裡買糧食，我們因此不必餓肚子。

戰爭的陰霾也日益逼近薩爾察赫河谷。越來越多傷兵從前線送回特勞斯坦，教堂時常為陣亡士兵舉行追思彌撒。不久後，拉辛格兄弟在人文中學認識的青年，也陸續出現在陣亡名單上。戰地醫院需要擴建，於是修道院的修生只好再次返家。1942年夏天，喬治·拉辛格首先被徵召加入青年義務勞動軍。

慶幸的是，在青年義務勞動軍裡，他們並不知道我們是修道院的修生——我們在這裡只是「勞役」。軍營有一半是巴伐利亞中學畢業生，另一半是斯洛文尼亞人，他們只有幾個人略懂德語。我們被編成十六隊，每隊都安排一個會講上幾句德語的斯洛文尼亞人來管理。我們服役的地點是蘇台德地區的瓦騰堡（Wartenberg am Roll）。當時，



我們接受的第一項任務是：「用勞力和鐵鍬」修建一個運動場，偏偏又是運動場！

每天我們都要手持鐵鍬進行特別操練，即「鐵鍬集訓」。這有一套流程，即用這種原始的勞動工具來做軍事操練。鐵鍬必須擦得一塵不染，最好能夠拿來照鏡子。若鏟面或木柄上沾上一點灰塵或一小塊泥巴，就會被看成犯了滔天大罪，立刻受罰。操場上傳來一聲聲口令：「立正！抬起鐵鍬！高舉鐵鍬！把鐵鍬扛到肩上！握住鐵鍬！亮出鐵鍬！放下鐵鍬！」就像一般軍隊裡操練武器一樣。所有動作必須一氣呵成，整齊劃一，看起來就好像在用擦得閃閃發亮的鐵鍬表演。為了讓操練鐵鍬的儀式更精彩好看，我們還得接受特殊訓練。每逢長官來視察軍營，我們就得表演這一套。一兩百人整齊劃一地把鐵鍬扛到肩頭再放下來，雖然愚蠢至極，卻是一場吸睛奪目的表演秀。

在蘇台德地區的集訓，只是為我們投身戰場奏響悲傷的前奏。1942年11月，我好不容易獲准返鄉度假，結果短短兩週後就被召回。家中一片愁雲慘霧，我也感到傷心難過，親友更為我要上戰場而憂心不已。我們全家心知肚明，這著實不是一樁好事。軍人一旦上了戰場就身不由己，而我現在卻要聽命於那個令我滿心厭惡的領袖。

我先到歐伯阿瑪高（Oberammergau）服役，我對那裡出名的《受難劇》印象深刻。在那裡當兵，至少父親和弟弟還能來探望我。我第一次舉槍做射擊訓練，就打出最好

的成績，讓同袍對我刮目相看。但後來我的表現平平，因此第一次的好成績不過是憑運氣。

後來我們被派往荷蘭。每個士兵都配有一輛自行車，我們得天天騎車去沙丘旁操練，結束後靴子裡常常都是沙子。我們連隊有養馬，有一次我被派去運送馬匹，這算是一種處罰。我們機槍連的長官規定士兵要把手中的武器擦亮，哪怕沾上一粒沙都不行，還會嚴格檢查。1943年基督升天節那天，長官認為我的武器擦得不夠亮。於是，我跟那些同樣沒過關的同袍一起負責運送馬匹。

那天清晨，我們先搭火車從萊頓（Leiden）趕到阿爾芬（Alphen），之後我們被帶到一個臨時馬廄。直屬長官，也就是管理我們的下士，挑了幾匹馬給我們。每個人手中都被強行塞進兩匹馬的韁繩，我也不例外。接過韁繩後，我立刻有種不舒服的感覺，因為我一個很要好的鄰居，前不久才葬身於馬蹄之下。我可不想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

我們有卅五名士兵，要趕七十匹馬，長官下令出發後，大家必須井然有序走出馬廄。我的馬兒大概很快就察覺到這些馬夫不怎麼有體力，於是趁機搗亂，多次想跑到路旁有新鮮牧草的田裡。下士發現後狠狠呵斥了我一頓。結果他立刻被馬踢了好幾下。我不由心中竊喜，這還真是報應。

我們終於快回到萊頓了。大概是嗅到城市空氣的味

道，我的馬兒開始朝馬廄狂奔，超越走在我們前頭的每一匹馬，我也不得不快跑緊追在後。我們出發時明明排在最號，結果反而最早回到兵營。看到這一幕，同袍忍不住哄堂大笑。

過不久，我們又轉戰到義大利，一開始在西部拉斯佩齊亞旁的利古里亞海岸，隨後遷到卡西諾山附近的福爾都堡。卡西諾山上矗立著那座舉世聞名的本篤會修道院，德軍在那裡建立了防線，我們持續不斷遭到英美聯軍轟炸。

1944年2月15日，盟軍居然轟炸卡西諾山上這座建於529年的修道院，他們推測德軍在修道院裡布下陣地。事後才發現，這是後果嚴重的大錯；德軍總指揮兼陸軍元帥凱塞林（Albert Kesselring）當時異常堅決，反對用這座獨一無二的文化古蹟來作戰。在那次盟軍的轟炸中，有二百五十餘人喪生，大多是修士和前來修道院尋求庇護的難民。

我們到達卡西諾山區時，著名的修道院已經變成一片廢墟。美軍在聶圖諾附近修建了橋頭堡，避免德軍的主防線更快向羅馬挺進，因此我們的戰壕經常腹背受敵，彷彿置身人間煉獄。頭頂上轟鳴不斷，天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一次我們聽說美軍將要發起進攻，我軍必須從陣地撤退。當時，我們一個個趴在地上，相互距離大約四五公

尺。突然間，我發現身旁的士兵動也不動。我仔細一看，才發現他的腰部血流不止陣亡了。我們不得不起身撤離，每個人都隨身攜帶武器、彈藥袋及其他裝備。美軍開著坦克緊追不捨，我們則是徒步行軍。

抵達羅馬後，我們終於可以在聖伯多祿大殿門口喘一口氣。士兵個個精疲力盡，儘管如此，我仍然很想到這座莊嚴的大殿裡祈禱。可惜士兵不准進入教堂，我也未能如願。上面傳來命令，我們必須繼續前進，先經過卡西亞大道，再從那裡撤出羅馬城。我們一踏出羅馬，立刻傳來當地居民的歡呼。羅馬民眾對美軍到來及德軍撤離興高采烈，不過我們沒有理由怪他們。

弟弟後來給我講述著名教會史學家葉丁（Hubert Jedin，1900-80年）教授戰時的經歷。他的母親是猶太人，因此他逃到梵蒂岡尋求庇護。在德軍占領羅馬的九個月中，他不敢踏出梵蒂岡半步。他親眼目睹德軍徒步撤離羅馬、美軍開著坦克在後面追擊的全部過程。當時，德國士兵個個疲憊，士氣極其低落。民眾可以據此預測德軍失敗而結束這場戰事。

穿過卡西亞大道，我們抵達了波爾塞納城，這是拉提姆地區的一座小城，位於羅馬北部。中世紀時，這裡曾發生著名的基督聖體聖血奇蹟。

1263年，有位波西米亞神父到羅馬朝聖，他在聖克

麗絲汀教堂做彌撒時，突然懷疑起基督是否臨在聖體中，懷疑酒和麵餅是否真的轉變為基督的聖血和聖體。就在他擘開聖體的那一瞬間，突然有鮮血流出，滴到祭台上。神父立刻帶這塊沾染血跡的九摺布向教宗呈報這個奇蹟。現在這塊九摺布保存在奧爾維多的主教座堂裡。隔年，教宗烏爾班四世（1261-64年）正式訂立了聖體聖血節。

1944年6月12日，我們同美軍在波爾塞納展開小規模戰役，企圖阻止他們進攻的腳步。作戰時，一顆炸彈突然在我身邊爆炸，我的胳膊被猛烈地向上撕扯。我仔細一看，右上臂汨汨冒出鮮血。我趕緊彎曲手臂，感謝天主，我的手還能動。儘管如此，我還是十分擔心造成殘疾再也不能彈琴，這令我萬分沮喪。我匍匐前進到紅十字會的坦克旁，忍著巨大疼痛費力爬進去，請求他們帶我去治療。一位戰地醫官剪開我的袖子，我的胳膊沾滿血跡，他一開始找不到傷口到底在哪裡。後來，他終於找到了子彈射入的創口，又在另一側找到子彈穿出的地方。顯然，我的胳膊被猛烈向上撕扯的那個瞬間，正是被敵軍的子彈射穿。「這漂亮的一下子，正好可以送你回家。」醫生略帶嘲諷，為這個不算嚴重的傷口下了定論。

他說得對。經過數次遷移，我搭乘一輛運送傷兵的軍車到了羅斯海姆的傷兵聚集處。在那兒，我親眼目睹戰爭給這一代青年帶來的巨大創傷。很多人都在戰爭中傷殘，

不得不接受截肢手術。幸運的是，我們在那兒遇到一位通情達理的主治醫生。他也在戰場上受過傷，隨後被送到戰地醫院。在醫院治療的那段時間倍感孤獨，這位醫生願意盡量滿足每個傷者的願望。他問我想去哪裡時，我當然趕緊回答說：「想回特勞斯坦。」於是，我這傷兵被轉到特勞斯坦的戰地醫院，也就是我之前就讀的修道院。

在此期間，1944年7月20日，爆發了刺殺希特勒的行動，但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依然熱切企盼戰爭早日結束。然而，現實的發展總是無法盡如人意。不過，我在特勞斯坦最起碼暫時擺脫了戰爭的勞累，可以好好休養。不久後，我的手恢復到運用自如的程度，讓我鬆了一口氣。修女們悉心照料我的飲食起居，除了配給的食物分量外，還偷偷塞給我額外的營養補給品。我每隔十天就能看到新的體溫變化表，上面也有體重紀錄。聽說短短十天，我就重了十公斤。起初我還深信不疑，後來才知道是磅秤壞了。無論如何，我在當年的修道院度過一段美好時光，很快就恢復體力。

後來，我被分派到康復士兵連隊，先到布拉格，又被送到捷克。我們每天都要伐樹，再切成小段。當時我們開玩笑說，這不過是在為捷克人生產廉價柴火，結果真是如此。康復士兵連隊進駐波西米亞西部的一座小城時，我們聽說上頭要派我們到南斯拉夫打游擊。幸好司令副官及時阻止，把我們送回先前待過駐守在義大利的德軍部隊。我



被派往伊莫拉地區，擔任無線電話務兵。我白天都待在防空洞裡，等到夜幕降臨，就得趁黑夜掩護，出去維修壞掉的電話線路。這是十分危險的任務。

我們的陣地駐紮於波隆納省的多扎。那裡簡直就是可怕的人間煉獄。德軍駐守在大壩山北側，美軍則從南側朝我們開火，就等於在我們頭頂岩石背後朝我們掃射，一陣槍林彈雨過後，有大量小碎石塊傾瀉到我們頭頂上。不時傳來石塊崩裂的聲響，揚起一陣陣煙塵，而美軍一停火，我們就得抓緊時間鞏固戰壕。

1945年4月15日，美軍突然停止炮火，改向我們投擲磷燃燒彈，整個山坡陷入一片火海。四周的灌木叢、樹木都在熊熊燃燒。第二天，到處陷入死寂，瀰漫著陰森恐怖的氣氛。恍惚之間，我們還以為戰爭已經結束。然而，馬上傳來一波波美軍讓人心驚膽顫的吶喊，他們持刺刀衝進我們的戰壕，把我們一個個趕出去。先是摘下我們的手錶，又摘掉我們的勳章。我身上佩戴兩枚勳章：傷患勳章和二級鐵十字勳章，每個搶修過幾次電話線路的士兵，都會獲頒一枚二級鐵十字勳章。

美軍繞路把我們送到維蘇威火山附近的一個戰俘營，那兒有好幾個戰俘營，每個都安置四千多名被俘士兵。起初看守我們的是白人兵，後來換成黑人兵，他們看管時比較鬆散。有一次，他們居然在崗哨睡著了，連身上的武器都掉下來——落到我們的戰俘營中。我們迅速撿起

武器，哨兵們只好用香菸贖回。過不久，又換成義大利兵。我們用幾個罐頭空罐拼成炮筒的形狀朝他們瞄準，歡迎他們到來。結果義大利兵以為我們荷槍實彈，迅速逃離，我們也因此得到一點自由時光。

終於，美軍單位開始安排釋放第一批戰俘。他們委託信任的一批德國士兵，其中包括幾位神學家來擬定獲釋人員名單。從事重要職業，例如農民、運輸司機等勞工，享有優先獲釋權。但這條命令很快又被收回，所有來自德國東部的士兵都必須留在營地，於是重新修改獲釋人員名單。我認識的一位神學家把我的名字填上去，我便搭上了運送第一批獲釋戰俘的火車，從義大利輾轉返回德國，回到了家鄉。那已是1945年7月中旬。

若瑟·拉辛格也未能躲過戰爭的茶毒。1943年，褐色掌權者又萌生新主意。他們認為既然寄宿學校的學生都已離開父母身邊，過團體生活，那麼也可以肆意變更寄宿學校的地點——比如安置在高射炮基地附近。反正學生也無法全天上課，那麼防禦敵機進攻也是很有意義的課餘活動。在此背景下，特勞斯坦修道院1926、1927年的應屆修生，被徵召到慕尼黑的高射炮基地。他們和普通士兵一樣住在臨時搭建的木屋，穿著類似的制服，甚至做同樣的工作。唯一的區別在於，他們多少還能聽慕尼黑馬克西米連人文中學的老師講課，儘管課程已大幅縮減。馬克西米

連人文中學的學生也被徵調到這裡，大家合併成一個班上課。對若瑟來說，突然遇到這麼多來自大城市的同齡學生，是很有意思的經驗。經歷一番磨合，他們學會和平相處，慢慢形成一個團隊。

他們的第一個駐地是慕尼黑北部的路德維希場，主要任務是負責保衛巴伐利亞發動機製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譯註：即BMW）在該地的飛機發動機製造分廠。他們又先後被調到烏特弗里、因斯布魯克，最後來到了慕尼黑西邊的格爾興，那裡有多尼爾飛機製造公司的總部。因為當時盟軍的飛機經常在這一帶領空轟炸慕尼黑，所以格爾興的陣地特別重要。



1943年，若瑟·拉辛格（左二）在高射炮基地。

若瑟·拉辛格曾形容自己「完全不適合當軍人」，對十六歲的他來說，這是一段艱難的歲月。然而，他還是設法在困境中開創最好的機會。他先申請分發到測量部，後來又到電信交換部，這樣至少可以逃避射擊訓練。尤為幸運的是，管理該單位的下士堅決捍衛自主權。不知從何時起，他們被免除所有軍事操練，沒有人敢擅自闖入他們的小小天地。最後，若瑟還分配到一間小單人房。他不浪費分分秒秒大量閱讀書籍，並為部隊中的天主教徒爭取到上宗教課和上教堂的權利。

同他一起在高射炮基地服役的慕尼黑黑人弗里德（Walter Fried），現年已84高齡。至今仍記得這個「羞澀剛毅、乍看不怎麼起眼」的青年。有一次，弗里德在接受《明鏡週報》採訪時提到，有位高官前來基地視察，每位學生都得輪流報告未來想從事的職業。多數學生，包括他自己一致回答想當飛行員，這樣才不會遭到進一步詢問。「輪到拉辛格時，他毫不猶豫地說他想當神父。這引來一陣冷嘲熱諷。在當時敢說出這樣的回答，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一開始，學生們還可以每週進城三次，到馬克西米連人文中學上課，後來進城漸漸變成一種奢望。盟軍越來越頻繁地對慕尼黑進行轟炸，整個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不久後，空氣中只飄浮著厚厚的灰塵及濃重的煙火味道。最後，火車也不能搭了，因為鐵軌被炸毀了。修道院的修生

們企盼著盟軍能夠儘快結束戰爭。然而，他們中有幾位沒能看到戰爭結束。

1944年9月10日，學生終於獲准離開高射炮基地。然而，剛剛踏上特勞斯坦的土地沒多久，若瑟就被徵召進青年義務勞動軍。他坐在一輛大貨車的貨艙裡忍受無窮無盡的顛簸，抵達奧地利的布爾根蘭州。那兒聚集了一大批被迫勞動的德國青年，他們必須儘快砌起一面「東南牆」，阻止蘇聯軍隊進攻。

接下來的兩個月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惡夢，因為納粹黨衛隊在這裡指揮。青年飽受摧殘。夜幕降臨後，黨衛隊會把他們從平板床上敲醒，逼迫他們「自願」加入黨衛軍。許多筋疲力盡、無力反抗的青年，就這樣被迫成為這個喪盡天良機關裡的一員。當拉辛格說他想當神父時，他不斷受到冷嘲熱諷和大聲斥責。不過，他也因此僥倖躲過了被迫加入黨衛軍。

在青年義務勞動軍中，17歲的若瑟第一次意識到納粹主義的偽宗教本質，它是真真實實的「希特勒邪教」。同他的哥哥喬治一樣，他後來在回憶錄《我的一生》中寫道，他也經歷了「一種將敬禮鐵鍬和敬禮勞動作為救贖力量的儀式訓練。」在他眼中，扛起和放下、擦拭和展示鐵鍬，都帶有「偽宗教禮儀」的色彩。直到前線越來越逼近，敬禮鐵鍬的儀式才停止。突然間，鐵鍬又恢復到了原本的面目——一件普通的日常勞動工具。它的「轟然到

塌」，同時也顯現納粹主義行將分崩瓦解，而這已處處有跡可循，「這一整套的儀式及其背後的整個世界，不過是漫天大謊。」

通常青年義務勞動軍的士兵到了前線，就由國防軍自動接收。不過出乎意料的是，若瑟·拉辛格幸運接到被遣送回家的命令。於是，若瑟搭上返家的火車。由於空襲警報不斷，火車不得不中途停靠。沿途經過維也納，四處可見狂轟濫炸後的斷壁殘垣。他熱愛的薩爾茲堡，不僅火車站被炸成一片廢墟，美麗的文藝復興風格的主教座堂也未能倖免。一聽到因為空襲威脅，取消在特勞斯坦站停靠的廣播，若瑟果斷地跳下火車。

他終於回家了。「那是一個夢幻般的秋日，」若瑟後來回憶說，「樹上的果子有些已經成熟了，遠山在午後的陽光下熠熠發光。回到家中，擺脫那個充斥著意識型態和仇恨的扭曲世界，讓我前所未有的強烈感受到，家鄉原來如此美麗。」他對軍隊沒有一點好感。親身經歷戰爭的殘酷之後，他才知道和平是多麼寶貴。

然而，戰爭尚未結束。度過三週「愉快的休息」之後，若瑟接到了調往慕尼黑的任命。在那兒，為這些青年分配任務的軍官，顯然不再相信所謂的「最終勝利」。他問若瑟：「我們該怎麼安排你呢？你家在哪裡？」若瑟回答說：「在特勞斯坦，那裡有個軍營。」軍官說：「那麼我安排你去特勞斯坦吧，不過你不必立刻去報到。你可以

享受幾天美好的假期。」

隨後，他不得不去特勞斯坦的軍營接受基本軍事訓練。他情緒低落地在兵營裡，在愁雲慘澹的氣氛下和同袍共度1944年的聖誕節。因為生病，整個二月他都無需執行任務。反正他們連隊的任務不過是穿著嶄新的軍服、唱著軍歌走遍大街小巷，向民眾證明「元首」手中還有年輕的新兵。到後來，赴前線作戰越來越危險，若瑟乾脆鼓起勇氣逃跑。

那是在1945年4月左右，這樣做簡直是冒著生命危險，因為黨衛軍下令，凡是逃兵一律可根據〈緊急狀態法〉直接射殺，或絞死在附近的樹上，以儆效尤。當兩名士兵在旱橋下的鐵路邊攔住他時，若瑟的心怦怦直跳，簡直要從胸膛裡蹦出來。不過，他又遇到好運。那兩位國防軍士兵也像我一樣受夠戰爭的茶毒，他們看到若瑟的手臂受傷纏著繃帶，便放他走了：「弟兄，你受傷了。繼續上路吧。」於是，他安然無恙地回到家。

但在家中也不安全。幾天後，兩個黨衛隊隊員在他家留宿。他們發現已屆入伍年齡的若瑟，於是盤問許久。後來，父親拉辛格忍不住滿腔怒火，開始痛斥希特勒的罪行。若瑟的命運似乎無可挽回，但不知何種原因，兩個納粹黨員居然沒幹罪惡的勾當，隔天一聲不響就離開了。

終於，美軍逼近了特勞斯坦。雖然拉辛格家的房子十分簡陋，美軍還是把這裡當作他們的主要駐地。他們確認

若瑟當過德軍士兵後，要他著軍裝向美軍正式投降。若瑟的母親聽說小兒子要被當作戰俘押走時，十分傷心。在同幾百名戰俘一起離開家鄉，踏上未知的命運之前，母親為他煮了一碗燕麥粥，而他則帶了空白的大筆記本和一支鉛筆上路。

長長的戰俘隊伍幾乎看不到尾。在空曠的公路上行走三天之後，他們終於到達巴特艾比靈。美國大兵把巴伐利亞所有德軍戰俘聚集到一座前軍用機場。他們興奮地跟特別年長或年幼的戰俘合影，大概是想回家展示他們擊敗的是一群可憐的烏合之眾。

後來，美軍又把他們從巴特艾比靈押送到烏爾姆附近一片空曠的農田，共有五萬餘名戰俘被安置在這裡。戰俘人數實在太多，遠遠超出美軍的安置能力。這兒既沒有平板房，也沒有帳篷，他們不得不幕天席地。有幾個幸運兒隨身帶著帳篷，遇到下雨天會招呼同伴進來避雨。提供給戰俘的食物，則是一大勺湯和幾片麵包。遠方地平線上聳立著烏爾姆主教座堂在戰爭中被炸掉一半的尖頂，彷彿在警示人性不曾泯滅，又好像在昭示美好的時代即將到來。

戰俘完全喪失時間概念，要知道今天到底是幾月幾日，得費一番腦筋。他們對外面的狀況也一無所知。有一天，美軍突然用照明彈放了一場焰火，引起大家關注。那是1945年5月8日。不知從何時起，戰爭已經結束、德國投降的流言開始在戰俘中流傳。他們大大鬆了一口氣，希

望能夠很快獲得釋放。這時有人謠傳說美軍準備向蘇聯宣戰，他們要集合所有德軍戰俘，讓他們投入新戰場。不過，大多數人都無法想像同盟國會這麼快就分崩離析，他們企盼和平能早日到來。

做戰俘期間，若瑟·拉辛格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陪伴他度過這段艱苦的歲月。他每天都寫下對天主、世界、歷史及個人處境的想法。他還嘗試創作希臘語「六音步詩」，充實自己的精神世界，為空白的生活增添一點色彩。不久，戰俘營中的同伴也積極從單調無聊的戰俘生活中，尋找一些有意義的活動。神父們聚在一起，每天舉行彌撒；學者舉辦了一系列精彩的講座。

接著，美軍開始安排釋放戰俘。最先獲釋的是農民，於是很多人突然想起自己在鄉下還有一座農場，或者有親戚住在農村。1945年6月19日，終於輪到若瑟·拉辛格獲釋。在被詳細檢查並噴上殺蟲劑後——美國大兵不知道怎麼想的，總覺得德國人身上有跳蚤——若瑟終於拿到了釋放令。一輛美國貨車把他們這一隊的戰俘運到慕尼黑北邊，之後就得各自尋找回家的路。

若瑟和鄰村的一個青年一起上路，他們估算走回特勞斯坦差不多有120公里路程，大概需要三天時間。他們打算晚上到農戶家過夜，最好還能討點吃的。剛剛穿過奧托布倫，一輛燃木煤氣的運乳車經過他們身邊。兩個年輕人太過拘謹，不好意思攔下它要求搭個便車。幸運的是，司

機居然自己停下來，問他們要去哪裡。他們回答說要到特勞斯坦，這時司機笑了出來，原來他是特勞斯坦一家牛乳場的工人，正趕著回家。於是太陽還沒下山，若瑟就回到家了。

父母和姊姊喜出望外出來迎接。母親迅速為他做了一頓簡單的晚餐：一小盤花園裡種的蔬菜沙拉、自家的雞蛋和一大塊麵包，這是他這輩子吃過最美味的一頓。不過，還有一件事沉重地壓在他們心頭，沖淡了久別重逢的喜悅：哥哥喬治至今仍杳無音訊。直到七月，曬得黝黑的喬治才突然出現在家門口……

我們也是先從義大利被押送到巴特艾比靈附近的戰俘營，弟弟幾週前曾在那裡待過。葛拉斯（Günter Grass）後來說他在那裡遇到若瑟，不過這應該是他臆想杜撰出來的。或許他確實待過那個戰俘營，不過可能是在不同的時間點。弟弟的記性一向很好，如果他當時曾跟那個想當藝術家的同伴一起挖過洞、擲過骰子、暢談過未來的話，他肯定不會毫無印象。或許這是很美的故事，可惜並沒有真實發生過。

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在其自傳《剝洋葱》中寫道，在巴特艾比靈的戰俘營裡，他曾跟若瑟·拉辛格待在一塊兒，並跟這位後來當上教宗的青年成了朋

友。葛拉斯寫道：「在戰俘營裡，我總是跟同齡的同伴坐在一塊兒。下雨的時候，我們這些青年會躲到平時挖的一個地洞裡，上面蓋著一塊防雨布。共有十萬左右的戰俘被安置在這裡，幕天席地。他們中有個叫若瑟的青年，他是特別虔誠的天主教徒，嘴邊不時蹦出一兩句拉丁語名言。我們成了朋友，常在一起擲骰子——我之前保住了一個骰子筒。我們常常一塊兒打發時間，擲骰子、聊天、沉湎於對未來的幻想，就像年輕人常做的那樣。我想當藝術家，他想在教會中闖一番事業。在我眼中，他有那麼一點兒放不開，不過，他是一個親切的小伙子。」

後來，在《法蘭克福彙報》主編施爾馬赫（Frank Schirmacher）的採訪中，葛拉斯坦白承認：「這難道不是一個美好的故事嗎？」

無論如何，幾週過後我也來到巴特艾比靈的戰俘營，那裡有許多士兵。居住條件十分簡陋、沒有被子、沒有帳篷，什麼都沒有。吃的方面則是一大碗湯、一杯咖啡加幾片麵包。晚上睡覺時，我們只能躺在冰冷的地上。幸虧天氣不錯，我們只待了三天就獲釋回家了。

第三天，一名美國軍官來到我們營地，大家都得站著。然後，他按照我們家鄉的位置進行編組：上巴伐利亞、下巴伐利亞等——他確實用了「下巴伐利亞」（Unterbayern）一詞，顯然他不知道「低地巴伐利亞」。

（Niederbayern）這個正確說法。隨後，軍官把我們這一組交給一位黑人士兵，他把我們帶到貨車隊前，車上的司機都是黑人士兵。他把要回特勞斯坦的人指給我看，一位在我之後晉鐸的神父兄弟也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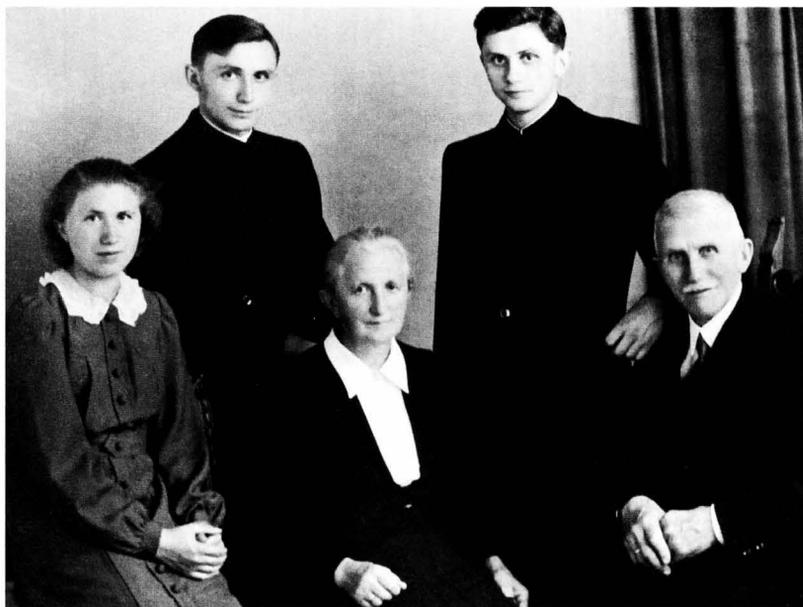
上車後還沒來得及站穩，黑人司機就馬上發動汽車，先上了慕尼黑到薩爾茲堡的高速公路，隨後在施瓦恩巴赫下高速公路。他整路都在大嚼口香糖，我們對他這副樣子很不習慣。最後，他停下車朝我們大吼了幾句。胃裡翻騰起一陣陣不適，大家也依序下了車。我已經和家人斷



喬治·拉辛格與父母在搬家前（1955年），站在胡石拉的住所前最後一次合影。

了聯繫好幾個月，我不知道父母和姊弟是否還活著、我們的房子還在不在？一想到這裡，我不是用走的，而是往家裡飛奔。

終於到了家門口，我看到母親正在屋外汲水——那時還沒安裝自來水，我們在屋外挖了一口井。一看到母親，我頓時喜出望外，母親看到我歸來也無比驚喜。這一刻，我盼望太久了！擁抱之後，我們進到屋裡，父親、姊姊和弟弟以為是母親汲水回來。接下來的場景，簡直無法用言語來形容，只有身歷其境才能體會。我一句話都沒說，就馬上跑到鋼琴前彈起《讚美頌》：「偉大的天主，我們



1951年7月，兩位年輕神父與家人合影。

讚美祢！」對我來說，我們一家人能在歷經劫難後重聚一堂，絕非偶然，而是全靠天主的恩賜；我們全家也都這麼認為。

在戰爭中能夠毫髮無傷倖存下來，讓我們兩兄弟對「天主在我們身上懷有計畫」的信念更加堅定。在戰爭年代裡，我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被迫進到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們以前根本無法想像戰爭的野蠻殘酷。我們確確實實與死亡擦身而過，這經歷讓我們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我們突然間學會欣賞以前不以為意的部分，而當神父的決心也越加堅定。



Chapter 6

弗萊辛與福斯坦瑞

1946-1951年

接下來的戰後時光，也給我們留下幸福的回憶。雖然生活舉步維艱，物資異常匱乏，但在我們眼中全都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我們經歷戰爭而倖存下來，那個給人類帶來無限苦難的邪惡政府，終於被推翻了。

只有父親一直堅信事情終將如此發展，自戰爭爆發第一天起，他就斷言德國必定一敗塗地，希特勒一定會輸掉這場戰爭。原因很簡單，邪惡不可能也不行取得勝利。如果德國贏得這場戰爭，並非國家之福，更將帶給全世界巨大災難。如果讓希特勒這個貪得無厭、自私成性的惡魔統治全世界，那麼他將專制、恐怖、獨裁統治世界，並將它摧毀，絕不會致力於建設。因此我們始終堅信，天主——掌握歷史航向的天主，絕不會允許他取得勝利。當然，在戰爭初期也發生過一些出人意料的事件，例如波蘭和法國迅速淪陷。不過，希特勒剛下達進攻蘇聯的命令不久，一切變化就如早已注定的那樣，把邪惡帝國引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即便如此，戰後我們獲悉的信息，仍然遠遠超出我們最壞的想像。在納粹時代，我們就知道集中營的存在，知道那裡發生過大屠殺。達豪集中營就在慕尼黑附近，大家對它多少有些概念。從親朋好友那裡得知，許多人的親屬在集中營中慘遭殺害。我們家族也未能倖免。我有一位表哥，他是母親妹妹的兒子，一個風趣可愛的男孩。不過，他因智力發育較遲緩，吐字不清，無法跟人順利溝通。我

不大清楚他具體患有哪種疾病，畢竟當時我只是個中學生。後來我們得知，納粹把他從家中拖走殺害了。因為按照他們那種毫無人性的意識型態，表哥是一個「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

在阿紹的時候，我們全家人跟一對膝下無子的老夫婦——魏斯滕塔納夫婦交情很好，每次我們去探望他們時，兩位老人家都喜出望外。在丈夫因肺炎去世後，魏斯滕塔納夫人逐漸患上失智症。後來我們聽說，她被納粹帶到林茲（Linz），隨後客死他鄉。眾所周知，納粹將精神疾病患者，以及他們眼中無用的人聚集到林茲附近屠殺。當時的民眾稱這種情況為 gelinzt（被屠殺）。林茲人可能沒聽說過這種說法，不過在我們這兒無人不曉，每個人都知道 gelinzt 這詞代表什麼。

納粹殺害那些他們視為「廢物」，或者與他們的世界觀不同、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生活的人，簡直就如家常便飯。這些當然都屬於謀殺。直到戰後我們才獲知，納粹還大規模屠殺猶太人，不過這可怕的事實並未出乎我們意料，因為我們知道納粹向來肆無忌憚地進行種種令人髮指的惡行，他們의思想和行為形同魔鬼。滅絕猶太種族顯出他們罪大惡極和慘無人道，而且寡廉鮮恥、喪盡天良。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行動與其他謀殺罪行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是有計畫地進行滅絕，而且受難者不計其數。

當我們聽到納粹對猶太人所做的滔天罪行，都深感震

驚，然而從納粹殺害我們身邊認識的人的卑劣行徑當中，我們早已不再對他們抱有任何美好幻想。我們很清楚，我們永遠不可能靠內部的反抗來推翻這些邪惡的罪犯，而只能藉由外來的力量。因此，我們視那些所謂的「敵人」為我們的解放者，由衷地感謝他們結束了納粹的恐怖統治。

無論在家裡，還是在我們周圍，反猶主義都不是我們討論的話題。我們將每一個人都視為鄰人，甚至包括納粹，雖然在面對納粹時，我們會小心翼翼地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我們無法信任他們。不過，無論是在阿紹，還是在特勞斯坦，我們都不認識猶太人，也因此，我們對1933年開始的反猶浪潮、1938年的「水晶之夜」，以及納粹驅逐猶太人的事知之甚少。直到在學校每週六安排的納粹思想課上，我們才被灌輸了「猶太人是邪惡的」論調。隨後，突然間，歷史課上老師也警告我們要提防猶太人。對此，我們從未信以為真，因為我們知道這些說法從何而來，也知道納粹一貫喜歡憑空捏造，肆意詆毀。不過，我們從未跟猶太人直接交往過，在上巴伐利亞的村子和小城市裡，很少有猶太人。因此，這都不會成為我們的話題。

同任何一位前任教宗相比，本篤十六世更為深入地致力與猶太人和好，這表現在他頻繁地拜訪猶太會堂，次數超過了歷任教宗。2005年8月，他參觀了科隆的猶太會堂；2008年4月，他拜訪了紐約的猶太會堂；2010年1月，

他又走訪了羅馬的猶太會堂。在奧斯維茲集中營及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他擲地有聲地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主義。在耶路撒冷，他在哭牆下祈禱。就任教宗之位不久，他就向羅馬的猶太團體致函；他也是第一位邀請拉比到主教會議上發言的教宗。在他的著作《納匝肋人耶穌》中，他不僅引用了猶太人對《新約》的觀點，還努力將耶穌和祂的福音放到其根源——猶太背景之下來理解。他將猶太人定義為我們「信仰中的父輩」而非「兄長」。在與席瓦德的訪談中，他解釋：「我必須強調，從我攻讀神學的第一天起，我就清楚知道組成《聖經》的兩個部分——舊約與新約，本是一體的……第三帝國發生的一切，尤其觸動我們每一個德國人，促使我們滿懷謙卑、羞恥和愛心，看待以色列民族。」

身為教宗——尤其是來自德國的教宗，弟弟當然知道他肩負著同猶太人致力修和的重任。一方面是德國歷史帶來的直接後果，另外也可回溯到他與慕尼黑移民團體的深入交往。我相信，在與魏瑪教授（Ludwig Weimar）和派施教授（Rudolf Pesch）的研究中，他對「和猶太教對話」的重要性有更為清晰的認識。

歷經二十多年的籌備工作後，1968年，一群天主教徒在慕尼黑成立了天主教移民團體。建立這一團體的出發

點，源於他們在二次戰後時常捫心自問：「我們的教會到底欠缺什麼，讓我們在二十世紀的歐洲有好幾千萬受洗的基督徒的情況下，還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自相殘殺？為何我們有如此眾多的基督徒，依然不能解決在百年前就爆發的社會問題，以至於讓喪心病狂的獨裁者和共產主義及納粹主義意識型態大肆橫行，並掌權執政？我們的教會丟失了什麼，甚至信徒們不能夠阻止大屠殺發生，不能扼阻六百萬猶太人在第三帝國時慘遭屠殺的命運？」在探索答案的過程中，他們尤其致力於從猶太教觀點出發闡釋《新約》，並倡議：「要將以色列作為教會的根源，將活躍的猶太教作為提醒和修正這一根源的伙伴來看待。」當若瑟·拉辛格還是神學家的時候，就已經跟移民團體有過接觸。後來，他以慕尼黑總主教的身分批准了團體的章程，並認可成立「宗座團體」，移民團體受當地主教的監督。

現在我的住所緊挨著雷根斯堡的猶太團體，他們的會堂就建在露岑街，直到不久前，還是由漢斯·羅森格爾德（Hans Rosengold，1923-2011年）領導。我和他保持著良好的鄰居關係。我們經常往來、互相拜訪。我很欣賞他和善可親、平易近人的性格。另一位房屋主管對我也非常友好，他是從俄羅斯移民到德國來的猶太人，待人彬彬有禮且十分熱心。他知道我視力不好，遇到街道維護、設有路障的情況，他都會在我經過時，從屋裡跑出來攙扶我繞過

路障。他也常幫助我的女管家海恩德女士，每次她採購歸來提著重重的購物袋時，他都會跑上前來幫忙，還常常來我家串門子，並給我們帶來雜誌、猶太麵包（無酵麵包）及甜甜的逾越節葡萄酒。

不久前，我因接受膝蓋手術住院，他還帶著葡萄前來探視。他和他的妻子都很熱情可愛，在為人處世方面是大家學習的好榜樣。2006年弟弟來訪雷根斯堡時，猶太團體還為他的幾個隨行人員準備了猶太餐點。我們一直相處得十分融洽。在戰後我們簡直不敢想像，德國人和猶太人的關係有朝一日會恢復到如此和睦的程度。這讓我們滿心歡喜，心存感恩。

我們再回到1945年發生的事情吧！在我參戰的幾年間，若瑟長大了，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1942年我被迫參軍時，他剛滿十六歲，還是個尚未完全變聲的少年，介於男孩和男人之間。戰後我們重聚時，他已經真正長大成人了。我們互相傾訴各自在戰爭中的經歷，總是有說不完的話。實際上，自從我到修道院讀書之後，我們兄弟倆就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再像無憂無慮的童年那般形影不離。我們各自結交不同的朋友——我的朋友都是對音樂感興趣的，他的朋友則大多致力於學術研究。在修道院上課時，由於課程安排滿檔，我們幾乎沒有時間見面，到假期才能補回來。然而，在戰爭的尾聲中，我們又住在一起，一起度過了接下來的幾個年頭。

戰爭結束後不久，1945年11月9日，我們的父母慶祝結婚廿五週年。在那生活極度困厄的年代，當然整個慶祝非常簡單，不過依然十分美好。那一天開始在教堂有彌撒，弟弟擔任輔祭，我負責演奏管風琴並演唱幾首歌曲，姊姊則陪伴父母坐在教堂中。幾個可愛的的朋友還為我們準備了小禮物，一罐蜂蜜等等。隨後，母親大展廚藝，用極簡單的食材為我們烹煮了一頓美味可口的午餐。那是父母唯一一次共同慶祝結婚紀念日。到了1960年他們結婚四十週年時，父親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戰後，我們對於能有和藹可親、對孩子關懷備至的父母，以及有團結友愛、親密無間的手足，倍感珍惜。坦白說，當我在主教座堂合唱團中聽說某個男生是家裡的獨生子時，心裡總是會有些許遺憾。我真的感謝天主，感激祂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賜給我姊姊和弟弟，並且讓我出生在如此完好的家庭。雖然我們之間也免不了拌嘴吵架，也會意見分歧，不過絕大多時間我們都和睦相處。我知道自己擁有一個家，那是我永遠的歸宿，我也始終對慈愛的天主滿懷感恩。

當時，我們首先要確定有身分證，因為只有能出示身分證明的人才能領到「配給券」。同戰時一樣，戰後德國也實行限額經濟，每個人每月只能分配到定量的肉、香腸、油和糖等食品。除了需要出示身分證外，弟弟和我還必須出示美國戰俘營發放的釋放令。

不久後，我們這些從戰俘營獲釋的人，還必須有工作證明。於是，我們向之前就讀的修道院邁耶爾院長提出申請，我們一直十分尊敬這位老院長。他不希望我們隨便找工作，便建議我們回修道院幫忙。於是，我們不必到陌生的職場做我們不熟練的工作，而是留在我們喜歡的地方。

事實上，我們的修道院亟需重整。在戰爭中它先是被強制徵用為戰地醫院，不久前又成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為那些從東德和羅馬尼亞流亡到西德的人提供暫時落腳處，之後便閒置下來。那時候，弟弟和我每天都騎車前往修道院，幫忙重新整理，我們還可以得到一些免費食物。和我們一起工作的還有許多以前修道院的修生，老同學久別重逢，分外開心。

當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把桌子、閱覽台及其他家具抬到修道院裡面。我們還幫助一位導師重新布置房間。做這些事我們樂在其中，因為這些工作是有意義的，我們為修道院的重建盡了綿薄之力。到了晚上，我們騎車回家，盡情享受和睦寧靜的家庭氣氛。這樣生活一直持續到秋季。

1945年11月20日，聖科比尼安（Korbinian）主保日這天，所有返家的修道院學生共聚一堂，參與盛大的節日彌撒。聖科比尼安是慕尼黑和弗萊辛總教區的主保，他是一千兩百多年前來自法國的傳教士。在他的主保日舉行這場重逢會，讓大家倍感歡欣鼓舞。

時至今日，聖科比尼安依然是巴伐利亞最受敬重的聖人。他的聖髑放置在弗萊辛主教座堂地下墓穴的一個金聖骨匣裡，立於這位聖人主教兼傳教士的石棺上面。第七世紀最後三十年間，聖科比尼安誕生於法國塞納河畔的梅蘭附近，母親是愛爾蘭人，父親是法國人。在家鄉的教堂裡，他開始度隱修生活，虔誠的事蹟很快傳遍全國。

710年，聖科比尼安前往羅馬朝聖，在教宗君士坦丁一世主禮下晉牧，並獲得了講道許可。714年，他經由巴伐利亞再次前往教宗之城朝聖，巴伐利亞的格里莫阿德公爵希望他能夠留在本地擔任主教。於是，聖科比尼安從羅馬返回後就留在弗萊辛，在當地大部分是異教徒的情況下，展開卓越的傳教工作。他還為以聖斯德望為主保的教堂主持了落成啟用典禮，後來，著名的維恩斯德望隱修院就建在這座教堂旁邊。

聖科比尼安深受當地民眾崇敬，格里莫阿德公爵也對他十分友善，直到他強烈譴責公爵娶一位近親的非法婚姻。主教擔心公爵為此報復，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避到梅拉諾附近的凱音斯修道院。公爵逝世後，他的繼任者胡基伯特公爵將他召回弗萊辛。群眾夾道歡迎他的歸來。回歸不久，聖科比尼於728年左右安溘然長逝。根據他的遺願，他的遺骸先是葬在凱音斯修道院裡。後來，他的繼任阿爾貝歐主教於765年11月20日把他的遺骸運回弗萊辛。

秋天來臨之際，人文中學再次開放。到了十二月，修道院的重建工程也穩定進展，可以進行下一步重新招生的工作。於是，院長邀請我們返校。雖然我們兩個都已中學畢業，不過我們很喜歡在那兒幫忙，並開始利用這段時間為進入大學攻讀神學做妥善準備。當時，哈斯拉赫的布魯姆神父借給求知若渴的弟弟許多神學和哲學方面的著作，使他得以一窺這些領域。戰前也是這位布魯姆神父建議弟弟轉到修道院就讀，他對弟弟的天賦和聖召充滿信心。

1945年聖誕節時，我們在以前的一個同學家裡，舉辦了同學會。許多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同學都來歡聚。好多人談到他們的父母現在都說，當初早就預料到會有如今的結局，形勢早已一目了然，德國不可能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他們以前從未表明看法，是因為擔心孩子說溜嘴而招惹禍端。看來，很早以前大家都心知肚明希特勒必將一敗塗地。然而，當時大家都缺乏勇氣公開表達自己的見解，即使在家裡也不敢。我們因為晚間交通不便，整個晚上都湊在一起天南地北閒聊，隔天清晨才各自回家。

同年十二月，我們接到了弗萊辛修道院的來信通知，那兒的神學院也將再次開放。畢業課程，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牧靈課程，早在十一月就開始了。於是，1946年1月3日，我們來到了新的神學院，四天後即展開大學學程。因為戰爭的耽擱，我和弟弟站在大學的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兩個都沒有參加高級中學的畢業考試，只有結業

證；換句話說，我們完成了十一年級的課程並有同等的結業證書。憑此我們可以進入高等院校或大學攻讀神學，不過還得先補習幾門課程，學校的教務長幫我們擬好需要補習的課程表。

首先需要加強的是拉丁文，在課程中，我們翻譯詩文精華錄中的篇章；古希臘文也在補習之列，我們要閱讀《新約》的原文；此外還有世界史的課程——在當時則稱為「凡俗史」，以及生物課。與現在相比，那時的神學院對世俗學科似乎給予更多關注。然後，一切準備就緒，我們的大學生活終於開始了！

弗萊辛的總教區神學院在二次大戰中也被強制徵用為各國受傷戰俘的戰地醫院，因此戰後同樣需要經過重建才能招收新生。直到部分傷患獲釋後，神學院才又重新獲得一些可支配的空間。到了1946年新年伊始，神學院終於騰出可以容納所有修生的空間。

在二次大戰中，慕尼黑的大部分城區都遭到盟軍轟炸，弗萊辛的主教座堂所在的山坡一帶，及其著名的聖母教堂則倖免夷為平地的厄運。儘管如此，按照今天的標準，神學院的條件仍然十分簡陋，修生們生活在狹小擁擠的空間。修生得同住在一間大寢室裡，白天則在自習室裡讀書，完全缺乏私人空間的生活。再加上神學院嚴格的管理制度，使得這裡的修生沒有多少自由。不過，這些年輕

人毫不在意。他們在經歷多年的戰爭和納粹的恐怖統治之後，對如今可以回應聖召繼續接受陶成，心懷感恩。

我們一踏進神學院的大門，迎面就碰上一個穿戴著神職人員衣領（即白色的「羅馬領」，這是神職人員的標誌）的年輕人，他懷裡捧著一大疊書，為了不讓書本掉到地上，他用下巴微微支撐。在這一瞬間，我們立刻意識到我們來對地方了。最初我們以為他是神父，後來才知道他尚未晉鐸，正在讀神學的最後階段。我們踏進一個寬敞的大廳——所謂的「紅色大廳」，之前被用作大禮堂，如今又恢復了這一功能，廳中收藏珍貴的帝羅爾木版畫聞名遐邇。不過在當時，它被臨時當作大自習室，裡面坐滿了數十位同我們一樣來這兒攻讀神學的大學新生。他們將成為弗萊辛「充滿傳奇色彩」的戰後新一代神父。

約有一百二十位修生匯聚在此，他們的背景各不相同，然而心裡都懷著同一個願望——晉鐸當神父，年齡分布則從未滿十九歲——比如若瑟·拉辛格，一直到近四十歲。許多成年男子親身經歷了整場戰爭，他們在前線作戰，近在咫尺地感受到戰爭的無情。他們通過了殘酷戰爭的嚴峻考驗，熬過了苦難深重的黑暗長夜，這對他們今後的人生影響至深。對於他們來說，年輕的修生就像涉世未深的孩子一樣，缺乏深刻的生活體驗。在他們看來，要真

正下定當神父的決心，深刻的人生經歷不可或缺。儘管如此，能夠在艱難歲月中倖存下來的感恩之情，以及基於彌補這些年來缺憾的堅定意志，還是讓大家團結在一起。

他們親眼見證了基督向聖伯多祿所揭示的預言：「地獄之門永遠不可能戰勝祂的教會。」即便在最黑暗的日子裡，教會依然是他們的希望所在。儘管教會存在著一切人性的弱點，但依然是納粹主義這一魔鬼般的意識型態最為強勁的對手。他們如今肩負的任務是：從信仰的力量出發，建設更美好的德國及更美好的世界。

一位修完大部分課程的高年級修生成為我們的督導——這是我們當時對輔導員的稱呼。他名叫賴珀勒（Alfred Läßle，生於1915年），後來成為薩爾茲堡大學神學系系主任，講授教理問答和宗教教育學。

1939年，阿爾弗萊德·賴珀勒還差幾個月就可以從慕尼黑大學畢業。在納粹對慕尼黑的總主教福爾哈貝爾樞機進行報復而關閉神學院時，他已經著手準備博士論文。當時，他被強征入國防軍空軍單位，參與過對波羅的海諸國的占領，並上了攻打蘇聯的前線。後來，他先是在威斯特法倫被美軍俘虜，後被送到法國勒阿弗爾一個很大的戰俘營。在那兒，他擅長的外語能力大有幫助：他利用為戰俘營負責人作翻譯的優勢，說服他們將五十萬戰俘中約

三百位天主教神父安置到一個單獨的區域，並為他們安排一些神學課程。直到1945年11月，他才重返滿目瘡痍的慕尼黑，並聽到弗萊辛的神學院重新招生的消息。

在接受《三十天》雜誌（2006年第一期）採訪時，賴珀勒教授依然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我打電話給弗萊辛神學院，接電話的是新院長霍克（Michael Höck，1903-96年），在神學院就讀時，他曾是我的導師……他對我說：『親愛的阿爾弗萊德，我有個美好的差事要交給你：你將成為神學院新生的督導。』他把我帶到神學院的大禮堂，那兒原本只在節日慶典時才會使用，如今卻擺滿了閱覽架和桌椅。霍克院長對在場的六十多位修生宣布：『親愛的修生，現在，我為你們安排的輔導最佳人選來了。你們一定會合作愉快的。』在這六十多位修生當中，還有一對兄弟：喬治·拉辛格和若瑟·拉辛格。幾天後的課餘時間裡，一個當時我尚不認識的修生來找我，對我說：『我叫若瑟。我有幾個問題想向你請教。』這幾個問題揭開了我們首次合作的序幕，從此以後，我們時常一起散步、討論、翻譯。」賴珀勒教授甚至還記得年輕的若瑟·拉辛格向他提的第一個問題：「你是如何在殘酷漫長的戰爭中保持自己的信仰？」他的回答顯然給年輕的若瑟深刻的啟迪：「通過母親的祈禱……因為我知道：基督愛我，基督需要我，如果我能夠獲救，基督會讓我為祂所用。」

「他好像一塊不停吸水的海綿，」賴珀勒如此描述他對這位以後當上教宗的年輕神學院修生的第一印象，「他對新知識的好奇心永無止境。一旦聽說什麼新鮮事物，或者接觸到可以精修拓展知識面的事物，他就興奮不已。」

甫一見面，賴珀勒就贏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充滿自信，為人處世圓融，總是言行一致。他給了我們一系列的建議，每天至少一條，通常是在清早我們吃早飯前，或剛剛吃完早飯時。我們十分喜歡他，在專業上更是對他敬佩有加。我們知道，他在攻讀博士學位。他的指導教授最初是施泰因比希爾（Theodor Steinbüchel，1888-1949年）。戰前他曾執教於慕尼黑大學，1941年轉到了杜賓根大學。賴珀勒1952年博士論文的題目——《論紐曼樞機（John Henry Newman）個人神學的主要特徵》，就是施泰因比希爾教授建議的。博士畢業後，賴珀勒筆耕不輟，著作頗豐，撰寫過一百五十多部書籍。他的著作很多被譯為各國語言，他的語言天賦對此助益良多。總而言之，他是與眾不同的人物。

不過，把他介紹給我們的神學院院長，也讓我們印象深刻。米歇爾·霍克博士在達豪集中營度過了許多年頭。身為教會報紙的主編，他是納粹公開承認的死對頭，撰寫過許多不合納粹政府心意的文章。他對我們和藹可親、關懷備至，我們都很愛戴他。也因此，大家都尊稱他為「父

親霍克」。

經慕尼黑總主教福爾哈貝爾樞機推薦，霍克博士前往羅馬的日耳曼神學院攻讀神學，並於1930年在羅馬晉鐸。1931年重返德國後，福爾哈貝爾樞機任命他為弗萊辛總教區神學院的督導。1934年，霍克出任《慕尼黑天主教會公報》的主編。他常常在「字裡行間」表達自己堅決反對納粹政府的立場，這引發了他與蓋世太保的激烈衝突，並導致這份教會報紙多次遭到查封。1940年4月，《慕尼黑天主教會公報》被徹底封禁，霍克也遭到控訴。儘管法庭宣布霍克無罪釋放，但在不久之後蓋世太保還是拘捕了他，並強行把他關到柏林的審查監獄。他先是被移監到奧拉尼恩堡（Oranienburg）集中營，之後又同以後成為輔理主教的諾伊豪斯勒（Johannes Neuhäusler）以及新教神學家尼穆勒（Martin Niemöller）一起被關到恐怖的達豪集中營，期間備受折磨。直到1945年美軍解放了達豪集中營，他才得以重見天日。

神學院的副院長是我們特勞斯坦的前院牧保穆蓋特納，他接受聖召比較晚；為我們講授哲學史的老師是費勒邁耶爾教授；主教座堂合唱團指揮則是蓋森霍夫（Franz Xaver Geisenhofer）。後來成為樞機的舍夫契克（Leo Scheffczyk，1920-2005年）也曾在我們神學院就讀。

他來自上西里西亞，戰前就在布雷斯勞大學攻讀過天主教神學，後來又到弗萊辛的神學院繼續修讀並在此畢業。當時，他和賴珀勒一起上專為高年級學生開設的畢業班課程。此外，神學院還設置了三門神學課和兩門為我們這些新生開設的哲學課。

起初，我們對舍夫契克的印象是有些恃才傲物，跟他接觸多了，對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之後，我們才發現，實際並非如此。只是他個性靦腆，缺乏自信。在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將靦腆和自負混為一談。他的講道十分引人入勝。此外，他還很會唱歌，是個音質優美的男高音。後來，他成為偉大的神學家，是蜚聲國際的聖母學學者。為了表彰他在神學上的貢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最後一次御前會議上將他擢升為樞機。

另一位與眾不同的同學名叫德弗雷格（Matthias Defregger，1915-95年），他是著名畫家弗蘭茲（Franz von Defregger）的孫子，曾出任慕尼黑總教區的總教牧，再晉陞為輔理主教。他自小父母雙亡，很喜歡講他的母親——來自法國的女裁縫的故事，她是很有趣的女士。在國防軍中，德弗雷格曾一度被擢升為少校，因為軍階高，在戰後為他招來不少流言蜚語。我還可以一一列舉每位同學的事蹟，他們後來都各自以不同方式找到生活的座標。

我們很快就適應了這個新的生活圈。然後，大學生活正式開始了！每天早上，我們都到神學院的小堂裡參加彌



撒和默禱，以此拉開一天生活的序幕。早餐過後，開始上課，吃過午飯後再接著聽課或參加討論。主日彌撒不在神學院的小堂，而是在弗萊辛的主教座堂舉行，這為我們提供了屬靈的美好生活體驗，在我們心中占有特殊的分量。

我們睡覺的寢室，稍大的房間裡放了十到十五張床鋪；小的房間，床鋪就少一些。弟弟和我通常不住在同一間，寢室並沒有暖氣，一到冬天就寒氣逼人。晚上我們準備的洗滌用水，到了早上就會結一層薄薄的冰，梳洗前，我們得先打破冰層。

若瑟·拉辛格在弗萊辛時有位室友叫庫胡特（Pavlo



擔任輔祭的若瑟·拉辛格（祭台最右邊）。

Kohut，1926-2006年），他是信仰希臘天主教的烏克蘭人，為了躲避蘇聯的統治，他逃到德國，並且立志成為神父。我在2005年夏天採訪庫胡特神父時，他忘記他和若瑟·拉辛格第一次相遇是在哪裡——在自習室還是餐廳？不過，他對拉辛格的第一印象依然十分鮮活：

「我馬上就發現他是與眾不同的人。他立刻表現出對我感到興趣，聚精會神地聽我講話。對於當時飄零在異國他鄉的我來說，意義非凡。隨著接觸越來越頻繁，我們彼此也越來越了解。我們常常一塊兒散步。我談及我的童年，我的叔叔和父母，因為政治環境不允許，我收不到家人的任何消息。冷戰的鐵幕已經降下，我無法給父母寫信，無法獲悉他們的近況。他馬上對我說，他很願意在我有困難時提供幫助，這讓我至今仍感激不盡。

當時我的德語說得還不夠好。他幫助我寫信，輔導我做作業並幫我修改。他很照顧我，大家都看得出來他是真心誠意地幫我。他從來不愛出風頭，總是那麼謙虛謹慎。他不像有的年輕人那樣沾沾自喜，從未想過要把自己放到萬眾矚目的位置……無論做什麼事情，他都能全神貫注，不論是讀書、工作，還是與我交談。

他從來不會被其他東西分散注意力。他總是孜孜不倦地學習，如飢似渴地汲取新知。無論何時遇到他，總是捧著書本在研讀。他分秒必爭地學習，而且有計畫、有系統。如我們所見，他的勤奮得到了回報。」

我跟庫胡特不熟，但弟弟同他無話不談。他待人隨和，平易近人。我們大家都知道，他來自東方教會，常給我們介紹許多東方教會的相關資訊；因此，他相當受歡迎，大家對他印象很深刻。

這些重返家鄉的神學院修生，有著旺盛的求知欲。經過了戰爭渾渾噩噩的年代，以及褐色煽動者灌輸單一的思想，他們如飢似渴地閱讀大量文學作品。文學能夠幫助他們反省戰爭中的經歷，為他們內心翻湧的問題提供答案。首先是有關罪過的問題。到底是何種疏忽，才讓褐色煽動者有機可乘並得以掌權呢？對於政府的殘酷行徑，他們又該承擔什麼樣的連帶責任呢？人類究竟是怎麼了，竟會如此喪盡天良？天主在哪裡？祂為何保持緘默？是因為祂早就拋棄了人類，還是因為人類背棄祂，對祂視而不見？世人應該如何為所發生的一切表示悔過並做補償？此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怎樣才能確保慘無人道的納粹主義不會再次上演？

他們閱讀了勒富特（Gertrud von le Fort）、維歇特（Ernst Wiechert）及杜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後者的《罪與罰》探討的正是這類核心問題。大家湧入倫理神學家施泰因比希爾的課堂，聽他講授海德格（Heidegger）和雅斯培（Jaspers）。施泰因比希爾的著作《轉向思考》成為了若瑟·拉辛格的指導書，書名「轉向思考」成為他的空

右銘。這正是此時的德國和世界所需要的——需要轉向到天主那裡。世人剛剛血淋淋地親歷過，一旦社會與天主脫節，一旦人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以及定奪生死的主宰後，會出現多麼可怕的境況。

為了區分我們兄弟倆，同學們叫我們一個「愛書的拉辛」——這當然是指弟弟，一個叫「愛樂的拉辛」，因為我對音樂更感興趣。在弗萊辛，我們不光擁有神學院的圖書館——一個很大的開架圖書館，而且還能使用主教座堂圖書館。這樣一來，弟弟再也不愁無書可讀了。他讀遍了所有值得一讀的書籍。當時還有個習俗，某位神父過世後，他的私人藏書都被轉贈給神學院。管理圖書館的學生們會把其中尚未納入館藏的書和珍貴的書籍挑選出來，剩餘的則在我們學生中間拍賣。我們曾買到形形色色的珍貴書籍。在戰後年間，根本買不到書，它們不只價格昂貴，印製的紙張也十分粗糙。

我已經不大記得，當初我們讀過哪些書籍。戴穆普夫（Alois Dempf）的歷史哲學著作肯定在我們的書單之列，還讀過不少瓜爾蒂尼（Romano Guardini）的書，比如《神聖記號》，當然還有他著名的基督論著作《主》。施茅斯（Michael Schmaus）的《基督——人類的原型》也頗受歡迎；而若有誰未曾拜讀過伯恩哈德（Joseph Bernhart，1881-1969年）的《副本堂神父》，那簡直就意味著他的

認知貧乏。

伯恩哈德是出生於巴伐利亞的施瓦本人，在大學攻讀神學並獲得博士學位後，被調到一個小村莊裡擔任副本堂神父。那兒的生活讓他感到十分無聊。不久後，他結識了一位女士，後來愛上她，兩人結了婚，這當然意味著他背棄了聖秩聖事。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被絕罰。在他生命的這段艱難歲月裡，他撰寫了《副本堂神父》一書。後來，他成為宗教哲學家和作家，撰寫了詮釋聖多瑪斯《神學大全》叢書——它們並非專業著作，而是傾向更廣泛的普通讀者群。這套叢書簡單易讀，語言既講究又優美，在神學上也造詣頗高，因而深受大家的喜愛。

圖書館中還收藏了《禁書目錄》上所列出的禁書，收集在一個單獨書櫃裡，通常都上了鎖，我們稱之為「毒藥櫃」。《副本堂神父》一書就在其中。這本書我當然看過，不過其他的書我沒翻過，因為我將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練習彈鋼琴和管風琴。弟弟則不同，他總是手不釋卷。

在思想上不斷向著神學和哲學顛峰攀登的同時，若瑟·拉辛格始終保持著童年時代的虔敬。這同樣源於納粹時期獲得的經驗。他寫道：「從父母親所繼承的信仰，證實了天主教是真理和公義的堡壘，可以對抗那個充斥著無神論和謊言的帝國。」這一信仰在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運過了考驗。在與同學討論教會史上偉大教父的同時，他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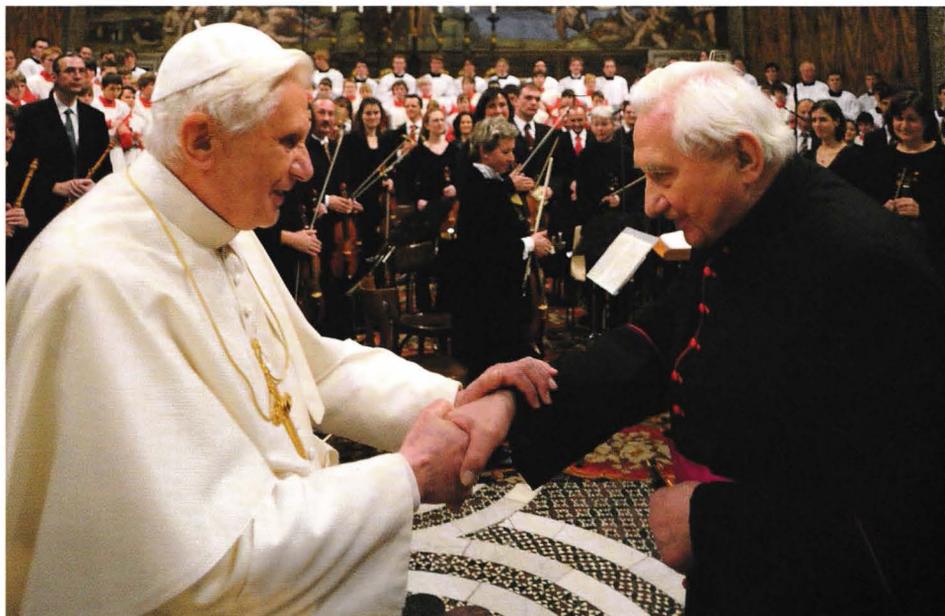
終保持著樸素的農村式虔敬習慣。

他很欣賞聖奧斯定（354-430年），這位既有藝術家的敏感細膩、又洋溢著熾熱熱情的教父，同樣生活於急劇動盪的年代——民族大遷移時代。若瑟·拉辛格認為，在這位「痛苦的、不斷發問的聖人」身上，今天的人依然可以追尋到自己的影子。與不切實際的理論家相比，他更喜愛「有血有肉」的神學家。對於奧斯定的觀點，「一個人不是通過出生，而是通過內心的皈依才能成為基督徒」，他發自內心地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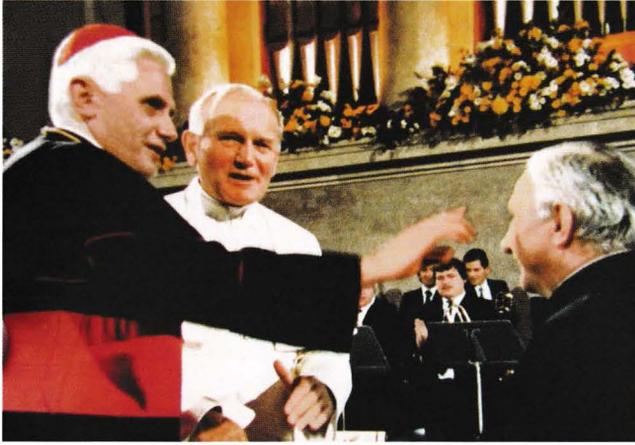
自一開始，弟弟就對聖奧斯定產生濃厚的興趣，雖然我們未曾直接討論過這一話題。毫無疑問，這位偉大的教父魅力十足，這一方面來自他思想的深度，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他博大精深的作品。在他的自傳《懺悔錄》這本代表作中，他對自己的一生做了見證。奧斯定一生的經歷並非所有人都接受，然而，走過了那麼多的歧路之後，他最終還是尋找到基督和祂的教會。起初他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並加入了一個精英教派。後來，在虔誠的母親莫妮卡的恆心祈求下，他來到米蘭主教聖盎博羅削那裡，並皈依了天主教。在他的《天主之城》中，他描繪出理想社會的美好願景；關於聖三位一體的研究《三位一體論》，是他的神學代表作；此外，我們還拜讀過他的《基督徒教義》，這部著作涵蓋了教會教義學的豐富內容。



① 我們有教宗了！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當選後首次和民眾見面。



① 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團到梵蒂岡西斯汀教堂獻唱，教宗本篤十六世感謝他的兄長喬治·拉辛格蒙席。



☉ 1980年，若瑟·拉辛格樞機在慕尼黑的一場音樂會上，將哥哥介紹給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 1989年，喬治·拉辛格慶祝65歲生日，拉辛格三姊弟合影。



☉ 1999年，兩兄弟造訪布拉格。



教宗本篤十六世與聖母及家鄉緊密相連。2006年9月11日，教宗回到故鄉阿爾多廷的恩慈小教堂，將主教權戒奉獻給聖母。





㊦ 2006年9月13日，喬治·拉辛格、教宗本篤十六世與雷根斯堡穆勒主教走往「老教堂」的路上。背景為教宗兄長的住所。



㊦ 教宗本篤十六世與哥哥一起參觀馬克特爾的聖洗池。1927年4月16日，若瑟·拉辛格在這裡領洗進入天主教會。

- ➊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力與猶太人和好。2009年5月11日，教宗造訪耶路撒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 ➋ 敦親睦鄰，教宗本篤十六世與雷根斯堡猶太團體領袖漢斯·羅森格爾德會面。



① 喬治·拉辛格蒙席與教宗本篤十六世到齊格斯多夫墓園，為父母掃墓。



① 教宗與哥哥一起度假。



🕒 2008年8月21日，喬治·拉辛格獲頒岡道爾夫堡榮譽市民，他的教宗弟弟致詞。



🕒 教宗本篤十六世休假時彈鋼琴放鬆身心。



① 教宗本篤十六世坐在書桌前工作。

當然，我們兄弟倆都對這些課題十足有興趣，然而，只有若瑟真正花功夫去鑽研許多教材以外的專題。而我閱讀的書籍，一般都跟課程直接相關，僅局限於考試所要求的必讀書目。

戰後在神學院的第一場考試中，發生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們中的一些修士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前線廝殺，再回來讀書，等於是面對一種全新的陌生環境。

一些事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有位來自恩爾斯貝格的同學，是位真正的勇士，在軍隊中曾榮獲中尉官階。在考試前，他向我們誇口道：「各位，我們什麼事情沒經歷過，不也從來沒瞻前顧後，現在不過是考個試，你們居然嚇得瑟瑟發抖！」在他看來，害怕考試是很丟臉的。第一場考試時，他精神抖擻地步入考場，考前還喝了一口父母帶給他的烈酒，在進教授辦公室時，他已經略帶酒意，也忘了關上門，於是，他和教授的談話我們聽得一清二楚。他在考試中的回答，真是聞所未聞！

我們的哲學教授費勒邁耶爾（Jakob Fellermeier），雖然他來自巴伐利亞的普通農家，不過老愛裝腔作勢，他評判說：「嗯，我必須說，您的回答沒什麼特別的，其實我根本不能讓您通過，不過看在您多年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分上，我還是讓您通過吧……」此時我們才意會到，這兩個人互相害怕：教授害怕這位戰場的勇士會不小心在盛怒之下對他大打出手；我們的這位同學則害怕教授不讓他

過關。

另一位來自瓦京地區的士兵，也有類似的情形。他看上去有點像粗野的農村小伙子，對哲學絲毫不感興趣，只讀了神學的核心課程。在我們的哲學教授艾斯朋貝格（Johann Nepomuk Espenberger）的考試中，他幾乎什麼都答不上來。教授不禁目瞪口呆，用巴伐利亞的方言結結巴巴地說：「哎，修生同學，修生同學，您讓我如何是好？您基本上什麼都沒答，什麼都沒答。您讓我說什麼好呢？我給您個二分，您還滿意嗎？」那位修生當然興高采烈。

第一場考試對所有的考生來說，都是一場大冒險。這些結實強壯的小伙子們已經在戰場上累積了豐富的人生經驗，到了考場上當然不會扭捏作態。不過，要他們一下子死背大量的新知識，並複述出來，又要應付許多高難度的考題，這超出不少人的能力範圍。感謝天主，最後的結局皆大歡喜，不論對他們，還是對我們的教授來說，這都不失為一樁好事！

這段時期比較特別的經驗，是福爾哈貝爾樞機蒞臨視察我們弗萊辛神學院。在就餐前，我們就聽說了。我們面向十字架站在餐廳裡，背後是「主餐桌」，樞機大人會坐在那邊。不久後，我們聽到身後傳來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整個餐廳頓時一片肅穆。樞機大人、他的祕書、神學院院長以及貴賓們步入餐廳，我們全部轉過身來向他們行注目禮。福爾哈貝爾樞機給我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是那

種能夠讓人立時肅然起敬的人。年幼時我們在提特摩寧第一次見到他時，就感受到他的器宇軒昂，氣勢非凡；如今業已成年的我們，對他的崇敬之情依然不減當年。在此期間，我們還從他手中領受了堅振聖事，我是1935年十一歲時，弟弟則是三年之後。如今再度與他相遇，我們還從他的身上感受到戰爭留下的苦難痕跡。在納粹統治時期，他也經歷了一段艱苦卓絕的歲月。

福爾哈貝爾樞機（1869-1952年）來自下法蘭克，是一位麵包師傅兼農民的兒子。在史特拉斯堡大學畢業後擔任教職一段時間，1911年，被祝聖為施佩爾（Speyer）的主教。1913年，巴伐利亞的攝政王太子路德維希三世授予他貴族頭銜。1917年，他被任命為慕尼黑和弗萊辛的總主教，四年後，教宗本篤十五世將他擢升為樞機。身為效忠於國王的巴伐利亞人，他與魏瑪共和國對立；更是義無反顧地堅決反對納粹主義，1930年，他斥責納粹主義為「異端」（邪說），宣布它「與天主教學說水火不容」。

面對納粹煽動的反猶浪潮，他先後於1923年⁹和1933

9. 1923年11月14日，當時的駐慕尼黑宗座使節巴黎利總主教，也就是後來的教宗庇護十二世，向梵蒂岡國務院彙報了「慕尼黑納粹擾亂的反天主教性質」：幾個街頭演講的首領如希特勒和魯登道夫（Ludendorff）攻擊的一個特殊物件是學識淵博、秉承良心辦事的樞機，他於11月4日在主教座堂的講道中，痛斥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於是，在上週六下午的暴亂中（作者註：指1923年11月9日的希特勒政變），一大群抗議者遊行至總主教府邸並且大喊：「樞機下台！」

年在慕尼黑主教座堂中講道，再三強調基督宗教信仰發源於猶太教。1926年，他加入了「猶太之友」組織，這是由知名天主教神職人員和神學家組成的團體，旨在追求基督宗教與猶太教的修和。根據該組織的規定，團體中的神父在講道中要竭力避免帶有「反猶色彩」的用詞。甚至連他的主教牧徽，都提綱挈領地反映了他的堅決主張：牧徽上，代表聖神的鴿子點燃了猶太教帶有七個分支的燭台，這象徵著聖神也與舊約——與猶太教，始終同在。

福爾哈貝爾樞機還態度鮮明地聲援天主教記者、《直路》的主編和堅定的反納粹先驅格里希博士。也是當時駐巴伐利亞宗座使節、教廷國務卿巴契利（後來成為教宗庇護十二世）最信任的人，他於1937年起草了通諭《心急如焚的關懷》的初稿。在這篇通諭中，教宗庇護十一世以教宗通諭中前所未有的尖銳，強烈譴責納粹主義。1934年，納粹策畫了對福爾哈貝爾樞機的刺殺行動。1938年，納粹再次掀起了反對樞機的風暴，因為他們獲知樞機曾在「水晶之夜」時掩護慕尼黑猶太拉比潛逃，並幫助他藏匿猶太會堂的珍貴妥拉宗教經典。雖然，在此期間福爾哈貝爾樞機也曾盡力與納粹斡旋以求緩和氣氛，並同意與阿道夫·希特勒進行對話，不過，他從未成為被褐色掌權者所利用的工具。

1940年，他在一封致帝國司法部長的公開信函中，譴責納粹對殘障人士的大屠殺；1941年，他公開反對學校

拿掉十字架；1943年，他與德國主教們同聲譴責納粹對其他種族的大屠殺。戰後，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天主追隨者——同時也是德國最後一批教會貴族之一，致力於撫慰民眾所承受的苦難，負責分發教宗庇護十二世慷慨捐贈的援助物資。「他與他令人崇敬的使命已經完全融為一體，這深深地觸動了我。」若瑟·拉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如是寫道。

神學院中流傳著許多關於福爾哈貝爾樞機的軼事。某一次他蒞臨神學院視察時，我們的舍監在端菜上桌時，一不小心把醬汁灑到他的長袍上。樞機不滿地看著他，而我們的舍監巴特爾竟結結巴巴地應對說：「尊貴的大人，這沒什麼，外面還有足夠的醬汁。」

還有一次，我們在走廊上遇到福爾哈貝爾樞機一行人，我們的院長也在其中，他把我們介紹給樞機大人。樞機只跟我們講了幾句話。他講話的速度很緩慢，吐字清晰，是如此地莊嚴尊貴，見到他，我們彷彿接觸到最親愛的天主。在特別的禮儀慶典中，樞機會穿上一套寬大的禮服，裙裾長達七米——也就是當時所謂的「大禮服」。在福爾哈貝爾樞機視察神學院時，我們中的一位會專門作陪托著他的裙裾，獲此殊榮的人，被我們尊稱為「伴拖裙者」。能被我們的禮儀督導選中作陪托樞機的裙裾，是項莫大的榮耀，有一次，這個任務落到弟弟身上。我們都對

他十分欽佩，還有幾個同學對他能夠托樞機的裙裾羨慕不已。不過對我來說，這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為樞機前來視察時，我都必須待在合唱團裡唱歌。

1947年夏季學期，拉辛格兄弟在弗萊辛為期兩年的哲學課程結束了。開始修習神學，若瑟·拉辛格轉入慕尼黑大學。慕尼黑大學的神學系當時被挪到了福斯坦瑞（Fürstenried）的前國王狩獵行宮。這兒的教學和生活空間十分狹窄，有時候若瑟甚至覺得彷彿又回到在高射炮基地的生活。在同一幢建築裡，不僅包括兩位教授的住所，還有神學系的會議室和祕書室、圖書館、學生們的自習室和寢室。學生們睡的是上下鋪。主科教室則設在溫室內，冬天冰冷刺骨，夏日則酷熱難當。不過，行宮美麗的大花園彌補了這些不方便。它的設計風格部分仿照英式園林，部分參考法式園林。若瑟·拉辛格常常花數小時漫步其中，整理自己的思緒、做重要的抉擇。

1947年，我們兄弟二人通過了哲學考試，晉升「執事」，成為了司鐸的候選人。弟弟與兩位同學——特勞斯坦的「同鄉」貝格（Rupert Berger）及芬肯蔡勒（Hans Finkenzeller），一起前往慕尼黑繼續研讀。我和其他人則繼續留在弗萊辛。

轉學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儘管福斯坦瑞神學系的條件十分簡陋，那兒卻擁有來自全德各地最知名的教授：來自布雷斯勞的施篤莫爾教授、邁耶爾教授和澤珀特教授，來自布勞恩斯貝格的恩根特教授，來自科隆的尊根教授，來自明斯特的施茅斯教授、帕舍爾教授和密斯多夫教授。這是當時最負盛名的一批神學家，若瑟·拉辛格懷著無比敬仰的心情聆聽他們的授課。「闖入信仰史的廣闊世界，這實在是太美妙了。」他回憶道，「我進一步開拓了思想和信仰的眼界，並開始思考人類存在的基本問題以及我個人的人生問題。」

也是從這兒開始，若瑟·拉辛格個人神學的根基不斷壯大，他的神學以聖經和教父學為出發點。不過，他絕不想「止步於古代教會」。他的著眼點更是「將真正的信仰核心從冰層中釋放出來，賦予它新的能量與活力」。1950年，他參加了神學系組織的一場競賽，比賽的題目是：《奧斯定關於天主子民與天主住所的教會學說》。

競賽於若瑟·拉辛格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年展開，這也是他修習神學的第三年。每一年，神學系的教授們都會輪流出題，學生們則根據題目匿名提交一篇相關論文。最佳論文的獲得者除了能獲得一筆小小的獎金外，那篇論文還會被系裡視同博士論文。巧的是，那一年出題的教授輪到了尊根（Gottlieb Söhngen，1892-1971年）博士，弟弟一直

對他尊敬有加，早就設想過追隨他攻讀博士學位。教授鼓勵他抓住這一契機，我也不斷從旁勸說。

於是，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他廢寢忘食地投入論文寫作，分秒必爭地進行奧斯定研究。他還閱讀了眾多其他神學家對這位偉大教父的研究專著。短短九個月的時間，他就完成了論文。這的確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因為到了十月末，我們還要準備晉升執事的典禮，這是晉鐸的前奏。為此我們要進行妥善的準備工作和避靜神工。姊姊和我也盡心盡力地幫助若瑟減少工作壓力。我負責處理大量的行政工作，而姊姊——她當時在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祕書，則幫助他將論文細心工整地用打字機打好並列印出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他剛好趕在截止日期之前交出論文。

最後當然是若瑟·拉辛格摘取了比賽的桂冠。他不僅憑此完成博士論文，還讓導師對他刮目相看。「關於奧斯定的論文，」他當時的督導阿爾弗萊德·賴珀勒——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回憶道，「尊根教授一再說起：『現在我的學生在這方面比我知道的還要多，他才是研究奧斯定的大師！』在與若瑟·拉辛格的關係上，尊根覺得自己好比是大亞爾伯特（Albertus Magnus）。這位中世紀的神學家曾經斷言，他弟子的學說，以後將比自己的理論『更為振聾發聵』。大亞爾伯特所指的弟子正是聖多瑪斯。」

不過，此時的若瑟·拉辛格在歡欣鼓舞之餘，也曾有

過徬徨不安。神學是一門科學對他有著強烈的吸引力，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他適合當一名神父嗎？在席瓦德的採訪中，教宗坦白說出了當時自己在面臨選擇時的困惑：「因為我性格比較拘謹，也沒有什麼實際生活經驗，在體育、組織和管理方面都無天賦，所以我常常自問，我到底能不能找到與人交流的途徑。」如果當上了神父，他能夠好好地引導天主教的青少年並激發他們的興趣嗎？他能夠給孩子們上好宗教課嗎？他能夠好好地跟老人和病人打交道嗎？

「我常常自問，我能否一生都甘心情願，絕不後悔？這是否真的是我的聖召？」他也擔心自己能否一直堅守獨身。在福斯坦瑞的神學系裡，不僅學生們甚至教授也都生活在狹窄的空間內，男女學生亦是如此。女性對他也有一點吸引力，雖然他從未鼓足勇氣談一場真正的戀愛。然而，不知從何時起，他突然間徹底覺悟，所有的疑慮都煙消雲散。後來的教宗本篤十六世寫道：「我堅信，天主在我身上有一個計畫，這個計畫只有在我晉鐸之後才會實現——然而，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個信念究竟是從何而來。」

1950年秋，他晉升為執事，這等於他終於明確的表態，對天主的計畫真心回應「我願意」。為了做一個好神父，他重返弗萊辛神學院，重新回到兄長身邊。在研讀神學的最後一年，兄弟檔的神父候選人，聆聽了神學院院長

霍克的牧靈神學、副院長布勞恩的禮儀實習、阿爾弗萊德·賴珀勒的聖事實習以及奧斯定會士施拉赫特（Gabriel Schlachter）的宣道學。此外，主教座堂合唱團指揮馬克斯·艾哈姆還為他們講授葛麗果聖詠課。他們這一屆學生中後來共出了三位主教，除了若瑟·拉辛格外，還有施瓦岑伯克（Franz Xaver Schwarzenböck，1923-2010年）和索登-弗豪恩霍夫（Heinrich Graf Soden-Fraunhofen，1920-2000年），他們兩人都於1972年晉牧，比若瑟·拉辛格早了五年。

我們偶爾心生疑問，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勝任神父的角色，我們適合當神父嗎？這是在所難免的。這在今天要相對容易一些，因為神父候選人有一年的牧靈實習的機會，可以到堂區實際作初步體驗。然而，當時的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會，也因此完全缺乏牧靈工作的實務經驗。

至於獨身，這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生活選擇的一部分。早在神學院時便知道，我們將成為神職人員，而神職人員不能結婚。我們從一開始就對這一點了然於心，在整個成年期也一直秉持這個態度，因而，正式晉升為執事後必須遵守獨身的義務，對我們來講並非難事。

晉升執事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更多的實現是在每日祈禱的義務上。它十分繁複，而在當時更是要複雜得多。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投入更多的時間來實行祈禱義務，



慕尼黑和弗萊辛總教區1951年晉鐸的神父：上數第四排左四為若瑟·拉辛格，第一排最右為喬治·拉辛格。

從而打破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規律。

不久後，拉辛格兄弟人生中最重大的日子，越來越臨近了：1951年6月29日星期五，在弗萊辛的主教座堂中，若瑟·拉辛格和喬治·拉辛格由福爾哈貝爾樞機祝聖為司鐸。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四十四位候選人齊聲道出「我在此！」白髮蒼蒼的樞機——已是垂暮之年了，在向若瑟·拉辛格施予覆手禮時，一隻雲雀忽然從主祭台飛了出來，直衝教堂穹頂。對於年輕的若瑟神父來說，這是一個信號，來自天主的肯定——他選對了自己的道路。在他兩張新鐸紀念卡之一，印有保祿宗徒的一句話，非常契合此情此景：「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憑自己能夠承擔什麼事，好似出於自己一般；而是說：我們所以夠資格，是出於天主。」（格後三5）

我們當然激動萬分。由於不能在大典中出一點差錯，在前一晚，我們早早就擦好了鞋，整理好服裝。我已經不大記得我們是如何度過早晨那段時光。不過，我們整理好儀容，並在盛大的遊行中從神學院走向主教座堂的場景，讓我畢生難忘。我們的興奮之情難以言表。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的節日，是我們人生中的最高潮。街道上彩旗招展，整個城市的民眾都蜂擁而至，慶典十分隆重盛大。

當我們邁進主教座堂時，管風琴音樂緩緩響起，男聲合唱團齊聲高唱。教會的禮儀，賜予我們如此美妙的經驗！整個教堂一直到最後一排都座無虛席，信友虔誠地湧進來參加這一特別的儀式，參加我們的晉鐸大典。我們的父母以及姊姊瑪利亞當然也趕到弗萊辛，還有許多親朋好友。管風琴奏起了華麗樂章，教堂裡布置著五彩繽紛的鮮花，更烘托出禮典的喜慶氛圍，並增添無限愉悅。晉鐸儀式正式開始，整個過程十分感人。晉鐸大典的高潮是向諸聖祈禱：其時，我們屈膝跪在祭台前，以這向天主表達恭順的姿勢共同祈禱和頌唱。在場所有的人，包括我們的老



若瑟·拉辛格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福爾哈貝爾樞機向他施覆手禮，他則按照晉鐸禮應答道：「我在這裡。」

師和前來參加儀式的信友們也跟著齊聲合唱，共同祈求天上諸聖降福我們。這更加深我們的確信，我們知道樞機為我們覆手降福後，我們的人生就邁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是天主所希望的，也是充滿福祉的。

弟弟後來向我們講述，在領受覆手禮時——這是晉鐸禮最為實質的環節，他曾看到一隻小鳥從主祭台飛出，歡唱著直衝教堂的穹頂。我得承認，我不曾注意到這一幕，不過我知道，他對類似的事情很敏感。也許這真的是一個徵兆，意味著天主的祝福降臨到他身上。

在晉鐸大典行將結束時，伴隨著主教座堂合唱團的動人歌聲，我們每人手持一根主教遞到手中的燃燒著的蠟燭走到前面。可惜這個儀式在今天已不復存在，當時我們卻深受感動。蠟燭的奉獻再次象徵性地表達我們願意付出自己的一生，讓福音之光生生不息、照亮世界的決心。這是整個大典儀式令人感動的結束，因此象徵我們的生命煥然一新，來到生活的天主面前服事祂——並以此為人類服務。還有什麼能比這更為美好的呢？到了晉鐸日晚上，在主教座堂旁的神學院裡——現在已改建為教區博物館，還舉行了新鐸餞別儀式。可惜的是，我們沒能參加。我們必須得在晉鐸日當晚趕回家，因為魯伯特·貝格（生於1926年，後來成為聖事禮儀學和牧靈學專家）——他是特勞斯坦市長的兒子以及我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將於第二天舉行他的首祭。我們答應為他輔祭。

我們兩兄弟的首祭，則於一週後的7月8日舉行，並且同樣也是在特勞斯坦的聖奧斯瓦爾德堂區。當時尚未有共祭的傳統，我們兩人必須分別慶祝——弟弟的首祭於清晨七點鐘舉行，我則安排在九點鐘。清晨彌撒中有聖歌合唱，九點的彌撒則是隆重的大禮彌撒。弟弟認為，應該由我來舉行大禮彌撒，因為我同教堂合唱團關係不錯，而他則願意主持清晨的彌撒，儘管它沒有那麼盛大。

前一晚，特勞斯坦胡石拉堂區的青少年合唱團——負責人是我們的一位朋友，特意認真排練，大家練唱了幾首歌曲。排練結束後，我們的本堂艾爾斯神父站到桌上，即興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神父的名字是喬治，我們總是稱呼他為「火箭喬治」，他之前還有一個外號叫「快車喬治」，這是因為，他做任何事情都飛快如火，甚至包括主禮彌撒：還不等關上聖體龕的門，他就開始行禮成式的祝福禮了——此時他甚至還站在祭台的台階上。「從堅硬的頑石中，」他以此開始了演講，「蹦出了一星火花。」頑石指的是胡石拉——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居然一下子出了兩位神父！那是一個美好的夜晚，天氣涼爽，清風拂面，空氣中飄蕩著誘人的芬芳，金龜子在我們身邊飛來飛去。

在弟弟的首祭彌撒中，「火箭喬治」還做了講道。本來我們邀請了好友阿爾弗萊德·賴珀勒在彌撒中講道，然而幾天前他發來一份電報，遺憾地告知我們，他因為剛剛接受了口腔手術而無法前來。於是，艾爾斯神父主動承擔

了這項任務——他是一位十分優秀的講道者。至於彌撒中的歌曲，弟弟一開始請求神父選擇讚美詩集中最簡單的歌曲，這樣起碼大家都對旋律很熟悉。不過，神父不同意這一點，他想選擇隆重一點的曲目，最後選定了哈斯（Josef Haas）的《基督君王彌撒曲》。



拉辛格兄弟若瑟（左）與喬治（中）和他們的朋友魯伯特·貝格晉鐸後，在家鄉特勞斯坦的本堂受到教友夾道歡迎。

哈斯曾是慕尼黑音樂學院的院長，是雷格的弟子，也是我的老師霍勒的老師，我算是他的「徒孫」。哈斯之前也曾當過音樂教師並創作一系列宗教歌曲，其中也包括大眾彌撒曲——之前提到的《基督君王彌撒曲》就是其中之一。不過，對於民眾合唱來說，這首彌撒曲難度頗大。然而神父堅持採用這首歌，這是因為它的旋律優美，氣勢恢宏。當然，這樣一來，信友們反而無法正確地應和，甚至連青少年合唱團也未能精準地演唱整首曲目。早在講道之前，神父就再三要求大家配合著一起合唱：「我只聽到合唱團的零星演唱，這根本就不算合唱！」不過，大家並沒有責怪他，因為這正是他一貫的作風。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這就是我們的「火箭喬治」。

弟弟的清晨彌撒結束後，我們先回家。不久，一隊慶祝我返鄉首祭的遊行隊伍再次過來迎接，把我們從胡石拉的父母家帶到了特勞斯坦。那是一場盛大的遊行，鼓號齊鳴，並有許多輔祭和民眾參與其中。之後開始慶祝我的首祭彌撒，我選擇的曲目是海頓的《納爾遜彌撒曲》。那是十分隆重的大禮彌撒，講道的是我以前的宗教課老師珀萊恩。我之前詢問過他，講道大約需要多長時間，他回答說，大概卅五分鐘。而實際上他只花費了廿五分鐘，顯而易見他做了精簡，不過，並未引起大家的注意。

前來參加我們首祭的民眾是如此之多，這著實讓我們大吃了一驚。之前有人還特意跟我們解釋說，當天特勞斯

坦有一場自行車賽，如果前來出席我們首祭的人數不夠多的話，我們千萬不要灰心喪氣。後來我們聽說，前去觀看自行車賽的人寥寥無幾，大多數人都趕來參加我們的首祭彌撒。當年的盛況迥異於今日。

彌撒儀式結束後，我們邀請了一百多位客人前去塞勒－地窟（Sailer-Keller）餐館享受節日大餐，端上桌來的



1951年，拉辛格兄弟慶祝首祭時的遊行隊伍。

是燻炙小牛肉。下午則是盛大的感恩祈禱。這時候，天主卻安排了一場惡作劇。上午還是晴空萬里的好天氣，沒想到共融午餐時，突然間烏雲密布，雷鳴閃電，下起雨來，而且雨勢越來越大，竟成傾盆大雨。這樣的天候，讓我們為賓客深感歉意，經過上午的酷熱之後，大雨帶來的涼爽讓人十分愜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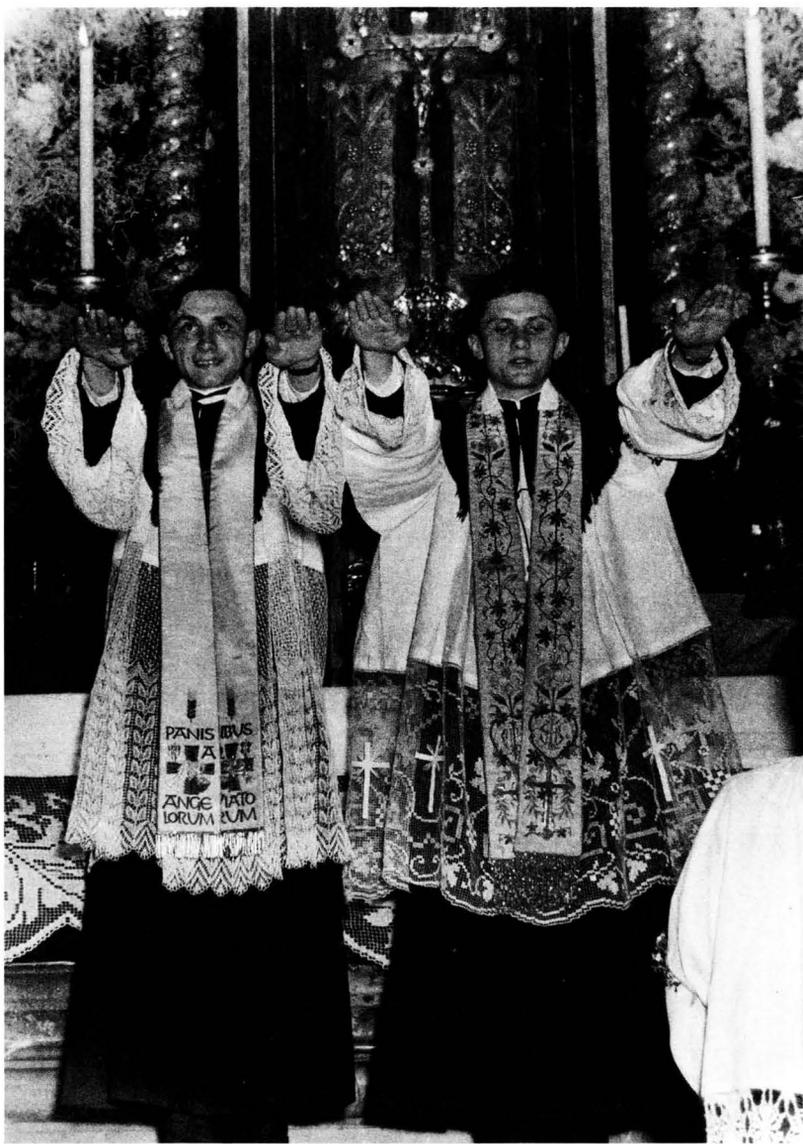
當時還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習俗：想要接受新鐸祝福的信友，需要在神父辦公室提前報名。神父辦公室有一份登記名單，轉交到我們手中，然後我們就知道接下來應該去拜訪哪些家庭。在隨後的日子裡，我們忙於前往堂區的這些家庭為他們祝福。

信友視領受新鐸的祝福具有特殊意義。「為了獲得新晉鐸神父的祝福，踏破鐵鞋也在所不惜。」巴伐利亞的居民如是說。

那幾天我們從早跑到晚，所到之處，都受到民眾熱烈的招待。每一戶人家都為我們準備了精緻的小點心，以及一點點獻儀作為禮物。不過，對於我們來說，切身體會到新晉鐸帶來的恩典與祝福，才是至關緊要的。我們親眼目睹了信友們對神父——對天主召喚來為他們服務的人，滿懷著渴望。

若瑟·拉辛格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信友是懷著怎樣的熾熱之情等待他的祝福，聖秩聖事中散發著怎樣的無限活力。一個年輕神父能給予這些民眾什麼呢？而現在，他以基督之名行事，帶給他們的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多得多。

他的第二張晉鐸卡上，寫了聖保祿的名言：「這並不是說：在信仰方面我們願管制你們，而是說：我們願作你們喜樂的合作者」（格後一24）。如今這番話已經應驗。



若瑟和喬治·拉辛格兩兄弟舉行首祭祝福禮。



Chapter 7

教授

1951-1977年

晉鐸大典和首祭之後，弟弟與我再度各奔前程——身為一個年輕的神父，我們踏上各自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我先到了格萊瑙工作一個月，弟弟則分配到了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城區。隨後，我被調到弗萊辛的總教區神學院為他們上了兩個月的課，在這裡，我與自己非常尊敬的主教座堂指揮艾哈姆密切的合作。不過，大家顯然對我抱以更高的期望，不久之後，我就被送往慕尼黑的音樂學院深造，專攻教會音樂，同時也以音樂師和副本堂的身分在聖路德維希堂區服務。我們兄弟倆當然會彼此互相探訪，每逢休假都盡量相約探視對方。我們碰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也因此，每次相聚都因得之不易而倍顯真摯。我們也總是一塊兒度假，這是任誰也無法阻擋的。

1951年8月1日，若瑟·拉辛格來到慕尼黑的聖血堂，展開他的服務。堂區位於伯根豪森城區，是這座百萬人口大都市中「最好的城區」之一，其間有個別墅區，住滿了學者、藝術家和政府高級官員，當然也包括他們的管家和女傭。其他的區域則居住著小商人和公司職員。神父的住所是由一位名建築師設計建造的，散發著溫馨舒適的氣息，儘管有時候看上去感覺有如蜂巢。堂區的核心人物布魯姆沙恩（Max Blumschein）神父，是拉辛格學習的榜樣。他教導拉辛格，要做好神父工作，必須始終保持內心「熾熱似火」，並在工作中處處以身作則。布魯姆沙恩神

父和善與熱情，並時時刻刻準備著為他人服務。哪裡有人需要他，他就會在哪裡出現，這一原則始終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在為一位病人送聖體的路上，他溘然長逝。

身為新鐸的若瑟·拉辛格神父正需要這樣一個榜樣，以應對突如其來壓到身上的重任。因為布魯姆沙恩神父時常忘我工作，毫不顧惜自己的身體，廿五歲的副本堂拉辛格也不能落後，全心全力地投身於工作當中。不久後，他就享受到服務的樂趣，尤其是在和年輕人打交道的時候。「從學術圈子裡跳出來，學習如何同孩子們對話」讓他獲益匪淺，他寫道。不過，經過希特勒的摧殘之後，宗教在許多家庭的生活和思維中已經變得無足輕重，這也是年輕的拉辛格所必須面對的時代背景。他將這段時間積累的經驗總結到一篇題為《新的異教徒與教會》的文章當中。他回憶道：「不久後，與學校裡的孩子們打交道的的工作——這其中當然也少不了與他們的家長進行交流，就給我帶來了莫大的樂趣。我很快就與各個天主教青少年團體打成一片。當然，在開展工作時我很快意識到，許多孩子的思維與生活世界已經與信仰脫節了，宗教課已經很少深入家庭的生活和思維當中。此外，還有一點我也不能忽略：如今我們依然在沿用戰爭時期發展出來的青少年工作模式，然而，它早已不再適用於新的、變化了的時代要求，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形式。」

在布根豪森，若瑟跟隨本堂布魯姆沙恩神父。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神父，很受弟弟的愛戴。事實上，弟弟很熱愛牧靈工作。特別是講授宗教課，很合他的胃口。面對一個複雜的難題，他的講解既能讓思維簡單的孩子透徹理解，又能讓悟性較高的孩子興趣盎然，在這一方面他頗有天賦。這樣的工作帶給他諸多樂趣。儘管在第一年裡他每週必須上滿十九個鐘點，但他對去學校講授宗教課始終抱持著高度熱誠。又因要為不同年級的學生上課，所以授課的內容就不能一成不變，他需要為每一堂教學精心備課。

此外，他還在教堂裡講道，不過這從來就難不倒他。每天早晨他坐在懺悔室裡一小時，傾聽信友前來告解，週六時甚至長達四個小時。每個星期，他都騎著自行車穿越慕尼黑的大街小巷，主持殯葬、領洗和婚禮。此外，他還負責堂區青少年牧靈工作。與本堂神父的友好關係，及堂區廚師的優異廚藝，讓他在布根豪森的生活十分開心。後來，當他不得不放棄這一切重新回到神學研究時，對這裡是那樣地依依不捨。那是在一年後，總主教將他調到弗萊辛神學院擔任講師和負責牧靈工作。其實，他很樂意當副本堂，繼續留在堂區服務。

1952年10月1日重返弗萊辛，若瑟·拉辛格其實是懷著複雜的心情離開他所服務的堂區的。那種「有所作為」的感覺，那些直接跟人打交道的經歷，讓他感受到晉鐸

後的喜悅，而這些是他從事神學研究時所體會不到的。另一方面，繼續探索真理，研究神學，則一直是他的心願。幸運的是，回到弗萊辛不久，他也開始引導這裡的一個青少年團體，並在主教座堂裡主持彌撒，傾聽告解。在課堂上，他教授的是聖事在牧靈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時，他在當副本堂時期所體會的新鮮經驗，剛好在課堂上派上用場。此外，他還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學業。當他於1953年7月帶著神學博士頭銜回到家時，他的父母喜出望外，無比自豪。

學術生涯並未改變他的為人。當時，我們碰面的機會越來越少，如果他身上發生了什麼改變的話，我與他再度見面時立刻就能覺察。我們的父母起初認為若瑟當上了教授，可能會變得盛氣凌人，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不過，他從未變成那種樣子。他始終保持著謙遜的本色，從未像曾教過我們的教授費勒邁耶爾那般端起架子——也許，他可能成為弟弟的錯誤示範。弟弟一點兒都沒有改變，在私下的閒聊中，他依然操著一口方言。他始終在做他自己。

我還清楚記得他博士畢業時的情形。我服務的慕尼黑聖路德維希堂區，就在慕尼黑大學附近。我當然參加了弟弟的畢業答辯及隆重的慶祝會。當時，所有的大學教授都身著制服，手持權杖，校長和系主任還穿上大禮服。在學校的大禮堂裡，新晉博士要對論文內容先做概述，再就論

題進行答辯——論題是用拉丁文寫的。我們的父母和姊姊也出席了他的答辯會。現場洋溢喜慶氣氛，讓人難忘。

隨後，我邀請家人來到我位於聖路德維希堂區的神父宿舍中，請他們吃白香腸和椒鹽卷餅，喝啤酒，大家十分盡興。我的同事——漢斯·格哈德神父，是一個單純而務實的人，神學造詣並不深。他站到我們面前，就弟弟的博士答辯乾巴巴地評論道：「聽報告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漢斯，難道你長著一顆榆木腦瓜嗎？」這次午餐聚會，為弟弟的博士畢業典禮畫上了圓滿的句點。歷經學術上的高空飛翔之後，我們再度腳踏實地的投入工作。

1953年，若瑟和我再次相約一起度假，這一次我們去了瑞士。做副本堂期間，我結識了一位年輕的神父博克勒（Franz Böckle，1921-91年），當時正跟隨恩根特教授（Richard Egenter）攻讀博士學位。後來，博克勒成為波恩大學的倫理神學教授，最後還當上了校長以及聯邦政府的顧問。他來自瑞士的格拉魯斯州，曾在庫爾讀中學，後來在蘇黎世擔任副本堂。他為我們安排了一場美好的環瑞士之旅。我們接連參觀了蘇黎世、庫爾、弗里堡及瑞士其他美麗的地方。還有一次，我們三人一起前往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他要在那裡做一場報告。我們選擇的度假地點，通常都是我們期望去探訪，能夠開闊眼界、增長見識的地方。

同年，我與博克勒博士以及我們堂區的輔祭們一道來到弗萊堡，在那兒，我同弟弟慶祝晉鐸一週年紀念。也和

前來看望我們的姊姊一起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博克勒博士則負責照顧那些小輔祭。

突然間，電話響了，弟弟走過去接電話。姊姊正好站在一旁，她注意到，弟弟的臉色一瞬間變得十分蒼白。他讓我過來接電話，我抓起話筒，裡面傳來了同事格哈德神父的聲音：「喬治，我不得不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們剛剛收到一份電報：你的父親去世了。」我們三人都深感震驚。本堂神父顯然不忍親自打這個電話，而是讓我的同事代勞。

我們即刻啟程回家。我請求博克勒照顧小輔祭，然後就和弟弟、姊姊匆匆返回特勞斯坦。當列車停靠在巴特恩多夫站時——這是特勞斯坦的前幾站，我們突然看到母親正要搭火車。我們飛快地朝她奔去，詢問道：「媽媽，我們接到了父親去世的消息，他生病了嗎？」母親一頭霧水，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是向我們確認說：「沒有啊，他沒有生病。我是將近中午時分出門的，那會兒他還安然無恙，一切都好好的。我跟他說，我要去巴特恩多夫，然後就出門了。」巴特恩多夫擁有一座建於1790年的民營劇院，是巴伐利亞的第三大劇院。經常上演各種關於聖人生平軼事的宗教劇，母親當天正是去觀賞演出。

在特勞斯坦下車後，我們乘上計程車飛快地往家裡趕。一下車，我們就看到父親正站在門口擦鞋子。感謝天主，我們頓時鬆了一口氣。後來才弄清楚，原來是父親的

弟弟安東去世了——也就是我們那位繼承了祖父母農莊的叔叔，他罹患腸癌，多年來深受病痛的折磨。他的子女給我發了一份電報，上面只有一行消息：「我們的父親去世了。」我們在慕尼黑的本堂神父和格哈德神父讀到這份電報時，誤以為電報上說的父親指的是我們的父親。所以，馬上撥電話給我們。我在出發前曾告訴他們，如有緊急情況請撥打這個電話。我們心急如焚地趕回家中，而父親正平心靜氣地擦他的鞋子！

接下來，父親當然要去參加叔叔的葬禮。我忙對他說：「爸爸，我可不想讓你一個人去。」於是，我陪伴著父親回到了他的故鄉里克利英。當天，教區的神職人員在施瓦內克辛的本堂神父那裡會面，我也受邀參加。「請你坐到這邊來。」他們把我領到餐桌前。我盡情享受了一頓豐盛的巴伐利亞早餐——燻肉（培根）、一塊黃油麵包及一杯啤酒。那天，我的胃口出奇地好。之所以對當時的食物記得一清二楚，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是因為虛驚一場後的心情一下子放鬆下來，吃什麼都覺得特別香。

第二天，我們隆重舉行了安東叔叔的葬禮。殯葬彌撒由我主持，雖然我還有一位叔叔也是神父，不過，脾氣有點古怪。他說自己太老了，身體不好，心情緊張，問我能否主持安東叔叔的追思彌撒。我當然欣然答應。葬禮後還有一場豐盛的筵席。我很高興自己能夠陪伴父親前來，此行讓我對他出生長大的家鄉有更多的認識。

1953年夏季學期結束後，若瑟·拉辛格被推舉接掌弗萊辛神學哲學學院的信裡和基本神學教席，最初，他婉拒這一邀請。他希望自己能夠先集中精力在慕尼黑完成大學執教資格論文。他的導師依然是神學家高特利普·尊根教授。尊根教授是一個熱情開朗的人，來自於一個天主教和新教聯姻的家庭，因而對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持開明的態度。尊根教授告訴若瑟，做學問時，從原始資料本身出發至關重要，後人對原始資料的分析只居於次要地位。因為拉辛格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奧斯定這位古教會教父的，因而尊根教授建議他另作中世紀的教父——聖文德（Bonaventura，1217-74年）的研究。聖文德是一位偉大的神祕主義者，也是方濟各會最重要的神學家。很快，弟弟就跟教授研討出論文的題目：《聖文德的啟示觀及其歷史神學》。

1954年夏，拉辛格集齊了論文所需要的資料，並梳理好基本思路，只剩完成最後關鍵的一步——將所有的思路付諸筆端，彙寫成一本專著。此時，他在弗萊辛的職務也確定下來。哲學神學學院的一位退休哲學教授去世後，他漂亮的教授住宅閒置下來。從1955、1956年的冬季學期起，拉辛格開始執掌基本神學教席。在此之前，廿七歲的拉辛格已經是代課講師給學生們講授信裡神學。

1955年夏季學期結束時，拉辛格完成大學執教資格論文的手寫稿。只需要找人把手稿打字謄寫。遺憾的是，

他找到的這位女打字員水準不佳，輸入速度很慢，時常搞錯手稿的先後順序，不斷出現謄寫錯誤或標錯頁碼。拉辛格簡直要抓狂了。他拚命挽救如傳染病般擴散的錯誤，一頁一頁地修改著出現的錯誤，這耗盡了他所有的力氣。直到深秋，才覺得終於能重新掌握全局了。雖然對論文的版面還十分不滿意，不過他覺得，最糟糕的地方都已經修正了。於是，他將兩份論文樣本遞交到慕尼黑大學的神學系。他對課題的研究深入而細緻，對自己能夠憑此獲得大學執教資格也胸有成竹。

與此同時，若瑟·拉辛格把父母接到弗萊辛，希望父母能夠在此安度晚年。他的父親已經78歲高齡，母親也71歲了，特勞斯坦的古舊農舍雖然周邊風光秀麗，然而，對於兩位老人生活來說實在過於清苦。儘管一家人對這所坐落於森林邊上的安靜農舍十分不捨，可惜，它實在不適合用來養老。若瑟搬入的教授宿舍面積很大，足以容納全家人同住。新宅坐落於主教座堂山上的前主教座堂諮議會莊園裡，也就是「萊辛菲爾德莊園」，緊挨著教堂，四周都是商店。姊姊瑪利亞也打算搬過來和家人一起居住。

搬家安排在十一月的某天，當天濃霧瀰漫，陰沉沉的天氣更加劇了老拉辛格夫婦的不捨悲傷。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他們生命中的一個階段的終結，儘管經歷了殘酷的戰爭，那依然是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他們感覺到，自己的生命正在不可逆轉地走向終點。即使如此，兩位老

人仍舊勇敢地接受了新生活的挑戰。安裝家具的工人剛剛趕到，母親瑪利亞·拉辛格就已經穿好圍裙上前幫忙。傍晚時分，她又站在灶台前開始準備晚飯。父親老若瑟·拉辛格則忙於指揮前來幫忙搬家的學生們。一家人為能夠再度共聚一堂慶祝即將到來的聖誕節而興高采烈。

若瑟·拉辛格當時一點都沒有意識到，前面等待他的將是怎樣的狂風暴雨。他的導師尊根教授早已閱讀了他的論文並讚賞有加，甚至已經多次在課堂上引用其中的段落。尊根的同事施茅斯教授是論文的第二鑒定人，同樣需要對論文做評定，不過，他還需要一段時間。1956年2月的某天，他開始閱讀論文。復活節的時候，科尼希施泰因舉辦了一場「德國教義學學者和基礎神學學者研究小組」的研討會，會上，施茅斯教授遇到了拉辛格，並提出要和他做一番簡短的交流。在交流中，施茅斯教授面無表情、言簡意賅地通知拉辛格，很遺憾他的大學執教資格論文在他這兒不能通過。

對於若瑟·拉辛格來說，這個消息不啻於晴天霹靂。他的世界突然之間轟然倒塌了。他該怎麼辦，他剛剛接過來的父母該怎麼辦？他本來懷著美好的信念，以為自己可以提供一棟教授宿舍，為父母親安度晚年。而如今一敗塗地，他將如同被亂棍痛打的落水狗一般狼狽地逃離學校。雖然他也可以申請到某個堂區擔任副本堂，堂區也會提供住所。然而，這並不能給他帶來多少慰藉。

後來，他終於知道施茅斯教授拒絕通過他的論文的緣由：主要是教授的虛榮心在作祟。以施茅斯為代表的慕尼黑中世紀學術研究，幾乎還停留在戰前的水準，對最新的來自法語區的研究成果視而不見。而拉辛格初生之犢不畏虎，在論文中大膽犀利地批判了某些立場，這激起施茅斯的強烈不滿。更讓他憤憤不平的是，拉辛格研究的課題是中世紀的範疇，卻居然不找他來指導。因此，儘管拉辛格之前已經盡心竭力地做過修訂，論文中仍有一些排版和註釋上的錯誤，就成了施茅斯教授竊喜不已的攻擊點，成為全盤否認整篇論文的助力。施茅斯認為若瑟·拉辛格是一名叛逆的神學家，居然膽敢對抗主流學術觀點，這是在給危險的現代主義思潮和主觀性的啟示大開方便之門。此時，在弗萊辛關於拉辛格的神學論點帶有清新的現代風格的傳言，更加深了施茅斯的這個印象。

然而，儘管施茅斯在他的同事之中德高望重，但是他對拉辛格論文的全盤否定，並未在系務會議上暢通無阻。教授們並未對論文橫加指責，而只是退件要求重新修改。修改的內容主要根據施茅斯在論文樣本旁邊所做的註釋，樣本被退回到了拉辛格的手中。施茅斯所指出的需要修改的範圍是如此廣泛，大概需要耗費拉辛格數年的時間，這讓虛榮心沒有得到滿足的教授得意洋洋。不過，當拉辛格開始研究那些滿懷惡意的評註時，他注意到，所有的批評都集中在他對啟示論的定義上，而後半部分關於聖文德的

歷史神學的闡述，絕大部分都未受指摘。於是，他想到了
一個挽救方案——把後半部單獨挑出來，將論述只集中在
歷史神學方面。於是，稍作調整之後，他很快於1956年10
月把篇幅精簡的論文重新遞交了上去。

1957年2月11日他接到消息，他的大學執教資格論文
這回應該可以通過。不過，他還是得就論文發表公開演講
並通過之後的答辯。拉辛格懷著緊張而又期待的心情迎接
2月21日這一天的到來。當天，學校為這場論文答辯安排
的大教室被蜂擁而至的學生們擠得水泄不通。空氣中飄蕩
著一種罕有的、幾乎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拉辛格的演講
結束後，論文的第一鑒定人尊根教授和第二鑒定人施茅斯
教授開始發表各自的評判。兩人之間旋即展開了唇槍舌
戰，以至於拉辛格站在一旁自忖到底還需不需要他來做答
辯。經過系裡漫長的協商後，系主任來到守候在走廊上的
若瑟·拉辛格及其兄長和幾個朋友面前，非正式地通知
他，他的論文通過了，他獲得了大學執教資格。

廿九歲的若瑟·拉辛格終於正式成為大學教授，然
而，他並沒有過於興奮。通向這一目標的道路是如此漫長
崎嶇，依舊像一場惡夢般纏繞著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
才慢慢放下這一包袱。他終於可以平心靜氣地繼續在弗萊
辛做研究和教學工作，父母也不必跟著擔驚受怕。儘管施
茅斯教授百般阻撓，他仍然於1958年1月1日成為了弗萊辛
哲學神學學院基本神學和信理神學的非教席教授。這段坎

珂的經歷至少讓他學到了一點：一旦遇到博士論文或大學執教資格論文引發爭議或面臨通不過的危險時，只要事情還有一點點轉圜的餘地，他都會竭盡全力站到弱勢者的一方。在擔任大學教授期間，他始終將這一點銘記於心。

事實上，直到後來我才知道弟弟的大學執教資格論文曾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1955年，我通過了音樂學院的考試，之後又參加大師班進修課程，不過當時，大師班課程並不發給畢業證書。我估算了一下，自己大概會在1957年畢業，當時弟弟告訴我，他的大學執教資格論文差不多也會在同一時間完成。事情之所以會發展到後來那般紛亂複雜的境地，主要是因為尊根教授和施茅斯教授之間的競爭，兩人都希望自己成為學術界更優秀、更權威的學者。為此，施茅斯幾乎摧毀了弟弟獲取大學執教資格的夢想。

直到弟弟論文答辯當天，我才獲悉事情的全部經過，因為我當時已經搬離慕尼黑很長一段時間。從1953年底開始，我被調到道芬的魯普萊希特山堂區工作。道芬的堂區教堂聖母升天堂裡面，恭置著一座令人過目難忘的聖母態像。我是堂區合唱團指揮，除要領導兩個合唱團之外，還要負責管理此地的朝聖和牧靈事務，並擔任宗教課老師，以至於根本無暇詢問弟弟的論文進展情況。

當然，在他把父母接到弗萊辛時，我也趕過去幫忙搬家。長時間以來，我們一直都在討論如何讓父母安度晚

年，最終達成一致決定——把他們接來弗萊辛是最好的辦法。如我之前所說，父母之前居住的老舊農舍，周圍是一片將近五英畝的農田。父親年事漸高，農田的體力勞動對他來說太過繁重。另外，我們在特勞斯坦的房子距離教堂有兩公里，買東西得跑很遠一段路，生活機能相當不便。當時，弟弟的同事也催促他早點在弗萊辛安頓下來。於是我們決定，弟弟有自己的房子後，就把父母接過來一起住。

事情進展得非常順利。一切安排妥當後，我們出售在特勞斯坦的房子。在此期間我還回家過一次，幫助父母整理打包。那一天我們還特意拍了一張照片留念，我們最後一次站在特勞斯坦的家門口——這棟房子長時間以來一直是我們摯愛的家園（照片請見第五章）。搬家對我們的父母——特別是對父親來說，不是那麼容易接受。父親出生成長於農家，農民對自己的產業總是十分愛惜，父親也不例外，儘管他並沒有多少產業——他實際上的職業是國家公務員而非農民。不過，他依然對我們在特勞斯坦的家無比眷戀，雖然我們把它以一個很好的價錢賣給了鄰居。

隨後，父母喬遷新居，卻無法很快適應弗萊辛的新生活，儘管弟弟從一開始就在努力為他們營造溫馨舒適的家。姊姊最初仍然留在特勞斯坦做原本的工作，直到第二年的二月，姊姊才辭掉工作搬到弟弟這裡，以便好好照顧我們的父母。

父母和姊姊大力支持弟弟的工作。當時，弟弟還需要

安排考試——每個學期都會有許多場考試。他很喜歡把考試地點安排在自己的住所。於是，父親就負責把前來考試的神學生請進屋來，把他們帶到會客室，讓他們在那裡等待。母親還會為每個學生都泡一杯茶，再端過去一小盤點心，這讓一切都顯得十分溫馨。對於我們的父母來說，這項新任務——照顧這些年輕的修士，這些未來的神父，給他們的生活賦予了新的意義。父親無微不至地關照他們，母親甚至會為他們下廚做飯。

弟弟曾給我講過一個故事。當時有位年輕的神父經常來拜訪他，他曾在羅馬讀過書，天資聰穎，撰寫的博士論文亦十分有意思。若瑟有一次跟父母談起，他覺得這位神父前途無量，也許有朝一日能成為慕尼黑和弗萊辛的總主教。此後父母接待這位神父時，總是帶著格外崇敬的眼神，因為他們相信，他將成為未來的總主教。而實際上，他後來並沒有當上總主教，而是成為副主教。這位神父叫格魯伯（Gerhard Gruber，生於1928年）。因為能講一口流利的義大利語，他先是在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上擔任德普夫納樞機的祕書與陪同，後來成為主教座堂諮議會會長和副主教。

拉辛格教授——這是當時大家對他的稱謂，在弗萊辛講授了兩個學期的課程。他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神學教授」及「神學界的神童」，眾多知名的高校向他拋出了橄

欖枝。其中一份邀請來自波恩大學，拉辛格的恩師尊根教授一直夢想在那兒獲得教席，拉辛格多多少少也繼承了這一夢想。究竟要不要接受這個職位，年輕的教授猶豫再三。不過很快，他找到了一個解決父母養老問題的辦法。

兄長喬治於1957年結束了在慕尼黑音樂學院的學業，要回到他的故鄉特勞斯坦，在聖奧斯瓦爾德堂區擔任合唱團團長。還將負責特勞斯坦神學院的音樂教育工作。堂區為他安排的住處是一棟位於市中心的漂亮小房子，足以提供三口人居住。帶著年邁的父母奔赴萊茵河地區，這是若瑟無法想像的，而讓他們重新回歸摯愛的故鄉特勞斯坦，則是最好的選擇。喬治馬上同意了這一安排，並急切地勸說弟弟接受波恩大學的職位。

之後，兄弟倆和父親交換了意見。雖然父親一時還難以接受他即將離開弗萊辛的事實，不過，他也希望兒子能夠把握住新的機遇。一家人再度暫別。這是他最後一次守候在父母身邊，享受和父母同住所帶來的安全感，之後，他就踏上了全新的人生征途。1959年4月15日，拉辛格成為波恩大學的正式教授，首次登上波大講台，授課的題目是：《信仰的天主與哲學的天主》。

事情的經過我還記得一清二楚。當時我已經回到了特勞斯坦。有一天，弟弟過來探望我，說他收到了一份來自波恩大學的邀請。他該怎麼辦，他該如何答覆呢？畢竟一

年前他才剛把父母接到弗萊辛，二老也變賣了自己在特勞斯坦的房子。我說，這不成問題，我現在一個人住在特勞斯坦堂區分配的房舍，足夠我們全家人居住了。無論如何我都要在這兒安頓下來，父母可以搬過來跟我住在一起：「他們熟悉特勞斯坦的一草一木，肯定很樂意回來。抓住這個機遇，你絕不能錯過它，一定要把握住！父母可以搬到我這兒來住，我很高興他們過來。」於是，我們兄弟達成了一致決議，只需父母親同意就可以了。1959年4月，弟弟搬去波恩，姊姊瑪利亞也跟過去幫他料理家務，我們的父母則在五月搬到特勞斯坦跟我同住。

若瑟·拉辛格很喜歡萊茵河地區，喜歡這兒開放與寬容的氛圍。巴伐利亞保留著鄉間的保守，而在這裡，萊茵河將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融合在一起，讓它們互相截長補短。在萊茵河畔這座大學城中度過的第一個學期，如同「初戀的盛宴一般」，給他「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憶」。然而，最初的興奮過後，他的人生很快蒙上了陰影。

1958年的聖誕節是溫馨和諧的節日。父親花費心思，為我們每個人都準備了豐厚的聖誕禮物。當時我們絕沒有想到，這是我們一家人共同度過的最後一個聖誕節。

搬到波恩之後，弟弟和姊姊都選擇返回特勞斯坦度假。事情發生在1959年8月，那是明媚的夏天。父親去世

的八天前，母親突然在深夜來到我的床前，告訴我父親生病了，讓我過去看一看。我下樓來到了父親的臥室。給他滴了幾滴加爾默羅精後，父親感覺好了許多。我們請了醫生來看診，不過醫生說沒什麼大礙。在他突然中風之前，他一直精神飽滿。當天上午他還走去神學院聽弟弟講道，那至少有兩公里的路程。下午，他跟母親一起散步了很久，等我到他那個年紀，可能走不了那麼遠的路了。

後來母親告訴我們，在回家的路上，他們還路過本堂，在教堂裡，父親做了一個特別深入的祈禱。一直以來，父親都是虔誠的祈禱者，不過那一天，母親從他的祈禱中感受到一種特別強烈的感情。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記號，父親一定已經感覺死亡臨近。到了晚上，他突然中風，變得毫無知覺，如同沉睡一般。

我們姊弟三人當天到提特摩寧，造訪這座童年時代居住的城市。那是一趟美好的郊遊。當我們興高采烈地回到家時，壓根兒沒有想到，這一天會這般令人震驚而憂傷地結束。兩天後的1959年8月25日，父親因為中風無法醫治而與世長辭。

我們一家人陷入極大的悲痛中。在哀傷之餘，還要辦理許多手續——當摯愛的親人去世後，總有許多後事亟需解決。這些瑣碎的事務暫時緩解了內心的傷痛。父親是如此倉促地離我們而去，我們一家共同生活的美好時光，如此突如其來地少了一家之主。從弟弟出生之日起，我們就

組成了相親相愛的五口之家，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59年8月的這個夏日。從此以後，我們失去了家中的棟樑。我們的核心，這個家庭的骨幹，永遠地離我們遠去了。

儘管悲痛欲絕，我們也明白，父親實際上是安然離世，這多少給我們一絲慰藉。他沒有承受太大的痛苦，一切都來得太快了。至少在他去世時，我們所有人都守在他的身邊，一一跟他告別。而且我們都知道並且堅信，雖然父親現在去了另一個世界，他也始終與我們同在，並將永遠守護著我們。

若瑟·拉辛格接受波恩大學職位的決定，後來證明是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抉擇——這是一場命中注定的機緣。在這裡，他遇到了生命中另外一個重要的人物，此人在他今後的人生中扮演著父親的角色，最終並為他打開通向羅馬的大門。

科隆的總主教若瑟·弗里英斯樞機（Joseph Frings），是戰後德國主教團中最令人難忘和最具影響力的教會人物。他集溫暖的幽默、萊茵地區的務實作風以及虔誠的智慧於一身，譜寫了一代傳奇。弗里英斯樞機來自諾伊斯，是當地一位企業家的兒子，身材高大頹長，他的主教牧徽上刻有——「被派來服務人」的座右銘。從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深得信眾愛戴。由於在同褐色政權的抗爭中做過特殊貢獻，教宗庇護十二世將他與另外兩位德

國主教——普萊興（Konrad Graf von Preysing）及加倫主教（Clemens Graf von Galen），一起擢升為樞機，這被視作教宗對德國教會的特殊信任。

1945年至1965年間，弗里英斯擔任德國的主教團主席。他於1946年發表的除夕講道，信友永遠銘記在腦海中。在講道中，他評價了那年嚴冬民眾洗劫運煤車的事件：「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特殊情況下個別的人可以拿取用以維持生存和健康的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不能通過其他的方式，例如工作或祈求來獲得的話。」從此以後，至少在科隆地區，fringsen（譯註：該詞是弗里英斯樞機名字的動詞化）一詞成為「設法獲得」食物和煤炭的代名詞。

當他和其他樞機於1958年選舉若望廿三世為新教宗時，他順便提了一句，他「感覺，不久後會召開新的大公會議」。那時，距離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已過了近百年時間，弗里英斯相信，又到了該傾聽主教們聲音的時刻。新教宗興奮地採納了這一主張，他宣布召開新的大公會議，並將弗里英斯納入籌備委員會當中。

我們一直十分尊崇教宗庇護十二世，因為他不僅才能卓越，而且神學修養很高，這是眾所周知的。當時反教宗的浪潮尚未興起。他受萬眾景仰，理由很簡單——因為他是我們的教宗。對於能擁戴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天賦異稟的教宗，我們當然滿懷喜悅、深以為豪。然而我們也知

道，他年事漸高，多年來備受各種病痛折磨。據說，為了盡可能地保持精力旺盛和維持身體健康，他甚至讓醫生為他注射治療。因而，當1958年10月教宗辭世的消息傳來之時，大家並不感意外，雖然我們對他的離世深表遺憾。

庇護十二世的繼任若望廿三世，風格與他迥然不同，以至於我們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他沒有庇護十二世身上那種神聖尊貴的光芒，但也因此，他的身上散發著更多人性的光輝。他是一位民眾的教宗，所有的人都喜歡他，甚至連新教徒也被他的風采所折服。

1961年初，本斯貝格的天主教研究所邀請「神學界的神童」拉辛格前來談一談對「大公會議的神學」的看法。弗里英斯樞機也從科隆來到了座談會現場聆聽報告。經他的祕書——拉辛格在慕尼黑攻讀神學時的同學路特博士的介紹，這位來自巴伐利亞的小伙子引發樞機的注意。拉辛格的報告結束後，樞機邀請他做一番私下交談。弗里英斯樞機告訴拉辛格，他草率地接下了去熱內亞做一場報告的邀請，主題是「以時代局勢為背景談一談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與新大公會議的區別」。當時的樞機已是74歲高齡，眼睛幾乎什麼都看不見了，健康狀況讓他無法勝任這項要求。他詢問拉辛格能否幫忙，年輕的教授欣然同意。

拉辛格後來遞交的初稿精彩豐富，弗里英斯主教只做了一處微小的改動。報告時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在神

學界激起頗大的迴響。聽上去，樞機像是在宣布整個大公會議的神學綱領。不久後，弗里英斯主教獲邀私下覲見教宗若望廿三世，教宗熱情歡迎他說：「我閱讀了您在熱內亞所做的報告，想要對您表達我誠摯的感謝。」當樞機指出，這篇報告並非出自自己的筆，而是由一位名叫若瑟·拉辛格的神學教授代寫時，教宗示意他停頓一下，並表示，他也常常需要助手幫忙處理文稿，最關鍵的問題在於要尋找到一位合適的人選。

從這一刻起，拉辛格已確定繼續擔任弗里英斯樞機的助手——做他「馬廄裡最好的一匹駿馬」。教宗將弗里英



大公會議神學家若瑟·拉辛格與科隆總主教弗里英斯樞機。

斯樞機納入由十人組成的大公會議主席團當中。弗里英斯樞機是主席團的成員之一，因此頻繁地收到各個委員會在籌備階段起草的各項草案與提議，將由大公會議的主教們投票決定能否通過。他將這些檔案接二連三地送到拉辛格的面前，向他徵求意見。

隨後，教會歷史上那個偉大的日子終於來臨。1962年10月11日，教宗若望廿三世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了一場盛大的彌撒，以此拉開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序幕。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千八百位主教齊聚梵蒂岡，著手形塑整個教會的未來。陪同弗里英斯樞機前來的，還有卅五歲的若瑟·拉辛格。他現在已是樞機的官方神學顧問。這是他對普世教會的第一次體驗，對他而言，這同時也是一個重大機遇——他可以參與共建教會的未來。

在會上，他結識了幾位同時代最著名的神學家：呂巴克（Henri de Lubac）、丹尼祿（Jean Daniélou）、孔格（Yves Congar）和菲利浦斯（Gerard Philips）。會議第一階段結束時，若瑟·拉辛格甚至被任命為官方的大公會議神學專家，成為「大公會議的顧問」。在大公會議的籌備階段，他曾建言，教會的「約束過於嚴厲，法條過於繁多，這反而是遺棄這個信仰缺失的世代，而不是幫它獲得救贖」。而今，終於到了邁步向前、革故鼎新的時刻。拉辛格認為，信仰必須「打破這些沉重的枷鎖，必須以嶄新的語言和嶄新的開放態度來應對當前的形勢。因此，教會中

也需要更多的自由」。

弗里英斯樞機計畫在大公會議上發揮統領全域的影響力。在他的積極推動下，所有德國和奧地利的主教們在每週一的下午五點鐘聚集在納沃那廣場)附近的瑪利亞聖靈神學院，探討大公會議的進程與成果。拉辛格躋身於高水準的神學家們當中，和大家一起就大公會議的進展發表評論並擬定方案。這是一個很小的團體，然而影響力卻十分深遠。弗里英斯樞機本人是天主教界中德高望重的領導人物之一。他是德國慈善團體「憐恤會」(Misereor)的共同創建人，他尤其廣受來自第三世界的主教歡迎。因而，他所率領的團體，譜寫了大公會議的歷史。

1962年，弟弟和我首次一起前往羅馬。當時乘坐的是一輛「特快列車」，不過，我們對這列火車竟敢冠以這個名稱深表好奇，因為它根本名不副實，基本上逢站必停。到了羅馬之後，我們當然先去參觀幾座十分著名的大殿，例如聖伯多祿大殿和聖母大殿。永城給我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若瑟之後也時常談起大公會議。大約在1964年，特勞斯坦的教區神長說服了他，請他到神學院為教區神職人員做一場報告，以見證人的身分描述羅馬發生的大事件以及大公會議討論的相關情形。聞訊而來的人絡繹不絕，院子裡停滿汽車，方圓百里的神父也全都趕了過來，聆聽弟

弟這場關於大公會議的報告。大部分的內容我都從與弟弟的交談中聽過了。整場報告相當精彩，結束後還引發大家熱烈的討論。在報告中，弟弟特別強調大公會議上的活躍氣氛：神職界出現百家爭鳴的氣象，關於神職問題以及信仰相關問題湧現出形形色色的觀點，教會第一次自由開放就各種觀點展開討論。他對這樣的蓬勃氛圍很是欣賞。

在羅馬的大公會議上，並非一直洋溢著祥和喜慶氛圍，這在不久後，就出現端倪。當新教宗談到「要適應時代」，要將教會融入新的時代時，保守的教會人士擔心這樣做會引發過多的變革。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奧塔維亞尼樞機（Alfredo Ottaviani），他是聖職聖部的部長，聖職聖部的前身正是聲名狼藉的羅馬宗教裁判所。他是神學委員會的主席，卻殫精竭慮地試圖阻撓改革。

1963年6月，教宗若望廿三世因罹癌藥石罔效而與世長辭。剛剛開始的大公會議面臨著功敗垂成的危機。然而，繼任的新教宗保祿六世撐起了重重壓力，下令繼續召開大公會議。當聽說奧塔維亞尼領導的委員會以「問題分析不夠充分」為由，想要宣布主教們的一項決議無效時，弗里英斯樞機勃然大怒。在那場或許是整個大公會議上最為轟動的演講中，他不僅批評了奧塔維亞尼的藉口和推諉，而且還直接抨擊他領導下的聖職部，斥之為「絆腳石」——那種對人只進行審判，而不採取傾聽的做法，早

已不適應當今的時代。儘管奧塔維亞尼也進行了答辯，指責弗里英斯對聖職部的工作一無所知，然而在這場唇槍舌戰中，他最後敗陣下來。主教們全都贊同科隆樞機，他們以久久不歇的雷鳴般掌聲表達對他的贊同。

就在同一天，教宗下令召見弗里英斯。樞機不免擔心最壞的結果即將發生。他以科隆式的沉穩作風，不動聲色地對秘書路特博士說：「幫我穿上我的紅衣樞機袍吧，誰知道這會不會是最後一次了。」然而，剛一踏進接見廳，教宗就奔過來擁抱他：「親愛的樞機，您把我思考過的、想要說卻不能說的話，全都說了出來。」1965年大公會議閉幕後，保祿六世宣布取消聖職聖部的權力。由「信理聖部」取而代之，喪失了掌控絕對權力的地位。新成立的信理聖部第一次採用民主原則展開工作。不再進行審判，而是提出忠告，並邀請持異議者的神學家進行對話。梵蒂岡終於由此步入了現代。

然而，也是在大公會議期間，拉辛格兄弟迎來了生命中最為悲痛欲絕的時刻：1963年12月16日，聖誕節的前一週，他們摯愛的母親與世長辭。

母親患上胃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實際上自1963年3月開始，她就常常抱怨胃部疼痛。當時她覺得，多採「地中海飲食」或許對減輕疼痛會有好處，然而，這不過是一種帝羅爾的說法罷了，類似於「要忍受飢餓，不吃飯就好

了」之類的說法——要知道在義大利統治時期，帝羅爾人的日子著實艱苦。期間她的病情有過短暫的好轉，然而，不久之後，情況再度急轉直下，她開始經常性嘔吐不止。

八月的時候，弟弟和我來到了東帝羅爾的里恩茲度假，住在那兒的「維也納男生合唱團旅館」。也是在這一時期，母親接到了住院做胃鏡檢查的通知。姊姊陪伴著她去醫院，而檢查結果證實了醫生之前的擔憂：母親患上了胃癌。

診斷結果下來之後，她仍然堅持幫我處理家務，而弟弟也不得不再次啟程前往羅馬。在這個夏天，他從波恩搬到了明斯特，他在那兒獲得了一個新的教職，姊姊則忙於幫他在這座新的大學城裡安家。隨後，姊姊回到我這兒幫忙照顧母親。

1963年夏，若瑟·拉辛格教授離開了他摯愛的波恩。明斯特的信裡神學家福爾克（Hermann Volk）於1962年夏出任美茵茲的主教，他的教席因此空缺下來。福爾克本人希望拉辛格成為自己的繼任，最初，拉辛格婉言謝絕了這一邀請。然而，當他的兩位學生的博士論文因為波恩同事的反對而面臨通不過的危險時，拉辛格似乎看到了一線暗示。可能在明斯特更能幫助這兩位學生。於是，他啟程來到了威斯特法倫的這座大學城，並且帶了這兩位博士生。後來，兩人在明斯特順利完成了博士學業。

在此期間，母親已經臥病在床，她沒日沒夜地嘔吐，深受病痛的折磨，我們那一段日子十分痛苦。母親越來越消瘦，吃得越來越少，因為她也不知道，吃進去的會不會馬上吐出來。十二月初，我給弟弟寫信，告知他母親的情況很不好。弟弟在接到信後馬上趕回特勞斯坦。我們陪伴著母親一起共度她生命的最後兩個星期。看著生命力在母親身上一點一滴地消散，看著死亡一步一步逼近，我們傷心欲絕。在她精神衰竭、油盡燈枯的時刻，我們請來神父傾聽她的告解，並為她施行臨終傅油聖事。直到最後一刻，她都憑藉著信仰的力量耐心地承受著身心折磨，如蠟燭一般，雖然燃燒耗盡，卻仍堅持著發出光和亮。

「她的善良與親切，變得更為純潔，更為耀眼，即便在忍受著錐心刺骨病痛的日子裡都未曾有過絲毫改變……在我看來，沒有什麼能比用純潔、真誠的人性光輝來為信仰做見證更具有說服力，而我的父母以及我有幸結識的許多人身上洋溢著這種人性的光輝，正是因著信仰而獲得的。」若瑟·拉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自己對母親的印象。

弟弟在馬克特爾出生時，一位鄉村醫生把母親的滿口牙齒都拔掉了，因為全都壞掉了，有些還化膿。醫生為她配了一副假牙。這口由普通鄉村醫生安裝的假牙，一直到

六十年代都完好無損。母親生病後越來越消瘦，假牙突然間顯得太大了。這給我們帶來極大的震撼：因為母親如此消瘦，假牙對她已經不合適了。

母親在寒冷冬日的中午時分去世。她走後，我們請人再次打開四年前父親下葬的墓穴。八天後，聖誕節來臨了。那是我們一生中最悲傷、最孤獨的一個聖誕節。

弟弟「繼承」了許多母親的性格，他像母親一樣，感情充沛，喜歡動物和花草。我還記得，他小時候曾花數小時在草地上種花。他從母親身上繼承了感性的一面，從父親身上則學到理性的一面。父母這兩方面的性格，在他身上和諧融合為一體。

母親生病期間，我要被調到雷根斯堡的工作已經在展開協商。母親也獲悉這個消息，並為我感到很開心。

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團指揮施雷姆斯博士多年來一直擔任合唱團的領導工作，當時，他正承受著癌症潛伏期的病痛折磨。在七十歲大壽將屆之際，他想要尋找一位合適的接班人。希望自己的繼任者是一名神職人員，並且已是有天賦的音樂家和合唱團指揮登台演出經驗。不知何時，他在慕尼黑音樂學院的前鋼琴老師胡普施（Fritz Hübsch）教授，向他推薦了喬治·拉辛格。拉辛格當特勞斯坦合唱團的指揮，在當地已是家喻戶曉。經過1963年初的首次接觸後，施雷姆斯提名拉辛格為他最喜愛的繼任候

選人。在他1963年11月15日逝世後，當地馬上與喬治·拉辛格開始接洽。

如果母親還活著的話，我不會選擇去雷根斯堡，因為我不想再讓她承受搬家的顛簸。不過，在特勞斯坦田園般的生活還是結束了。我當時住在一棟堂區分配的漂亮房子裡——所謂的「講道者之家」，父母曾在這裡過著愜意的生活。在屋前的小花園裡，母親種植了蔬菜花草，這一向是她的樂趣所在。然而，在她去世以後，這裡的一切對我



教宗父親若瑟·拉辛格（逝世於1959年），與母親瑪利亞·拉辛格（逝世於1963年）的訃聞照片。

來說不再那麼值得留戀。因此，我離開特勞斯坦，來到雷根斯堡，由此揭開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頁。姊姊和弟弟經常來雷根斯堡探望我，他們過來的時候會在合唱團留宿（即留宿在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團的中學裡，合唱團內部稱呼它為「小村落」）。新環境的四周景色優美，然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們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在雷根斯堡的最初幾年，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當時，我的前任指揮的兩個侄子也在合唱團裡，相當活躍。施雷姆斯（Hans Schrems）長久以來已經接替了叔父的工作，特別是在老團長最後病重期間，他還兼任了混聲合唱團的指揮。另一位名叫弗里茲·施雷姆斯（Fritz schrems），主要負責合唱團的財務。他們兩位對我的態度讓我感覺到，我在這兒並不受歡迎，是個多餘的人。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年。後來，漢斯·施雷姆斯不幸出了意外，1969年11月7日，有人在雷根斯堡的多瑙河橋下發現了他的屍體。這本是一件悲傷的事，不過對我這意味著合唱團中那種打壓與傾軋的氣氛終於結束——這幾年間，我時常感到自己在人性和藝術上受到了壓抑，但又缺乏精力去與之對抗。從此刻起，我才真正成為合唱團的「家長」，開始名副其實地領導雷根斯堡合唱團的各項工作。

不僅從藝術上，而且從人性上，這個蜚聲國際的男生合唱團的一切都恢復「正常」。很快，「頭兒」——這是

大家對喬治·拉辛格的稱謂，就贏得了這群合唱團男孩們的心。他憑藉著驚人的記憶力，迅速記住每個男孩的名字和經歷。新來的男孩們尤其大吃一驚，他怎麼會對自己的事情這般如數家珍。因為合唱團裡的修女們為他準備了足夠的椒鹽卷餅、糖果和蛋糕，所以，每天下午四點鐘，他都會邀請合唱團的孩子們來一場「豐盛的下午茶饗宴」。這成為每天必上演的活動，許多人在離開合唱團很長時間之後依然會前來參加聚會。

在生活上，他對這些男孩們十分親切，但在合唱練習中，他卻對他們高標準的嚴格要求。喬治·拉辛格極端厭惡不守時的壞習慣，並且要求孩子們時刻發揮最高演唱水準。正因如此，他才能讓一個主教座堂的男生合唱團在後來名揚四海。他們不僅搭乘合唱團老舊的旅遊車「小村落轟炸機」在歐洲巡迴演出，而且還兩次前往美國（1983年和1987年）、兩次奔赴日本（1988年和1991年）巡迴演出。不過，代表合唱團顛峰時刻的卻是另一場演出：1965年10月，合唱團在羅馬為參與大公會議的主教和教宗保祿六世登台獻唱。他的弟弟若瑟促成了這次大規模的演出。

在羅馬的演出當然是一個美好的經歷，這意味著我的指揮能力到達了專業生涯的顛峰。當時，我來到雷根斯堡還不到兩年，前任指揮的侄子們以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小團體勢力依然存在，不過，我已經是合唱團的團長。在

道明會天使學院的大禮堂裡，我們為參與大公會議的神長們獻上了第一場音樂會。其後，我們還在聖伯多祿大殿的一場大公會議彌撒中作聖樂禮儀服務。整個伯多祿大殿裡坐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兩千多位主教，此外還有大公會議的觀察家們。彌撒結束時，大公會議祕書費利齊（Pericle Felici）樞機由衷讚賞：「精彩絕倫！不過，現在你們必須退場了。」此外，我們還在羅馬的德國國家教堂——瑪利亞聖靈堂中，為一場美妙的彌撒作聖樂禮儀服務，那同樣也是一場隆重的慶典。最後，我們還在教宗保祿六世為巴伐利亞天主教研究院和我們合唱團舉辦的接見會中演出。這是一場為我們兩個團體舉辦的特別接見，對於合唱團的男孩們來說，能夠為教宗獻唱，是一個光榮的經驗，對我來說亦是如此。

之後，我們還為天主教科學院專門舉辦了一場音樂會，這一次，演出地點設在拉斐爾設計的一座大廳——在法爾內吉納山莊中，這是一座漂亮的義大利式宮殿。一切就如夢幻一般。對於能夠來到羅馬親身體驗大公會議的氣氛，合唱團的男生們興奮不已。我們乘坐火車前往，落腳於科爾平之家，愉悅的旅途也給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我至今仍對回程路上發生的一件事記憶猶新。恍如昨日，所有的細節都歷歷在目。我朝孩子們走去，這時候聽到，哈勒先生也在火車上。赫爾穆特·哈勒（Helmut Haller，生於1939年）是當時德國國家足球隊的著名球員。許多人奔

向他，向他索取親筆簽名。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對於我們大家來說，在羅馬發生的一切才是最有意義的。我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民眾沉醉於我們的歌聲之中。這平添了我們的勇氣和自信——我們的合唱團的確有資格到外地登台，繼而開展全球巡演。

當然了，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後隨之而來的禮儀改革，在最初落實之際，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變革。我得承認，我天生有點兒墨守成規，不大樂意輕易放棄已有的習慣。坦白說要學全新的東西並付諸實踐，對我來說並非一樁易事。我們當時的主教格拉伯（Rudolf Graber，1903-92年），以及他帶領下的整個主教座堂諮議會，對此抱以充分的理解。我們還是繼續沿用舊的禮儀。我的前任更是喚醒民眾保護雷根斯堡沿襲至今的傳統意識，因而，繼承傳統，按照以前的演唱習慣表演，被民眾視為是一種義務——雖然演唱形式這麼多年來並非一成不變。

寶貴的遺產，被前人視為重要美好的東西，本來就不應該被棄之如敝屣。因而，我們繼承傳統的做法，不僅得到了允許，還被視為義務。改革後的新元素，是循序漸進的被引入。因而，改革沒有引發劇變的痛苦，而是經過多年來一種漸進的、有機的發展過程，它使當時已經有些僵化的禮儀，重新變得生動活潑起來。

弟弟在波恩和明斯特執教期間，我常常去探望他和姊姊，並一起度假。我還藉機去旁聽波恩大學、明斯特大學

以及後來的杜賓根大學的課程。我從大學的課程總表裡挑出自己感興趣的課程，比如音樂或神學的課程。我很喜歡波恩，這座美麗的小城給我一種很舒服的感覺。我在弗萊辛認識的信裡神學教授若翰·奧爾此時也來到了波恩。他來自雷根斯堡，個性淳樸，在課餘時間總是講一口濃厚的巴伐利亞方言。我們一直相處得十分愉快。

在外執教期間，弟弟十分想念巴伐利亞的家鄉。波恩大學內來自巴伐利亞的教授——除了奧爾教授外，還有一位和我同年的中世紀學者霍德爾（Ludwig Hödl，生於1924年），讓他在波恩不再覺得那麼孤單。在明斯特，他也很快適應了工作和生活。那也是一座漂亮的城市，整潔明淨，很難挑出缺點。不過，弟弟對巴伐利亞的思念依舊。我們的姊姊也盼望能夠早日回到故鄉，也許這些因素深刻地影響著弟弟。在我們巴伐利亞人身上，對故土的眷戀之情要比北德人強烈得多。

因此，1966年杜賓根大學希望他前來執掌那兒空缺的信裡神學教席的邀請，對他來說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位杜賓根的神學家——漢斯昆（Hans Küng），對於促成拉辛格前來杜賓根大學執教，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兩人結識於梵二大公會議。直到後來，兩人才在思想上分道揚鑣。

拉辛格給他在明斯特的學生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2005年4月《萊茵通訊》採訪他們中的幾位，大家的印象基本上一致。他們眼中的拉辛格謙虛可愛，不僅思維嚴謹，而且散發著人性的溫暖。萊農（Fritz Leinung）神父當時負責幫助學生們準備畢業考試，他回憶說：「他是所有考官中最和善的一位。當其他的教授們意識到考生在某個領域掌握得很好時，往往會很快地更換考題。然而，拉辛格卻喜歡駐留在他所發現的每一片知識綠洲之上。」

當時，若瑟·拉辛格居住在阿爾湖畔一棟小房子裡。他騎著一輛老式自行車前去上課，這是學生們在一次拍賣中為他購買的。因為他沒有駕照，學生們常常在下課後開車送他回家。有時候，他會邀請學生們到家中聚餐。在他所信任的圈子裡，他也逐漸變得活躍起來，有時候還會講些瓦倫汀（Karl Valentin）的軼事和笑話。

當杜賓根大學向他發出邀請後，他跟我說，這兒離巴伐利亞要近得多。當時乘火車去明斯特的旅途非常辛苦，路上耗費的時間很長。

雖然大公會議後教會啟動的改革更為適應時代，然而，也被許多人誤解。若瑟·拉辛格是教會憲章《萬民之光》（*Lumen Gentium*）起草人之一，對於教會的全新定義做了很大的貢獻：自此，教會被定義為新以色列和「天主子民」，它以基督的身體——也就是以聖體，及天主的聖言

作為存在的基礎，因此，教會自身也成為基督的身體。伴隨「天主子民」這一新定義而來的，則是令許多人深感不安和懷疑的新事物，例如：平信徒在教會中地位的提升、主教職位獨立性的受限、主教集體權力與教宗最高權力的對抗、地區教會相對於羅馬地位上的提升，以及教會定義對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開放等等。

大公會議結束以後，信友們興奮地接受「天主子民」的新定義，然而，卻不是以拉辛格及大公會議主教們所料想的方式。突然之間，從中延伸出來的「我們是子民！」的呼聲此起彼落，「基層教會」的想法騰空而出，它反對教會的神職人員，主張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神學和聖經中的子民概念原本是一個自然等級、一個大家庭的概念，但現在突然被以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重新解讀，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人民」總是應當站在統治階級的對立面。然而，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來自天主的啟示——不需要任何的同意。教會是來自天主的召喚。

若瑟·拉辛格寫道：「天主子民概念的危機反映出教會的危機，實際上是『天主的危機』。起點已偏離了最核心的內容，其他的則是對權力的爭執。爭權奪利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發生得已經夠多了，我們在教會中不需要這樣。」為了讓信仰完好無損地邁入現代社會，羅馬方面開始全力以赴進行改革。然而，許多人沒有把「改革」理解為教會的革新，而是理解為對教會的淡化。這一主張的代

表人物是漢斯昆，當初正是他促成拉辛格來杜賓根執教，因為，他覺得拉辛格是一位改革者。

於是，在施瓦本的這座大學城裡，兩位教授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思想摩擦。再也找不出比他們的風格更為迥異的兩個人了：漢斯昆駕駛著阿爾法羅密歐跑車上下班，若瑟·拉辛格則騎著他生鏽的自行車來為學生上課；脾氣火爆的漢斯昆聲勢奪人，一躍成為進步派的領導人物，拉辛格則靜悄悄地做沉默對抗。那些認為他在杜賓根一躍轉為保守派的看法，實際是對他徹底的誤解。他只是忠於自己的內心，並且絕不隨著時代精神的風向而輕易改變自己的旗幟。

兩人的矛盾以六八學生運動為背景。學生們要求驅逐教士長袍中堆積的「千年陳腐」。他們控訴父母一代要負起納粹的恐怖統治和屠殺猶太人的責任，指責他們的自我脫罪和市儈庸俗習氣。夢想著自由的愛與獨立自主，期待著新的音樂與新的價值觀。當時的西方世界正在同共產主義劃清界限，而革命的一代則對馬克思青睞有加。馬克思主義成為新的救贖理論，天主被排斥在外，被人類的政治行動所取代：不是基督帶來救贖，而救贖只有藉世界革命才能實現！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與基督宗教從根本上就勢如水火，也就顯而易見了。儘管如此，仍有一些「進步派」神學家想練這種劈叉。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樣操練時，他們早已不知不覺脫離了信仰的堅實基礎。

在杜賓根，若瑟·拉辛格一直與他的學生們相處融洽，他的課堂上總是座無虛席。然而，漸漸的，神學學生的圈子裡也開始流傳一些傳單，在傳單上，「詛咒耶穌」的標語下，十字架被稱為「美化痛苦的施虐受虐表達」。這一刻，拉辛格無法繼續保持緘默。如果在此時依然退守寧靜的課堂，對他來說不啻於背叛信仰。起初他還認為「反抗財富實用主義」可接受，然而現在，在這暴力和心理施壓橫行的時刻，他的寬容也走到了盡頭。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這些年裡我學會了，當討論演變為謊言時，就該出手制止；為了維護自由，我必須反抗。」他與新教神學家一道建立一個行動聯盟，以阻止神學系被傾向馬克思主義者搞得烏煙瘴氣。

他還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駁斥。在一系列授課中，他不斷讚美「信仰之美」。後來，他的講稿結集出版，書名定為《基督宗教導論》。這本書在十七個國家中成為暢銷書。那獨一無二的清晰思路和優美高雅言詞，不久就為他贏得了「神學界的莫札特」的美譽。閱讀過這本書後，克拉科夫（Krakau）的總主教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認為自己和拉辛格在思想上很有共鳴。這本書的義大利版本問世後，教宗保祿六世也閱讀過它，並對他的觀點表示出強烈的興趣。1969年，按照教宗本人的意願，拉辛格被納入了宗座神學家委員會。

在杜賓根，弟弟的思想在本質上並沒有改變。不過他在這一時期將神學研究中的某些模糊之處加以澄清，並予以系統化。也就是說，他把以前做過的和教過的內容，重新歸納整理得更清楚、更完善。

不過，在這一時期，受到他的影響，周遭的環境發生了急遽的變化。1968年的學生運動如同一場流行性感冒，很快傳遍了德國和全世界。六八的氛圍更是受政治的帶動和影響，很多人將一切事物政治化，其中也包括神學。令人吃驚的是，許多神學家對此竟毫無抵抗力——其中，路德宗裡的神學家要比天主教裡的多得多。他們自己常常都沒有搞清楚，到底此時是受哪種思潮的蠱惑。他們覺得已經對情況瞭若指掌，卻沒有發現自己正在成為當前動亂的犧牲品。這場混亂不久後就平息了。甚至在合唱團裡，我也感受到這種變化。幾個大一點的男孩子在這一年間突然變得難以相處，而一年之後，他們又恢復了之前聽話的狀態，變得容易溝通。當年確實有一股荒謬的精神浪潮朝我們撲來。

弟弟確實深受其苦。當時，他的著作《基督宗教導論》剛剛結集出版，他讓學生們閱讀這本書。很多人因此迷途知返。如果他們正確理解書中的內容，並且將它內化於生活中，他們就會從那些非理性的幻想中解脫出來，重新回到現實世界，回歸信仰的懷抱。

事實上，弟弟在杜賓根的生活頗為愜意。他住在一棟

漂亮的房子裡，附近有一隻不怕生的貓常常來找他。這隻貓是他的鄰居一位女貴族養的，每當她出現在附近，牠就擺出一副跟弟弟絲毫不相識的模樣。而實際上牠每天都會潛進弟弟家裡找食物。有時候，牠還陪伴著弟弟去上課或彌撒。那是一隻非常聰明的黑色小貓咪。有一次弟弟走在路上，居然有人向他請教，怎麼才能把貓馴服得這麼聽話，怎樣才能讓牠肯陪著主人四處散步。問話的人自己也養了一隻小貓，雖然牠很喜歡主人，卻從來不肯跟他外出。

杜賓根的生活確實有美好的一面。然而不久後，雷根斯堡決定成立一所大學，若瑟決定回歸巴伐利亞。他最初是籌備神學系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並推薦了波恩的奧爾教授前來執掌信理神學教席。後來系裡又為信理神學設置了另一個教席，於是他答應回到雷根斯堡執教。對於一家人又能重聚一堂，我十分開心。

從學術發展上來看，拉辛格的這一選擇實際上算是屈身低就。當時的杜賓根擁有全德國最著名的神學系，而雷根斯堡的神學系還是一片處女地。拉辛格在杜賓根的某些同事不禁幸災樂禍，然而，他本人卻不為所動。他只想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中投入神學研究，對於跟「進步派」同事展開唇槍舌戰，他已經不勝其煩。

1969年11月，弟弟搬到了雷根斯堡。他租了一輛

汽車搬運大部分的家當，他的那位來自黑森林啤酒泉（Bierbronnen）的祕書則驅車將姊姊和弟弟送往雷根斯堡。當然，車上裝滿行李。那是一輛老舊的汽車，因為行李裝得太多，已經超出了負荷。當這輛舊車快抵達雷根斯堡市郊時，他們被一位警察攔了下來。警察要求司機出示駕照以及汽車執照。當他看到這輛車來自哪裡時，不禁會心一笑。「您是從啤酒泉來的，那好，請您繼續上路吧！」這位駕駛居然來自啤酒泉這樣一個美麗名字的地方，這給那位警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對於弟弟來說，回到雷根斯堡就如同回到了家裡一樣。神學系裡也是一派和諧的氣氛，他從一開始就跟同事相處得很融洽。起先，他租了一個房子暫住。後來，有位主教座堂的修士幫他在潘特靈（Pentling）找到了一塊地。潘特靈位於大學附近，有好幾位大學教授都住在那兒。弟弟希望在那塊地上蓋一間房子，作為我們家生活的新中心。弟弟對此十分興奮。每天早上前去教堂彌撒時，他都特意繞過去看看。在回家的路上也忍不住想像，明年冬天，這兒已經矗立著他的房子，屋子裡暖暖的，因為在那時，外面已是冰天雪地。

事情發展也很順利。弟弟雇用了一位技藝高超的建築師——沙恩寧厄爾（Hans Scheininger）。此前，他在馬勒斯多夫建了很多住宅。他給我們提了很多建議。有了沙恩寧厄爾先生的幫助，無需弟弟費時費力，整個房子就按

照他的品味和需要蓋好了。不過在房子落成啟用後，弟弟在每個週日依然先來我這兒，和我在合唱團裡一塊兒吃午飯，之後我們再結伴回到潘特靈，和姊姊一起喝咖啡，一起度過溫馨夜晚。在這裡，我們可以彼此交流近況並放鬆身心。晚上告別時，我們已經開始期待下週日的見面。這所房子也就此成為我的家園，我知道，我在那兒永遠是受歡迎的。

平日我們都工作纏身，我忙著處理合唱團的諸多事務，弟弟除了教學外還經常外出做報告，姊姊則要打理家務。不過，弟弟總是設法把週末騰出來跟我們一起度過。同時，他也努力與合唱團保持緊密聯繫。聖誕節，我們會在下午作晚禱，然後讓男生們上床休息一會兒。共進晚餐後，我們開始分發禮物，弟弟也會到場。合唱團的餐廳前面是一個小禮堂，我們在那兒慶祝聖誕節。大家一起唱歌，聽福音書裡的聖誕故事，我簡短致詞後，大家再一起唱幾首聖誕歌曲。然後，男孩們可以回到餐廳，在那裡，他們會收到聖誕禮物。我們準備的禮物約價值二三十塊馬克的，收到禮物的男孩在拆開後總是會驚喜地尖叫起來。跟以前在我們家裡一樣，男孩們也會分到一杯五味酒。整個合唱團籠罩著一片喜氣祥和的氣氛，隨後，我們大家一起去參加聖誕子夜彌撒。

因為合唱團的修女人手不足，後來她們不再負責做飯，於是，我們聘請了一位廚師。初來乍到的他並不知

道，我們分給合唱團男孩們的五味酒裡，實際上只是象徵性地滴了幾滴。而他竟然準備了一份正常分量的五味酒。結果，男孩們一個個喝得酩酊大醉，他們無法如常地唱出優美的歌曲，而只會興奮地大聲吼叫。幸好廚師下一次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當時的我們真的相信，雷根斯堡將是弟弟人生旅途的最後一站。於是，我們姊弟商量了一下，決定把父母的墓地也遷來雷根斯堡。他們在特勞斯坦太孤單了！1974年，我們將父母的骨灰以及墓碑遷移到齊格斯多夫墓園。然而，事情的發展再度讓我們措手不及。



Chapter 8

樞機

1977-2005年

1977年初，若瑟·拉辛格博士看似穩定的生活再度發生了變化。某一天，宗座使節梅斯特里樞機（Guido Graf Del Mestri）藉故前來拜訪，因為事出突然，弟弟壓根兒沒想到會發生什麼事。兩人就無關緊要的話題做了一番交談之後，梅斯特里樞機從長袍中掏出一封信函遞給他，並囑咐他一個人安靜下來的時候再拆開來看。

若瑟·拉辛格打開信件後，相當震驚：這是一封擢升他為慕尼黑和弗萊辛總主教的任命書。這個職位根本就不適合他。因為他一直在廢寢忘食地埋頭進行學術研究，他覺得自己根本無法勝任總主教這一職位帶來的種種挑戰。不過在做決定之前，他找到了一位自己信任的朋友——若望·奧爾教授，並同他交換了意見。奧爾教授熟知他的強、弱點，他也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也因此，他的回答，「若瑟，你一定要接受這個職位」，讓拉辛格頗為震驚。經過幾番猶豫和糾結之後，他終於應允了。

這個消息同樣讓我大吃一驚。當時我正帶領合唱團在外巡迴演出，我是在電話中獲悉這一切的。我還記得他被任命為慕尼黑和弗萊辛總主教的消息公布時的盛況。那是1977年的3月25日，這一天是聖母領報節，我們正在慕尼黑的聖安東尼教堂舉辦一場音樂會。十二點鐘時，整座城市響起了不絕於耳的鐘聲。我不得不說，那是十分感人的一幕。

在前往慕尼黑之前，弟弟在雷根斯堡的齊格斯多夫舉行離別彌撒。雷根斯堡主教座堂的青年合唱團為他獻唱。那是一場感人的歡送儀式。幸好這一次他距離我們不是太遙遠。雷根斯堡到慕尼黑只需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聖神降臨節的前一天，1977年5月28日，若瑟·拉辛格在慕尼黑的聖母主教座堂晉牧，成為了慕尼黑和弗萊辛的總主教。與後來他當選為教宗時的情形一樣，他認為，信友對他的歡呼，與他個人毫無關係：「信友實際上是在向作為基督奧秘代表的主教致意，雖然他們很多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天的喜悅氣氛，確實迥異於信友對



慕尼黑的新一任總主教若瑟·拉辛格接到任命書。

一位偉大人物的肯定，因為在後來他必須先展現自己的能力。而他們此時的喜悅之情，則是因為這一職位和工作如今又降臨到了一個不為謀求個人幸福而生活和行動的人身上。他為基督而活，因此也是為全人類而活。」

在就職典禮上，拉辛格發表了一席演說，大家完全可以在三十年後引用它作為其宗座時代的行動綱領：「主教不是以己之名行事，他是另一位——耶穌基督和祂的教會的受託人。他不是一位自身帶著恩典的經理或老闆，而是派遣他來為世人服務的那一位的代理人。他也因此不能隨便改變自己的觀點，不能根據情況選擇對己有利的立場，一會兒主張這個，一會兒支持那個。他在此不是為了傳播自己的私人觀點，而是以使徒的身分傳揚比他還要大的那位的福音。忠誠是衡量他的標準，同時也是他的使命所在。」

在若瑟·拉辛格的牧徽上，他選擇了「真理的合作者」作為格言。真理是他終其一生都在尋覓的，最終，他在基督身上找到了它。整個牧徽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弗萊辛的黑人，這是這座主教城市原來的標誌，對拉辛格來說，它同時也「象徵著教會的普世性」。

第二部分畫的是一個貝殼，代表著人的朝聖屬性，同時也和聖奧斯定所講過的一個故事有關。有一次，聖奧斯定正在苦思冥想三位一體的奧秘，這時，他在沙灘上看到一個孩童正拿著一個貝殼在玩耍，他用貝殼舀著海水填到

旁邊一個小坑裡。此時此景讓聖奧斯定頓悟道：正如這個小坑只能容下一點點海水一樣，你的智力也只能理解一點點天主的奧秘。因此，對於拉辛格來說，貝殼也象徵著浩瀚無邊的天主奧秘，它遠遠超越了所有科學的總和。

而在第三部分，他選擇了聖科比里安的熊，牠是這位建立弗萊辛教區的主教的寓意動物。傳說中，在聖科比里安前往羅馬的途中，一隻熊咬傷了他的馬匹。科比里安嚴厲斥責了牠，並把行李捆在熊的背上讓牠馱到羅馬，以示懲戒。

若瑟·拉辛格是一位嚴謹的主教。他知道，聖奧斯定很厭惡那些「像不吠的狗」的牧者，「他們為了避免衝突常常忍氣吞聲，因而造成毒害四處散播」。保持緘默不是主教的首要義務。他堅信，教會不能跟當前的社會精神同流合汙。於是，他對時代問題諸如「精神環境遭到汙染」、「世人貪婪地追求占有和享受」、「資本主義的貪得無厭」以及「暴力的肆虐和人類的野蠻化」等等，給予無情的鞭笞。對越南難民的問題，保守的政治家拒絕接納他們，而他則呼籲德國政府為這些人提供安身之所；對於一個富裕的國家，不這麼做簡直意味著「將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他在講道中指出，基督徒最緊要的任務是「重拾持異議者的能力，重掌對抗某些文化發展潮流的趨勢」。基督徒不應該見風轉舵，不應該作「牆頭草」。他必須鼓起

勇氣，提出不討好人喜的質疑，必要時甚至不惜得罪人。後來的本篤十六世從來不贊成天主教跟隨時代思潮隨波逐流，他最看重的是價值觀。

在此期間，德國天主教徒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同波蘭和解。德國和波蘭的主教在戰後不斷互訪，於是，不久前晉升為樞機的卡羅爾·沃伊蒂瓦，結識了拉辛格這位主內的兄弟。這位克拉科夫人（波蘭人）身上有「質樸的人格特質，率真、開放與誠摯」給拉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眾能感覺到，他是天主的人。」

晉升為主教短短三個月後，教宗保祿六世就擢升剛剛年屆五十歲的總主教若瑟·拉辛格為樞機。1978年，他以樞機的身分在間隔不到幾週的時間裡兩次參與選舉聖伯多祿的繼承人：先是若望保祿一世，在他繼位第卅三天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後，又選出了若望保祿二世。在當選為第264位聖伯多祿繼承人的短短兩年後，這位來自波蘭的教宗就決定造訪德國。他的其中一個目的地正是慕尼黑，在那，若瑟·拉辛格樞機將負責接待他。

那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這位偉大的波蘭人，弟弟之前已經給我講過許多關於他的事情。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渾身散發著無窮的魅力：一方面，他高貴莊嚴，讓人肅然起敬；另一方面，這種尊貴又不同於福爾哈貝爾樞機，後者給人的感覺有一點可遠望而不可及，然而，若

望保祿二世身上所流露出的尊貴同時又讓人樂於親近，洋溢著和善與友好的氣息。這兩種氣質在他身上渾然天成地融為一體，使他深受信友愛戴。

我們合唱團也有幸在教宗蒞臨慕尼黑時演唱：教宗在這兒接見了一群藝術家，在接見中，巴伐利亞廣播電台合唱團以及我們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團為教宗獻唱。對於合唱團的男孩來說，這是一個莫大的榮耀。時至今日我依然保存著許多當時的照片。這是百年來教宗首次拜訪德國。對於我們以及所有親近教會的人來說，這代表全新的局勢。之前教宗對於我們來說只是一個遙不可及、高高在上的職位，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相隔十萬八千里。如今他一下子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家鄉同他相遇，這對我們的確是一個非比尋常的經歷：突然間，我們在慕尼黑跟教宗面對面了！

很顯然沃伊蒂瓦教宗同接待他的慕尼黑樞機若瑟·拉辛格相談甚歡，以至於短短一年後，教宗就計畫將他調往羅馬出任信理聖部的新部長。在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上，若瑟·拉辛格身為評論者對梵蒂岡的這個機構的改革貢獻極大。他再次猶豫不決，不斷尋找種種託詞來婉拒教宗的任命。

起初他覺得，不能就這樣捨棄自己的教區。此外他還認為，偏偏任命一位神學家來評判其他神學家是很不明

智的——他們可以馬上為他扣上結黨分裂的罪名。他該如何將這個常伴教宗左右的高級官方職位與著書立說的神學家身分結合在一起呢？他即將領導的這個梵蒂岡機構，面對偏偏剛在不久前禁止他在神學系繼續執教的前同事漢斯昆，若他答應了下來，又將出現怎樣的情況呢？為一個深深眷戀故土的巴伐利亞人，他能適應羅馬的生活嗎？

然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始終不肯收回成命。最終，在教宗遭遇刺殺後，拉辛格樞機答應了。1982年，他與一直為他打理家務的姊姊瑪利亞一道搬到了台伯河畔。喬治·拉辛格則留在雷根斯堡。

哎，我也知道，我的建議是無足輕重的。坦白說，我很遺憾弟弟又要踏上遠方的征程。當時我還拜託霍夫納樞機（Kardinal Höffner），能否阻止這一任命。然而，他對弟弟即將前往羅馬表示贊許。在最初一刻，這對我真是一個不好的消息。因為他調離後，我們兄弟無法再像以前那麼親密無間了，這讓我很傷心。我們當然還是會跟從前一樣，一起外出度假。到了諸聖節，他只能派姊姊回來為父母掃墓。直到姊姊去世後（1991年），他才又回來。聖誕節的時候——更準確地說是在節日過後，他總是會來雷根斯堡住幾天。此外基督升天節和夏天的時候他也會過來探望我。而我也盡可能地前往羅馬度假。我們三姊弟之間的感情並沒有因為距離遙遠而淡化，只要肯付出努力，總是

能找到相聚的機會。於是，我漸漸習慣了這新的局面，也逐漸看到弟弟積極接受這任命。

不過我覺得，他並不是那麼願意前去羅馬。實際上他很想說服教宗讓他繼續留在慕尼黑，也列舉了許多合情合理的理由。然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堅持認為慕尼黑固然重要，羅馬更為重要。這促使他最終做了這個抉擇。

的確，弟弟在羅馬負起全新、偉大而又重要的任務。他的前任奧塔維亞尼樞機（1890-1979年），聲名不躁。聖職部——也就是信理聖部的前身，當時給人的印象是，思想太狹隘。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誤會，原因是出於不同角度的觀點而已。哪裡有秩序，哪裡就有試圖破壞秩序，以及不理解和不承認秩序的人。因而不得不再重建秩序，讓它更為清楚和明確。我慢慢地才領會到這一點。弟弟擔任慕尼黑總主教時選擇的標語「真理的合作者」，從這一層面來說是提綱挈領的，它一語道破了上述觀點以及他在羅馬的使命。

若望保祿二世曾閱讀過拉辛格的全部德文原著，他對拉辛格的認識要比拉辛格對他的認識深刻的多。他的選擇，證明了他擁有卓越的領導才能。拉辛格則與他是完美的互補，他填補了若望保祿二世不足之處——一位是健壯活躍的波蘭人，一位是纖弱靈敏的德國人，再也找不出性格如此迥異的兩個人了。魅力四射、性格外向的「若望保

祿超級明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教宗」，他想要擁抱整個世界；拉辛格則與之相反，他文靜沉默、個性內向，是一位謙虛謹慎、不愛公開露面的思想巨擘。若望保祿二世是神祕主義者與詩人，拉辛格則是神學家與分析家；前者表達出教會偉大的胸懷，後者則代表著教會敏銳的洞察力；一位的不足，恰好另一位來加強。

拉辛格以德式的嚴謹來面對他的新使命。為了將他領導之下的信理聖部年輕化、國際化，他從五大洲的大學中招攬了許多教會法學家和神學家。最後，他的手下彙集了卅九位同事。大家以友好的方式共事。他傾聽每一個人的聲音，有時候，幾位同事甚至會在喝咖啡的休息時間湊在一起討論重大問題，各抒己見。一位跟他密切共事過的同事說：「他從不介意別人質疑他的觀點，從不固執己見，並且很爽快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對於相左的意見，他總是耐心而深入地傾聽，之後再審慎地給人回覆。寫東西時他總是下筆如神，一氣呵成不必再加以修飾。他工作時就是這樣的全神貫注。從某方面來說，他真是一位天才。」

羅馬人在當時就已經十分愛戴若瑟·拉辛格，因為他從不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他們知道，他早上六點鐘起床，晚上十點鐘上床睡覺。每一個清晨他們都會看到，他胳膊下夾著一個破舊的皮資料夾穿越寬闊的伯多祿廣場，步向辦公室。當一些遊客把他當成一名普通的神父向他提問時，他總是友善地予以回應。他精通十種語言，跟每個



人都能交談幾句。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以至於有些人誤以為他是法國人。「神父，您知道教宗住在哪裡嗎？」
「知道，就在那上面。最上面一層的最後三扇窗戶。」
「謝謝您神父。我們真想上去看一看。您也想吧？」這時，拉辛格樞機總會露出一個頑皮的微笑，不過他什麼都沒有說。他至少每週可以見到教宗一次。

下午時分，他經常到聖伯多祿廣場對面老城區的「庇護大街」上走走。他認識那兒的每一個人，經常停下來跟店員打招呼。一個生活在羅馬的巴伐利亞人。他最喜愛的餐館是「帝羅爾餐廳」，那兒有價格便宜的阿爾卑斯山區特色美食，比如麵包、湯團或配有香腸的燉牛肉。他從不喝酒。看到他吃魚時配一杯柳橙汁，義大利人甚至會覺得有點驚訝。他在布置得很簡單的住宅裡，在陽台上種滿了花草，這是他引以為傲及喜樂的事。他將情緒傾注在鋼琴上，常常以演奏莫札特的作品來放鬆一下。他滿懷愛心對待社區的大貓小貓。漸漸的，在義大利人眼中，這位「德國人」簡直比羅馬人還要像羅馬人——他們很慷慨地忽略了他不喝葡萄酒的問題。

到了羅馬之後，他並沒有什麼多大的改變。他一直都忠於自己的內心，性格始終如一。他是如何適應那裡的工作？我了解不多，我無意去摻和他的工作。事實上，他的工作沒有什麼大的變化——雖然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目標都

改變了，他還是有計畫地延續之前的方向，他平穩地轉換自己的角色。

他和教宗的關係一直都很好，每週五教宗接見他。梵蒂岡的規矩是這樣的：星期一，教廷國務卿晉見教宗，星期二則輪到教廷國務院的祕書處以此類推。教廷裡每天都有位高級官員前來參見教宗並作工作彙報，週五則輪到身為信理聖部部長的弟弟。在他前去晉見教宗時，我常常陪伴他一直走到聖安娜門——這是梵蒂岡的入口。他很少談起教宗接見的具體情形。弟弟一直都很尊敬若望保祿二世，不論是對他的和善與為人——他流露出的慈父心腸，還是他的淵博學識，都讓他對他肅然起敬。

傳言中弟弟會去餵養社區的大貓小貓，這只道出了一半的真相。羅馬的貓都太過於羞怯。關於他與貓的故事，真實且有人做見證的是：每週四，他都會在墓地教堂——也就是梵蒂岡內部德國墓園裡的教堂中，舉行清晨彌撒時，墓園裡會有一隻貓特地坐在那兒等他。牠只在每週四出現。在毗鄰的樓裡住著一些德國神學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每到星期四他抵達墓地教堂的時候，那隻貓就已出現在教堂門口等待他的撫摸。我得說，我們拉辛格家的人都很喜歡貓。一隻乖乖的「小貓咪」真的很惹人憐愛！不過，就如我先前所言相同，羅馬的貓都太過羞怯了。

坊間傳言弟弟跟我的鄰居霍夫鮑爾的貓「奇科」關係也很好，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奇科有時很凶。牠小時候

很乖，但在年紀大了之後，牠的脾氣漸漸變得不好，常常對人亂抓亂咬。有一次，弟弟正待在潘特靈的家中，這時候，奇科悄悄地潛入。當弟弟要離開時，他自己根本不敢把貓抱出去，而是叫霍夫鮑爾先生把奇科帶走。弟弟頂多只敢摸摸牠，至於其他的動作則完全不敢做……奇科是一隻很難相處的動物，牠的胸膛裡肯定跳動著兩顆心臟。

拉辛格樞機在羅馬的任務是，定義、傳播與保護教會的教義學說。他無權獨斷橫行。教會信仰的內容，早已在《聖經》中和近兩千年的教義傳統中確立下來。為給全世界的信徒提供一份可靠的教義總結，若望保祿二世於1986年委任他編纂一部有約束力的教理問答。五年後的1991年，這部著作終於問世。「這當然是一本出於人之手的書，可以一直對它進行修訂從而使它日趨完善，」拉辛格說，「不過這同時也是一本很好的書。」這部書在全世界成為暢銷書，僅僅在美國就售出了二百多萬冊。教宗還委派他編纂其他書籍，例如2000年出版的對《法蒂瑪的第三個祕密》的評論，以及對《主耶穌》的註釋。

拉辛格團隊的任務是，避免天主教會的學說在傳播過程中內容遭到破壞乃至被歪曲。如果天主教會的一位官方代表發表的言論與教會明確規定的教義大相徑庭，他們就必須適時加以提醒。若某位由教會聘請的教授，當在培育神父接班人的課堂上講授他對基督宗教的私人見解時，那

麼，這就違背了他受聘的合約。世界上的任何一家公司，員工都必須信守企業哲學，玷汙公司聲譽的員工會被開除，這是公認的企業規則。然而，當教會採取類似的做法時，卻往往引起軒然大波。拉辛格常常成為替罪羔羊，他被媒體稱為「天主的守門犬」、「坦克樞機」以及「大宗教裁判官」。「守門犬也有很和善的。」有一次他幽默地對此回應。

事實上他從未試圖去壓制別人。「他總是以一種溫柔輕緩的語調講話，從來不會大嚷大叫，更不會惱羞成怒，」他手下一位跟他密切合作過的同事告訴我，「他從來不會先入為主，願意同每一個人進行溝通。他尊重每一個人，從來都是對事不對人，批判的只是某些人所持的錯誤觀點。與其同對手爭得面紅耳赤，他更樂意邀請他一塊用餐，在安靜的環境下依次地分析給對方聽，讓對方知道究竟是哪裡想錯了。他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總是保持著安靜、友善而又委婉的態度，不會讓人感到受傷害或攻擊。」

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對他冷嘲熱諷，甚至在神職界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德國。人不敢攻擊廣受歡迎、魅力十足的若望保祿二世，就把拉辛格拉出來「墊背」說：「教宗表示了同意，然而拉辛格不讓他這麼做。」內部人士都知道，這純粹是無稽之談。「若望保祿二世身上帶有典型的波蘭人固執，他絕對不會受任何人的左右，」他的同事

說，「拉辛格更不敢去操縱教宗，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對教宗無比敬重，另一方面也因為他覺得自己微不足道。」

拉辛格從來不會玩政治手段和搞陰謀詭計。他從未試圖發展個人勢力，從不分黨，他從原則上反對那些自視為精英人士的小團體搞秘密勾當。他對權力、升遷和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從不感興趣。書籍是他的整個世界，發現真理是他的唯一目標，信仰是他的全部生活。當他身著彌撒祭衣置身於一群樞機當中時，他們能從他近乎童稚的表情上，從他虔誠地合在一起的雙手上，感受到他的純真。「他是一位祈禱的人，是稱得上『敬畏天主』的人，他懷著熾熱的心舉行彌撒——他是一位真正的司鐸。」他的同事這樣跟我說。

面對別人的攻擊，弟弟的內心當然十分痛苦，他不會對此無動於衷，他會選擇站出來應對這些非議。不過我從未跟他談論過這些事。我希望通過我們之間自然的、毫無拘束的相處來沖淡這些不愉快，讓他從內心遠離這些攻訐。至少在我這裡，他能享受到他所熟悉和熱愛的正常生活。在我們的姊姊去世後，情況更是如此。

如前所述，在最初幾年弟弟總是讓姊姊在諸聖節的時候回雷根斯堡為父母掃墓。1991年姊姊又回到了潘特靈，她當然住進了弟弟的房子裡。在她到達的當天，鄰居突然給我打電話，通知我姊姊生病了。我馬上趕了過去並請醫

生前來醫治。醫生確診為心肌梗塞。我們叫來了救護車，把她送去了仁愛兄弟會醫院。那裡的會診先是說病情不是很嚴重，很快就會好轉。然而，到了1991年11月2日，突然就不許我進入她的病房。我接到通知要我先去見一位女醫生。隨後她告訴我，姊姊現在腦部大出血，已經失去意識。在同一天的傍晚時分，她因腦出血無法醫治而去世。弟弟得知消息後立刻趕過來。1991年11月8日，主教為姊姊在雷根斯堡的主教座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思彌撒。隨後，姊姊的遺體就安葬在齊格斯多夫墓地我們父母的身旁。

瑪利亞·拉辛格的訃文中寫道：「卅四年來，她不辭勞苦，全心奉獻，寬容謙卑地陪伴著弟弟若瑟走過了人生的每一站。」

當時弟弟的身體也很不好。他的頭痛經常發作，於是去機場附近的修女院休養幾天。也因此，姊姊只訂了回雷根斯堡的單程機票而沒有確定回程的日期，因為她擔心弟弟突發意外而隨時需要她趕回去照顧。倒頭來辭世的卻是她而不是弟弟。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天主的這一安排，我們兄弟的感情變得更為深厚，弟弟也更重視同我的關係。無論如何我們都很明白，現在世界上只剩下我們兄弟二人相依為命了，我們的家庭又永遠失去了一位成員。

也因此，我們更頻繁地一起度假。有些地方我們百

去不厭，例如南帝羅爾的布雷薩諾內，我們一直很喜歡去那裡。再如霍夫加施泰因（Hofgastein），他在一場演講中結識了那裡的本堂神父。我們還高興地參觀了伯多祿小修院，這是林茲的修院和人文中學。當然，休假時他總是隨身帶著工作處理，包括大批的信件，天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事。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會抽出足夠的時間去長途散步和郊遊。我們經常收到各類邀約，再從布雷薩諾內或林茲出發去另外一個地方。通常有人會借車子給我們。我們一直很喜歡這樣四處遊覽。除此之外我們還一同舉行清晨彌撒，一起吃早餐。一般上午的時候他會忙於工作，之後我們一起吃午飯，下午如果他不需要繼續工作的話，我們就一塊兒外出散步。為了在一起共度一段美好的時光，大多時候我們每日的安排都很輕鬆。

除此以外，他當然也會定期前來雷根斯堡，一年大概會過來三四次。我們經常在他潘特靈的家裡一塊兒吃飯。幸運的是，好心的修女們已經一早為我們做好了飯菜並放到冰箱裡，我們兄弟都不怎麼會做飯。吃完飯後弟弟洗碗盤，我則在一旁負責擦乾。之後，我們會出去散步一會兒。在路上，我們一起談論天主、世界、時事以及日常生活瑣事。他對這個家十分留戀，我也是如此。當他去羅馬後，每週日我都會到潘特靈幫他照顧房子。我還常常在那裡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房子還在」，他不需要擔心。

1994年，我在主教座堂合唱團服務了三十年後，退休了。弟弟為此專程趕來了雷根斯堡。他在主教座堂主持了大禮彌撒並做了一場精彩的講道。那是一場盛大的彌撒，整個大教堂座無虛席。最後，合唱團在一位歌手的指揮下唱起了孟德爾松的合唱曲《因為祂命令祂的天使》，這首曲目總是在特殊場合下才會被選用。一曲完畢，教堂裡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隨後我們還在科爾平之家舉行了一場餞別晚會，弟弟發表了演說。會上籠罩著一片哀傷的餞別氣氛，不過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我已經年滿七十歲了，神父到了七十歲退休是很平常的事。我平靜地接受這個事實。當合唱團的男孩外出度假時，我和海恩德女士一同張羅搬家事宜，那時我剛剛雇用了她。時至今日她依然是我的女管家。

那時的我並不想搬去羅馬，直到今天我也沒有這個想法。那裡的房租太貴，想要找個過得去的便宜房子十分困難，更何況我只能說幾句生硬的義大利話。我盼望弟弟能夠多來看望我，這就足夠了。

這實際上也是弟弟的計畫。他不想再回到德國，即便是退休後也不想回來了——他本來希望在2002年退休。他多年來積攢的圖書汗牛充棟，當初在他前往羅馬時要跨越整個阿爾卑斯山把這些書搬運過去，他實在不想再搬一次了，更何況在潘特靈他也沒有足夠的空間放進這麼多的書籍。因此，他打算繼續住在羅馬，不過可以經常往返德

國，甚至可以在德國長時間停留。此外他還打算撰寫幾本書以及結束手頭幾項未完成的工作。然而，若望保祿二世不願意放弟弟離開。教宗再三地挽留他繼續擔任信理聖部部長。最後，選舉教宗的樞機祕密會議，徹底打亂了他所有的未來計畫。

於是，他擔任慕尼黑和弗萊辛總主教時印在牧徽上的聖科比里安的熊，真的成為他的人生象徵。令人稱奇的是，熊在他的人生中一直扮演著特殊的角色。1928年初，當他還小時，在馬克特爾的櫺窗裡看到了一隻泰迪熊並深深地愛上它。後來，這隻玩具熊成為他的聖誕禮物。此外他還收到另外一隻更大的泰迪熊。他很喜歡並珍視這兩隻玩具熊，因此熊在我們家一直占著特殊地位，我們都對牠頗有好感。然後，在聖科比里安的傳說中也出現了一隻熊。牠最初扮演的是一個反面角色，咬傷了聖人馱載行李的馬匹。不過在聖科比里安狠狠地斥責了牠一頓之後，牠終於幡然悔悟，並把主教的行李馱到了羅馬。這是一個美好的故事，同時也寓意弟弟的人生。

當慕尼黑和弗萊辛的總主教，弟弟不光是聖科比里安的繼承人，還是第一位被永遠召叫到羅馬的接班人，他留在羅馬，後來成為伯多祿的繼承人。聖科比里安的熊在到達羅馬後獲得了自由，弟弟則必須承擔起親愛的天主放在他身上的重擔，直至生命的盡頭。不過，這個重擔充滿了恩典。

當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6年9月重返家鄉巴伐利亞時，他借用了聖科比里安的熊的故事，並引用聖奧斯定的話說明：「因為你，我成為負載行李的動物，不過正因為如此，我才能『永遠留在你的身邊』。」正是因為身負重任，這隻負載的動物才能一直待在命令牠的人身邊。教宗亦是如此。因此，熊一直激勵著他，「以新的目光，心懷喜悅和信任來完成自己的使命，每一天都對天主說我願意……聖科比里安的熊在羅馬得到了釋放。而在我的身上，天主做了另外一個決定。」



Chapter 9

教宗

2005年～

和大多數的天主教徒一樣，我也聚精會神地關注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最後的人生旅途。我清楚地意識到，一個偉大的生命正慢慢消逝。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難以從最後的這場重病中康復，也因此，民眾格外欽佩他如此耐心而鎮靜地忍受病魔的折磨。他甚至鼓勵前來羅馬的民眾不要灰心喪氣，並在自身無助和絕望的情況下，依然散發即將回歸天主身邊的愉悅和信心。這就是這位偉大人物滿懷尊嚴的結束在世生活的方式，他將繼續在「天上」發揮自己的能力。

令我驚奇的是，許多年輕人也自動自發前往羅馬，以實際行動表達對這位偉大教宗的支持。之前我們總是聽到，年輕人不願意再同教會扯上關係。然而，此情此景，無疑是對這一論調的最好駁斥，讓人終生難忘。的確許多年輕人在不知不覺中為教會所吸引，一旦他們覺察到，日常生活中的經歷無法解答他們的疑問，無法賦予他們生活的意義，人類的確需要超驗性的事物，需要信仰。

在接下來的兩週裡，大家總是問我，弟弟是否將成為教宗。這其中也不乏許多記者提問。我的回答只有一個：「不會的，他肯定不會當上教宗的。」樞機團不會選擇一個他這般年紀的人當教宗——他當時已經年屆78歲了。若望廿三世的情況與此不同。他的前任庇護十二世在位的最後五年裡一直沒有召開御前大會，沒有擢升新的樞機，這導致當時的樞機團年齡老化相當嚴重，因而不得不選舉一

位年邁的教宗——若望廿三世當選時已經76歲（馬上就要77歲）了，然而依然比2005年樞機團召開祕密會議時的弟弟小一歲。2005年的樞機團是前所未有的壯大，在此之前任何一屆祕密會議召開時都沒有如此眾多的樞機，各個年齡層都湧現出大量的天才人物，因此樞機們沒有必要選擇一位年邁的候選人。當時的我十分肯定，下一任的教宗年紀不會太大。

我甚至親眼觀看了「我們有教宗了！」的電視實況轉播。當時有一位女記者打電話告訴我，她聽說，在羅馬升起了白煙，並詢問我是否知道更多的情況。「不」，我據實回答道，「我也不知道」，隨後打開了電視機。和許多人一樣，我也是從電視裡獲知這個消息。

那是2005年4月19日，樞機團祕密會議的第二天。當新任教宗接受選舉結果，選票於下午五點四十分被燒掉後，西斯汀教堂的煙囪裡本該冒出白煙。

然而冒出的煙最開始時是灰色的，在點火的時候遇到了困難。當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的信眾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四千多家媒體還在對訊號煙的顏色做種種揣測的時候，六點六分，聖伯多祿大教堂的鐘聲響起。於是每個人都知道，新教宗被選舉出來了。成千上萬的人群湧向聖伯多祿廣場。

六點四十分，智利的樞機埃斯特維茲（Jorge Medina

Estévez) 穿過聖伯多祿大教堂廊柱的厚重紅色幕簾，走了出來。他先以法語、義大利語和德語向群眾致意，然後用拉丁文說道：「我要向你們報告一個大喜訊，我們有教宗了！」人群中爆出一片歡呼，接著，他才繼續宣布當選人的名字：「他是最尊貴且最可敬的若瑟大人。」念到這裡他稍微停頓了一下，頓時可感到空氣中的緊張氣氛。

當他公布了「若瑟」的名字之後，我的心已繃得緊緊的。我知道，現在的情況萬分緊急。我很緊張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

隨後，宣報者繼續宣讀：「至聖羅馬教會的拉辛格樞機。」

宣布的名字居然真的是拉辛格！坦白地說，在那一刻，我有點難過。我不自主地想到，這對他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一個艱巨的任務，並且開始為他的未來擔心不已。我沒有看到這一職位的尊榮與美好，而只看到它向弟弟提出的挑戰以及給他帶來的沉重壓力。同時我也很悲傷，他以後顯然不再會有時間陪伴我了。因而，這一個夜晚，我是懷著壓抑的心情上床休息的。整個晚上直至第二天的下午，我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然而這對我已經無所謂了。我沒有接電話。「我才不想理會呢。」我當時想。

我也沒給弟弟打電話。我想反正也找不到他，他現在身邊一定圍滿了人，大家都想接近他。他在第二天清早打電話給我，更確切地說是：他當時想打電話給我，不過因為我這兒電話一直響個不停，讓我倍感煩躁，而沒接。「響就響吧，反正沒有我你也會響個不停的。」我喃喃自語。而那其中就有弟弟的來電！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的管家海恩德女士走過去接起了電話，因此，弟弟在電話裡聽到的先是她的聲音而不是我的。

當海恩德女士意識到這位執意撥打電話的人不是別人，而是教宗時，她十分驚訝。如果我沒有記錯，她當時沒有立即讓我過去接電話——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無論如何，我們談到話時，已經過了好一會兒。幸運的是，現在我的臥室裡安裝了另外一支電話。一位熟識者聽說我每天都要接無數電話，可能沒辦法及時接聽弟弟來電的情況後，幫我想出了這個辦法。第二支電話號碼只有弟弟知道。當這個電話響起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我的教宗弟弟打來的。然而當時，我還沒有這支電話。

在電話中，他已經鎮定自如了。但他告訴我，在選舉結果公布的那一瞬間，他宛如晴天霹靂。他從未料想到自己會當選，投票結果來得太過出其不意，顯然是聖神在其中運作。他很快就順從了聖神的安排，因為他從中意識到，這是天主的意願。

如今，若瑟·拉辛格樞機當選為聖伯多祿的第265位繼承人。耶穌曾對羅馬宗徒們的殉道所做的預言，放在他身上似乎也恰如其分：「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給你束上腰，帶你前往你不願意去的地方……」（若廿-18）

因為再一次的，那一位引領著他來到了一個他原本不願意去的地方，就如他人生中一直發生過的那樣。當本篤十六世於2005年4月20日清晨首次以教宗身分舉行彌撒時，他還深切地對他的前任表示緬懷。在樞機們選舉他為教宗後，他解釋說，當時的自己突然感覺到：「我彷彿看到了他含笑的雙眸，聽到他的聲音正在對我說，『不要害怕』。」一隻強大的手牽著他的手，帶領著他前去完成若望保祿二世未盡的事：促使教會根據基督的教導和榜樣，「滿懷喜悅回顧過往，毫無畏懼朝向未來」。

五天後，在首次接見因他的當選而前來羅馬的德國朝聖團時，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態度更為明確，他選用一個寓意深長的比喻來予以說明：「當選舉結果慢慢呈現出傾向於我的趨勢，就像所謂的劍刀要降落到我的頭上時，我開始頭暈目眩。我原本以為我已經完成畢生的工作，如今可以期待過一段平靜的日子了。我對此深信不疑，並向天主祈禱：不要選擇我。祢有更年輕、更合適的人選，他們有十足的幹勁和充沛的精力來承擔這個重要的任務。

此時，一封來自樞機團裡某位樞機弟兄的短箋，深

深觸動了我。他提醒我說，在我為若望保祿二世主持追思彌撒時，我在講道中曾引用福音書中的一段：主在加里肋亞海邊曾對伯多祿說：『跟隨我！』，並以此出發描述卡羅爾·沃伊蒂瓦如何一再服從天主的召叫，如何摒棄自己的願望並回答：『我跟隨祢，即便祢要把我引向我本不願意去的地方。』這位樞機弟兄接著寫道：如果現在天主跟你說，『跟隨我』，那麼你要記得，你在講道中是怎麼說的。不要拒絕！順從祂，如你口中那位已經辭世的偉大教宗所做的那樣。這番話深深打動了我的心。天主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被創造也不是為了過得舒適愜意，而是為了至高、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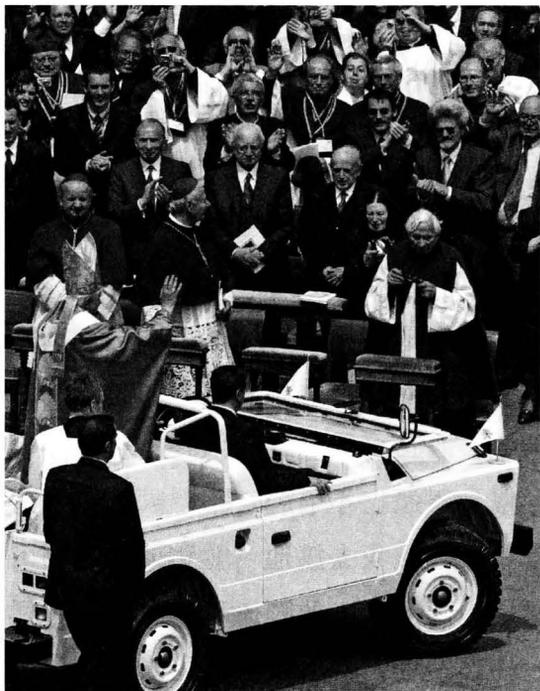
不久後，雷根斯堡的穆勒主教（Gerhard Ludwig Müller）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同他一道去參加弟弟的就職典禮。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請。因此，我有幸作為雷根斯堡代表團的一員，同主教一同前往機場，飛往羅馬。

在羅馬，我住在弟弟先前的樞機住所裡，因為他要同其他樞機一道下榻於梵蒂岡的招待所「聖瑪爾大之家」。這也是出於安全考量——他必須受到嚴密保護。弟弟的樞機住所正對著宗座大樓，不過它不屬於梵蒂岡國。它坐落於良教宗城廣場。第二天清晨我去接他，並和他一起回到住所。房子前面早已是人山人海，他剛一現身，人群中便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他簡短地向群眾致意，隨後我們便進

屋了。

他身上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嗎？他還是老樣子，還是能從他身上感受到聖神在運作，感受到許多人希望從他身上看到的神恩？

他當然還是老樣子，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聖神發生作用只限於他盡教宗職務的時候，他的為人處事並未因此產生變化。他從不強迫自己去改變什麼，也從不嘗試偽裝。



2005年4月24日，喬治·拉辛格在教宗弟弟的就職典禮上。

他始終保持著本色，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樣刻意扮演某個角色或戴上面具。彼得·澤瓦爾稱弟弟是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神恩教宗」，對此我必須強調，他肯定不是有意這樣展現的。也許這真的是聖神在工作，讓他在公開露面時身上散發出神恩的光彩。他一直和從前一樣，和善、友好而又謙遜，毫不做作，真摯熱心。他向來都是如此！

他有跟您透露過為什麼會選擇本篤作為教宗名號嗎？這是為了紀念偉大的本篤會建立者以及西方修會的創始人努西亞的聖本篤（480-547年），還是為了向才智教宗本篤十四世（1740-58年）或和平教宗本篤十五世（1914-22年）致敬？

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不過有一次聊天時我們曾談到教宗名號，當時他說，本篤真是一個美麗的名字。我們談論這個話題時只是隨意聊聊而已，並未涉及他本人。那時候的他就覺得，本篤無論聽起來，還是從意義層面上看來，都是一個美好的名字，很適合做教宗的名號。本篤的原意是受到祝福的人（從拉丁語的**benedicere**而來，意思為祝福），同時也意味著能給別人帶來祝福。弟弟當然很崇敬聖本篤。至於後面的兩位本篤，他當然知道他們都是偉大的教宗，不過從未跟我談起他們。我猜測，他的教宗名號極有可能是在向努西亞的聖本篤致敬，不過除此之外還

有美學和語源學層面上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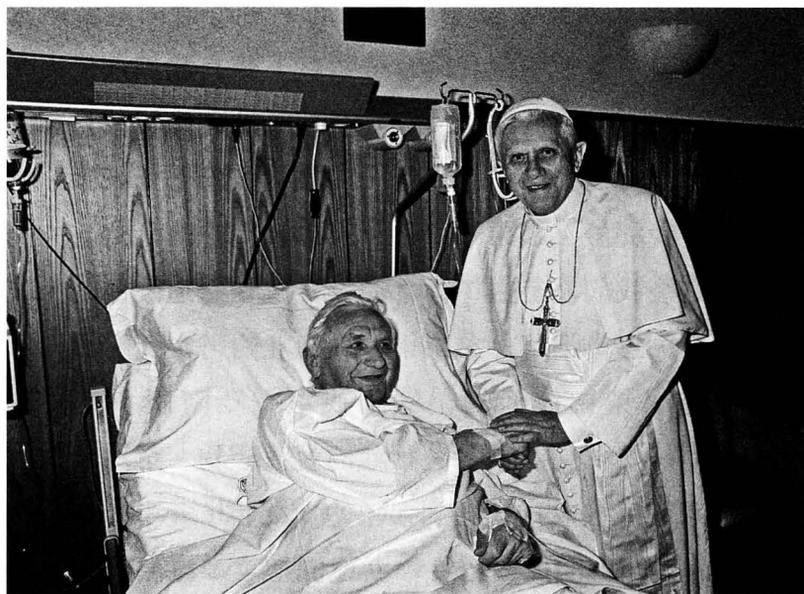
若瑟·拉辛格當選為教宗之後，梵蒂岡為他的兄長在宗座大樓的招待所準備了一間獨立房間。到了夏季，喬治則和弟弟一起住在教宗位於岡道爾夫堡的夏季行宮裡。

2005年夏我第二次去探望弟弟時，著實給他帶來了一場虛驚。那是8月3日的下午，我正在聽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突然間，我感到一陣天旋地轉。我昏了過去，不過不久後便又恢復了意識。吃晚飯的時候，同樣的情況再次發生，這讓弟弟以及同我們共進晚餐的人擔心不已。弟弟請求他的私人醫生布佐內蒂（Renato Buzzonetti）博士為我做身體檢查。診斷後，醫生立刻把我送去了羅馬的格美利醫院，為我植入了心律調節器。當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時，有人突然告訴我：「教宗來探望您了！」這個消息彷彿在醫院的員工中間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不論是護士還是醫生全都興奮不已。不少人甚至在說，現在他們自己也需要接受一個心臟手術了！

弟弟乘坐直升機從岡道爾夫堡來到羅馬，羅馬的行政機構更喜歡他以這種方式出行——如果他乘車的話，羅馬的交通會因為要給教宗採取安全保護措施而受到極大的干擾。對於弟弟能夠過來探望我，我十分高興，不過，身為教宗的他當然不可能隻身前來。陪同他一道的還有教

宗寓所總管哈威總主教，以及弟弟的祕書甘斯魏（Georg Gänswein）。他們一行人的到來，讓這場醫院探病變成了一個盛大的事件。不過，在電視台聞訊蜂擁而至之前，我們還是有機會單獨相處了近一刻鐘的時間。

2005年10月22日，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團前往羅馬演出。合唱團團員對於能夠在西斯汀教堂裡舉辦音樂會感到興高采烈，的確再難找到比這更為卓越、更為鼓舞人心的演出地點了。此外，西斯汀教堂的音效也很出色。空氣中瀰漫著緊張激動的氣氛，每個人都盡力發揮出自己的最高水準。這場來自家鄉的訪問，也讓我的教宗弟弟喜出



2005年8月5日，教宗前往格美利醫院探望兄長喬治。

望外。

一年後，2006年9月，教宗本篤十六世回到了他的故鄉巴伐利亞。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次返回家鄉。通常喬治·拉辛格都不會陪伴教宗出訪，不過這一次，他堅持要陪伴著弟弟前往他們童年時代最為重要的聖地。

弟弟來訪阿爾多廷時，我立刻從雷根斯堡出發趕了過去。我在那裡的嘉布遣會修道院留宿。在教宗舉行彌撒之前，我遇到了弗蘭茲·穆斯納（Franz Mußner，生於1916年）教授，他曾在雷根斯堡講授新約釋經學，如今則是主教座堂的神父回到了家鄉帕紹生活。當時他剛剛慶祝完九十歲大壽。當他看到我時，告訴我，僅有我們兩個是允許拿拐杖的人。出於安全原因，其他的訪客均被禁止拿拐杖。隨後舉行的彌撒盛大莊嚴，在場的人都十分感動。吃午飯時，我終於又跟弟弟坐在一起。我們吃的是烤豬肉配麵包。之後我們沒有去午休，而是一起在修道院內的大花園裡散步，邊走邊聊。弟弟十分高興能夠再次回歸故里。

當時，弟弟把他的主教權戒奉獻給阿爾多廷的聖母，這是姊姊瑪利亞和我送給他的晉牧禮物。這些年來我一直珍藏著這枚戒指，直到弟弟的女祕書——申斯塔特團體（Schönstatt）的比爾吉特修女建議把它奉獻給阿爾多廷的聖母瑪利亞。她向我徵詢意見。「我當然十分樂意，」

我回答說，「如果我過世了，這戒指就會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但若在那裡，它將覓得一個安全的歸宿。處在聖母的庇佑之下，得到最好的保護。」我為這項提議感到高興，並從內心贊同這麼做。於是我把權戒帶到了阿爾多廷，弟弟將它獻給恩慈小教堂。

從阿爾多廷出發，我們先去了馬克特爾，參觀了他當年領洗的聖奧斯瓦爾德教堂。我們站在教堂的聖洗池前靜靜地祈禱。七十九年前，他在這兒領洗進入了神聖教會的大家庭。參觀完畢後，我搭乘他的直升機飛回雷根斯堡，整個旅程中，我們一直面對面的坐著。

雷根斯堡的歡迎會氣氛極其熱烈。我們在那裡的神學院過夜，我的房間就在弟弟下榻的房間旁邊，因為我們想第二天一早一起主持清晨彌撒。隨後，我們出發前往伊斯靈（Isling）場地參加盛大莊嚴的教宗彌撒。下午時分，他先是在大學的大禮堂裡發表演說，隨後主持了一場晚禱。然後，9月13日這一天，終於來到了。我們已經期盼這一天許久了。在訂教宗訪德行程時，弟弟特意請求工作人員為他騰出一天的私人時間。一整天他都陪在我的身邊。這一天，只有早上十一點鐘安排了一場唯一的公開活動——祝聖「老教堂」的管風琴。不過這項工作原本就一直讓我牽腸掛肚，因而也可以算作我的私人願望。

我們從留宿的神學院出發，原本可以直接穿過黑熊大街抵達「老教堂」，不過他想在我的房子裡先放下一些東

西。於是我們先去了我的住所在的露岑街，再從那兒繞道前往教堂。有人之前告訴我們應該從教堂最近的一個門進去，不過「老教堂」的神父們已在北側等候著我們，所以我們先去了北側。在那裡，我們受到了極為熱情的接待，隨後準時去為管風琴祝聖。儀式結束後，我們返回我的住處。在回程的路上，我們還遇到了當時的猶太團體領袖漢斯·羅森格爾德先生——很不幸他如今已經去世了。弟弟對他的熱情好客表示感謝，他曾邀請教宗的全體隨員共進午餐。

我們先坐在房子的陽台上喝了一杯開胃酒，隨後去樓下吃午飯。和我們共進午餐的還有主教以及弟弟的祕書甘斯魏蒙席等一行人。我的管家海恩德女士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午餐。不過，差點無法送到我們這裡。海恩德女士就住在我的房子對面的國王街上，她在家中為我們做好了飯菜，因為她覺得，這是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她只需要像平日常做的那樣，很快把飯菜給我們端過來就可以了。然而在那一天，我們這條街被封鎖了，警察拒絕給她放行。脾氣一向很好的海恩德女士也不由勃然大怒。「鍋裡放的不是炸彈，而是給教宗準備的湯！如果您不給我放行，他就要挨餓了！」她據理力爭。警察們陷入了一片尷尬，他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她。不過他們沒有把她推向一邊，而是跟著她一同走進我的房子內，來到了廚房。在這裡，他們看到她所言非虛——她在這裡就跟在自己家裡一樣。最

後，她為我們準備午餐：前菜是一道椒鹽卷餅湯，主菜是洋蔥煎牛肉配雞蛋麵疙瘩，甜點則是鳳梨奶油布丁。所有的飯菜都十分美味可口。

午間小憩了一會兒之後，我們驅車趕往潘特靈，去齊格斯多夫墓地祭拜父母。主教和弟弟的祕書也陪在我們左右。在潘特靈已經聚集起了大批的信友，其中也有霍夫鮑爾夫婦，他們是很熱心的人，一直盡心盡力地替我們照管房子。最後，我們待在自己的房子裡共進晚餐。在返回神學院之前，弟弟還上床躺了一會兒，一天下來他很是疲憊，頭也很疼。不過他很享受這一天的生活。所有的一切



教宗本篤十六世感謝兄長喬治的女管家海恩德女士，為他們準備了美味可口的午餐。

都跟過去幾乎一模一樣。他很喜愛潘特靈的這棟小房子，在這裡他才會找到回家的感覺，要知道即便是世界上最華美的宮殿，也未必能夠提供這樣一棟家居小屋所擁有的一切。他這次回鄉訪問，首先當然是一趟牧靈之旅，不過這也意味著他在同自己的過去道別。

從此以後，他每週都會給我打好幾通電話，而我從來不打給他。這主要是因為，通過電話找到我要簡單得多——我幾乎天天都待在家裡，也沒有那麼滿的行程。而他則相反，總是有一連串的邀約，或者有其他的事情要處理，我根本不敢去打攪他。於是，他一騰出時間就會打電話給我，我則是等著他打過來。

我一年中會去探望他好幾次。聖誕節的時候，我當然會去羅馬，不過要等到12月28日，這時，正式的教會聖誕節日實際上已經過去了。我在羅馬會一直待到1月10日，期間，我可以和弟弟一同慶祝主顯節。這個節日在義大利比德國隆重多了，不同的是義大利人在這一天互贈分發禮物。第二次拜訪他的時間則選在早春，四月和六月之間的某個時間。2009年，我在聖神降臨節的時候前往羅馬，適逢科隆市內管弦樂團在伯多祿大教堂那天彌撒中演奏海頓的《和諧彌撒曲》。當時，他們的指揮也邀請我前去欣賞。我當然不會錯過這樣一個大好機會。然後，我會在八月再到弟弟那裡，這個月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同他一起在岡道爾夫堡的夏季行宮中度過。最後，我還常常在十月、

十一月的時候前去羅馬，因為我在這一時間內常會接到盛大的音樂演出的邀請。例如2007年的10月，就是這樣的情況。當時，巴伐利亞廣播電台的交響樂團和合唱團以及他們的首席指揮楊森斯在保祿六世接見大廳裡表演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

在演出之前，我就已經跟楊森斯先生做過幾次電話交談，因為弟弟還希望他們演唱文藝復興時期的作曲家帕萊斯特里納（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約1525-1594年）的作品《你是伯多祿彌撒曲》。楊森斯先生最初不願意這麼做，雖然他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家。至於其中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他想安排表演的是莫札特的《聖體頌》，不過，任何一個教堂合唱團都會演唱這首曲子，由廣播電台的交響樂團和合唱團來演唱，未免有些大材小用。最後，楊森斯先生妥協了。那是一場美妙的演出。在他們當中有幾位前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團的團員，能與他們再次相逢，我的心情不勝歡喜。

那您都如何稱呼他呢？

當然是叫他若瑟了。其他的稱呼未免也太奇怪了！

媒體對他的許多攻擊，是否讓他很痛苦？

他本身確實是一個敏感的人，不過他也知道這些攻擊來自何方，是出於什麼目的，背後又隱藏著什麼。這樣一來，他就能比較容易克服和擺脫這些非議。不過大多數情況下，無論他走到哪裡，他都很受歡迎。

能向我們透露他的最大願望嗎？

我無法一下子說出他的某個具體願望。他希望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實行自己的使命。聖神在天上給予恩寵，而他則需要實行他身上所承擔的部分。

在您的眼中，他的宗座時代的工作重點是什麼？

工作重點總是取決於他所要應對的具體情勢，至於主動規劃工作重點，更多情況是他需要根據當前形勢來決定應該做何種反應。不過，他很重視聖事禮儀，他希望教會的禮儀能隆重而完美地舉行。這確實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我們的教區音樂校長不久前也提到，如今要找到一座教堂的神父完全按照教會規定舉行彌撒的，簡直難如登天。許多神父認為，他們應該在這裡添加點什麼，在那裡改變點什麼。因此弟弟很希望能看到有規範而準確的聖事禮儀，它能觸及人的內心深處，能讓信眾體驗到天主的召喚。

您認為若望保祿二世的宗座時代跟本篤十六世的宗座時代是一脈相承的，還是您的弟弟安排了新的工作重點？

首先我必須糾正一點：一般而言，宗座時代的工作重點不是由教宗的個人意志所決定的，而是對時代事件所作的反應和回答。當然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事件有一定的延續性，這期間並沒有大的跳躍或斷層，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這幾十年來一直持續出現的問題。

毫無疑問的是，若望保祿二世曾在許多方面受過弟弟的啟發，他同弟弟保持著深入的交往，總是很重視弟弟的判斷。從這一層面來講，兩個宗座時代的確有許多的相似之處，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正常情況下教宗一天的行程是怎樣的呢？

嗯，我不知道哪些是需要保密的，不過我想，我應該可以講。早上七點鐘，他會在私人小堂裡舉行彌撒，之後默想一會兒，接著會作每日祈禱，一直到八點鐘。如果我去拜訪他的話，我們會一起照上面這些步驟進行。隨後我們就在這時道別，各自回各自的房間。

接下來他會去準備當天要處理的各項事務，比方說，他在當天要私下會見來訪者的話，他會先弄清楚：他們是誰，來此有什麼要求和願望？這些他都需要事先做好

準備的工作，而會見結束後，他也需要再做歸納總結。

週二的時候，他會為週三上午的公開接見做充分的準備。屆時他需要向朝聖者和朝聖團體致意，因此他得提前練習一下這些外語問候話的發音——他當然不可能掌握每一種外語。他從錄音帶中聽取正確的發音，然後模仿著讀出來，以便接見群眾時能讓他們清楚地理解，避免犯下重大的錯誤。

在工作日，他會在下午一點十五分吃午餐，主日則提早至一點鐘。之後，他會在教廷宗座大樓的屋頂花園中散步一會兒，因為有句俗話說：「吃過飯後最好小憩一會兒，或走上一千步」。接下來是午休時間，不過他並不是把這一整段時間都用來休息，而是用來寫信和寫明信片，或者閱讀各種文件。我的印象是，他會利用午休的一部分時間來處理工作。

夏天時，我們會在四點作每日祈禱。到了晚上七點，他會在梵蒂岡花園裡，或在岡道爾夫堡的花園中散步。散步時，他會跟他的祕書甘斯魏蒙席一起誦念玫瑰經。到了冬天，由於天黑得早，他就把晚間的散步改到四點。到了六點則是例行接見。

上午多是私人接見，主要接待的是外地來的主教以及各國首長；到了下午，他則要舉行例行接見，教廷的各個聖部部長會來向他彙報工作進展，提出建議並等待教宗做最終的決定。

七點半是晚餐時間。八點他會看電視新聞。到了八點半，他會再去屋頂花園上散散步，冬天的時候，散步地點則改在宗座大樓的走廊。接下來他作晚禱，也就是教會的夜禱，以此結束一天的工作。我在的時候，我們還會坐在客廳裡聊一下。

您和他也一起看電視嗎？教宗有什麼特別喜愛的電視節目？

嗯，那些日子裡，我記得在播報新聞之前，會先放一部電視劇《國王指揮官》。我們總是一起觀看這部電視劇，因為我們都很喜歡狗。我們跟裡面扮演狼犬國王主人的男主角布勞斯曼（Helmut Brossmann）很熟稔。他也居住在雷根斯堡附近。他是卡斯特魯特雀鳥合唱團兼奧古斯堡木偶戲劇團的經理。布勞斯曼還曾為我們的主教座堂合唱團組織過演出事宜。他來自蘇台德地區，在幾年前皈依了天主教。「老教堂」裡的一位神父給他講授教理，我則是他的堅振代父。他極其熱愛動物，電視劇裡扮演國王的兩隻狼犬就是他豢養的。除了狼犬之外，他還擁有一個巨大的動物飼養場，此外還是聖伯納修道院聖伯納犬飼養業的共同投資人。弟弟其實不怎麼看電視，頂多看看電影錄影，電影內容大多同梵蒂岡或即將舉行的封聖、宣福儀式有關。

據說自從您的視力下降以後，他會在每日祈禱時為您朗讀禱文，您則會為他彈奏歌曲……

是這樣的。他會為我朗讀每日祈禱的禱文，這包括在清晨彌撒之後的早禱以及下午的晚禱和晚間的夜禱。我已經無法獨自一人進行每日祈禱了。晚上睡覺之前，他有時會請求我為他彈奏一曲。我坐在鋼琴前，為他彈奏一首教會歌曲或民歌，比如《在美麗的山谷草地上》。有時我也會選擇演奏催眠曲，如《月亮升起來了》或者《再見，晚安》，這都是些很簡單的曲子。在將臨節和聖誕節期間，我則會彈奏應景的聖誕歌曲。

他平常都很早就上床休息嗎？

是的，晚飯後他通常就不再工作了，從前也是如此。他總是全神貫注地在白天工作，速度很快，效率也很高。但他完全不適合夜間工作。

對您來說，成為「教宗的兄長」代表什麼？

就我個人而言，這並沒有帶來特別大的改變，要說改變也多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當然了，突然之間許多人開始對我產生興趣，而在此之前，我在他們眼中是微不足

道的。我會接到許多電話，也有電視媒體或其他傳媒的電話。許多人會前來拜訪我，我還接觸到許多以前不可能接觸到的人。最開始這給我的生活帶來了困擾，不過幸好現今已經慢慢平靜下來了。

除此之外，坦白說，弟弟和我的關係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只是在祈禱中，我會向好天主傾訴一些跟從前完全不一樣的關注。但我們私下的關係一如往昔。



後記
晉鐸六十週年
2011年

2011年6月29日，教宗與他的兄長共同慶祝了他們的「晉鐸鑽石紀念日」。六十年前的1951年6月29日，他們在弗萊辛的主教座堂被祝聖為神父。為了出席慶祝活動，喬治·拉辛格蒙席提前兩天啟程飛往羅馬。除了在本篤十六世的私人小堂裡舉行私人彌撒之外，他還出席了聖伯多祿大教堂九點半開始慶祝的「聖伯多祿與聖保祿瞻禮」教宗大禮彌撒。雖然長達三個小時的儀式主要是為了授予來自四大洲廿四個國家的四十位新任首都總主教羊毛披肩，本篤十六世在當天的講道中仍然回憶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對他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而稱你們為朋友（若十五15）……在我晉鐸六十週年的日子裡，耶穌的這句話又一次在我的心中迴響。當時，在晉鐸大典結束之時，我們白髮蒼蒼的福爾哈貝爾樞機，以他沙啞但又堅定的聲音把耶穌的這句話贈送給了我們這些新晉司鐸。按照當時的教會禮儀制度，這聲呼喚代表著新晉司鐸被明確授予了赦罪的全權……那時，我知道也感覺到，這不僅僅只是一句禮儀上的話，也不僅僅只是引用一句聖經經文。我知道：在那一刻，天主自己在說話，祂在親自與我進行對話。在洗禮和堅振禮中，天主把我們接納到祂的身邊，讓我們進入了教會的大家庭。然而現在所發生的一切，又比那時更進了一步。天主稱我為朋友，接納我進入了最後晚餐時聽祂說話的那群人的圈子。這個圈子裡的人是祂以特殊方式結識

的，而他們也是以特殊的方式認識祂的。」

在喬治·拉辛格即將飛往羅馬之時，我請求他回顧與總結一下他自己的神父生涯以及他的弟弟不同尋常的人生道路。以下要探討的問題是，在我們今天的時代，晉鐸究竟代表什麼。

主教座堂合唱團指揮先生，回顧這整整六十年的時光，平心而論，您當初選擇晉鐸的決定是正確的嗎？追隨天主的聖召值得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除此之外我根本想像不出我的人生道路還能怎麼走。從童年時代開始，這就是我追求的目標，我從未迷失過這一目標。對我弟弟來說亦是如此。雖然有時候生活的變化跟我們的計畫會有所出入，不過，這一方向從最初一刻起就是清晰無比的。我們選擇踏上這條人生道路，並且願意為此做任何犧牲。直到今天，我要說：我從內心深處深深地感謝天主，感謝祂賜予我力量，讓我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了下來。我能感受到祂的引領和安排。每個人的人生道路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不過如果擁有一個美好而可實現的目標，如果感受到天主的親近，並始終如一地堅持這條通向祂的道路的話，那麼大家都會發自內心地呼喊：感謝天主！

神父得到的要比付出的多嗎？

我認為確實是這樣，可以這麼說。

當我在厄瑪努耳團體，在阿爾多廷的「厄瑪努耳」傳教學校主持一個研討會時，我讀到了那些對傳教抱以極大熱情的年輕人的標語：「奉獻所有，收穫更多。」我特別喜歡這句話。對於神父職位來說，這句話也同樣成立嗎？

是的，這毫無疑問是成立的。特別是當神父進行牧靈工作時，當他實實在在地投身於服務人類的工作當中而無怨無悔時，他就會得到豐厚的回饋。

很遺憾在 B 地有一位神父，他曾經公開宣稱：「我可不想做無謂的付出！」這句話出自一名神父之口，實在荒唐可笑，因為這樣想的人當初根本就不應該選擇晉鐸。當一位神父真心真意地投入牧靈工作中，當他認為自己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期待著尋找基督的人，即便他知道自己作為基督直接的中介不過是一名軟弱的神父，他依舊會獲益良多——甚至包括那些他壓根兒從未想到過的回報。我在這裡指的並不僅僅是來自他與之直接交往的那些人的感激之情，也指出來自完全不同方向的回報。這時候他才會感覺到，能成為神父實在是一個祝福。誰若成為他人的祝福，他就會從天主那裡收到成千上萬倍的回報，能夠實

實在地獲得祝福。從這一層面來說，能夠成為神父服事天主，的確是一個崇高的理想。

在您的整個的神父生涯中，最美好的時刻是什麼？

這個問題實際上很難回答。我一直將我在音樂方面的工作視為一種牧靈工作，因為我們希望透過歌聲——即便它只是聖事禮儀演唱中小小的曲目，來向世人傳達天主的偉大。包括那些不會讓我們偏離天主的世俗曲目，也是在向世人傳遞祂創世的美好。

不過若您要問我在神父生活中體驗過最美好的時刻的話，我必須得說，它都是慶祝盛大彌撒的時刻。我們以美妙的音樂協助彌撒的進行：在美麗的教堂裡，在祈禱的人群中，他們虔誠地保持靜默，而這安靜不是人為製造的，不是通過命令來的，而是完全自發的，是從祈禱中引發出來的。這樣的彌撒同時豐富了信友的感官：視覺、聽覺以及乳香激發的嗅覺——乳香因此也在彌撒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世俗音樂會固然也很賞心悅目，但它們無法以這種形式與深度給予信友如此幸福的時刻！盛大彌撒所帶來的振奮、滿足與安詳，讓人置身於天堂。對此我深信不疑。

您認為音樂是一種較微妙的祈禱嗎？

我想是這樣的！人類的祈禱，無論是大聲祈禱、共同祈禱還是安靜的私人祈禱，都會在某處遇到它們的局限。與此相反，演唱出來的、以音樂方式表達出來的讚美詩則能從整體上引人入勝。音樂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幅度，誦念的、思考的和默念的祈禱，都無法達到這個深度。

音樂也是一條通向天主的路嗎？

當然是。它當然也可以是一條背離天主的路，比如希特勒時代的行軍歌曲或者世俗娛樂公司提供的靡靡之音，它們只會造勢與煽情。音樂也可能是魔鬼的工具，不過，它同樣也可以是天主的工具。

讓我們再回到您的教宗弟弟身上。在與您的談話中，我們一步步回顧了他從鄉村警察之子直至當選為大公教會的首牧這樣一條獨一無二的人生道路。現在到了做總結的時刻了。您對此有何看法？在本篤十六世的人生中，是否有一條紅線一直在指引著他，還是他最後當選為教宗純屬偶然？

如果只從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話，他的當選當然是偶然的。不過若以基督徒的身分來審視他的一生，世人就會意識到，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它目標明確地引領著弟

弟走向所安排的目的——不是他本人的目的！請您再回顧一下他的整個人生道路，它一直呈直線型上升：從輔祭到神學系學生，到副本堂神父，到講師，到教授，到主教，再到部長……這一路是一步一個台階走上去的，每一步都有其意義所在。他在不斷地向前，每一次都有所提升。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如此，他從沒有刻意地追求提拔和擢升。總是有人在引領著他邁出每一步，他只是以認真實行義務的態度不斷付出。為了實行交託給他的使命，他一直努力不懈。

教會中有許多雄心勃勃的神父，他們立志要作出一番大事業。他也雄心勃勃嗎？

他本人根本不是雄心勃勃的人，他確實不是這樣的人！不過，他一向很盡職，總是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人民賦予他的重任。與此同時，他總是質疑自己，一再反省到底有沒有真得以最好的方式達成民眾對他的期待？是否做好己力所能及範圍的一切，有沒有辜負別人對他的信任？

他有一點點猜想到自己會當選教宗嗎？

沒有，這絕對出乎他所料。漢斯昆曾說過他一直對教會體制內的高位孜孜以求，這純屬無稽之談。我對他太了

解了。過去他一直堅信自己在講授神學課上有特殊天賦，在正確思考和實踐信仰上身負恩寵。他也因此認為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很好的教師。而這也正是他追求的目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他認為這是他的使命。他從來都不在乎那些外在的光環和榮譽，它們反而讓他感到無所適從。

他只想盡心服事天主，如他教宗牧徽上所選的座右銘「真理的合作者」一樣，只想好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正是如此。這個結論完全正確。

所以其他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到來的？

是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也認識一些神父，他們竭盡全力追求頭銜與榮譽，不過這並非弟弟的風格。他最看重的是做事。他只是想竭盡全力、盡可能好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務。為此，他在人生的道路上發展出一定的才能，並將在未來的某天向天主述職。

在他的就職典禮上，他就自稱為「天主葡萄園中的一名普通工人」，這誠實地道出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當民眾見到他時，就會感覺到，他是那麼的謙虛純樸。大家的印象是，他總是小心翼翼地處理問題，總是先觀察一

下四周民眾對他的反應。掌聲、榮譽、禮物以及歡呼的人群，所有這一切乍看上去讓他感到很不舒服……

這是因為他對個人和職位之間的界定有著清醒的認知，並且知道自己的局限。他當然很清楚，所有的一切並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因為他是那位更高者的代言人，他是教宗。他知道如何區分二者。身為教宗，他會帶著開放的心態去接納這一切，作為個人他則不願意接受。

您想為他的未來獻上怎樣的祝福？

我衷心地希望弟弟能夠免受疾病的困擾，能夠毫無阻礙地、完美地完成他作為聖伯多祿繼承人的使命。我也祝福他某一天在「天上」——在我們都要接受天主考驗的地方，在那位天上的考官面前，通過最後的考驗，一切都有完滿的結局。不過我早已對此深信不疑。

畢竟在他整个人生中，他總是先詢問天主的意願是什麼，之後再全心全力地去實現，不論天主將他引向何方。

鳴謝

這是為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生平做重要見證的訪談錄。我要向所有促成本書問世的朋友表達深深的謝意。

首先我要誠摯感謝喬治·拉辛格蒙席。從我們首次會面到出版這本書的九個月裡，我屢屢從他身上學習到謙遜、和藹及敦厚，對他十分欣賞及佩服。每一次與他會面，我都視為天賜的禮物。我也要向教宗的私人祕書甘斯魏蒙席致謝，感謝他迅速瀏覽我的手稿並提供寶貴的意見。

如果沒有「德國忠於聖座」協會理事長羅絲維塔·比爾薩科的協助，本書的出版計畫也不可能實現。她全程陪我進行訪談，並將採訪內容整理為書面文稿，我要特別感謝她！我還有感謝Sabine Beschmann女士，她在德國天主教會舉步維艱的時刻，創立了「德國忠於聖座」協會，成為忠於羅馬聖座天主教徒的傳聲筒和行動聯盟。

我還要特別感謝雷根斯堡的穆勒主教，他是我們的大家長。2011年6月18日，為慶祝教宗晉鐸六十年鑽石慶，在弗萊辛舉辦了一場慶祝研討會。在此我也要向研討會的工作人員，特別是「教宗本篤十六世研究所」Rudolf Voderholzer教授呈上我的感謝。我還要感謝Fürstin Gloria von Thurn und Taxis，感謝她在訪談的第一天為我們製造輕鬆的氣氛。我還要向我在羅馬的朋友致謝：Louis Thevalakara、Arturo Mari、Francesco sforza和《羅馬觀察報》攝影部門的

工作人員，以及我的同事Paul Badde、Guido Horst、Michaela Koller、Benjamin Greschner、Roland Noé和彼德·席瓦德。

在整理本書的圖片資料時，魯伯特·貝格教授、特勞斯坦市檔案館的館員Franz Haselbeck、慕尼黑總教區檔案館的Guido Treffler、里姆斯廷的地方史學者兼教宗傳記作者若望·努斯保穆、馬克特爾教宗故居的工作人員，以及鄉土研究者兼教會音樂家Kathi Stimmer-Salzeder給予我諸多幫助。此外，我還要感謝管理阿紹教宗故居的Irmgard Huber和Peter Huber，謝謝他們熱情的招待。雷根斯堡的Kalweit也為本書提出不少寶貴建議，「教宗畫家」Walter Andreas Angerer J.曾與我在特勞斯坦會面並給了我諸多啟發，在此一併致謝。

我還要特別向喬治·拉辛格蒙席的女管家海恩德女士致謝，感謝她的熱情招待與真摯熱心。我也代我家的狗兒露西向她道謝，露西對她的廚房一直戀戀不捨。

我還要感謝我的未婚妻尤莉亞，我在巴伐利亞工作的數週，她一直很惦念我，感謝她對我的真情，以及為我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當然也不能漏掉我的母親麗娜特·黑澤曼（Renate Hesemann）、對媒體瞭若指掌的姑姑Angelika Puls、另一位姑姑Ursula Niedermeier和她的女兒Christa Becker，以及她富有創造力的外孫Christian Becker。

最後我還要深深感謝出版商Brigitte Fleissner-Mikorey女士，感謝她對本書的興趣、投入與信賴，感謝她全

力配合本書的出版。我還要感謝我的編輯Iris Forster和AnjaVolkmer，感謝她們出色的宣傳工作，以及Herbig出版社的整個團隊。

還有許多人給予本書不少貢獻，我同樣要向他們表達誠摯的感謝，在此無法一一列名，敬請見諒！

由衷希望本書能夠幫助更多人，發現天主在他們身上的美好計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我的教宗弟弟 / 喬治·拉辛格 (Georg Ratzinger)
口述；米歇爾·黑澤曼 (Michael Hesemann) 編著；
鄒麗譯 -- 初版 -- 臺北市；上智文化，2013.03
面；公分 -- (見證、聖賢傳記；L0012)

譯白：Georg Ratzinger. Mein Bruder, der Papst

ISBN 978-986-6036-08-8 (平裝)

1. 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 1927-)
2. 天主教
3. 教宗傳記

見證、聖賢傳記 L0012

我的教宗弟弟

| | |
|----|----------------------------|
| 口述 | 喬治·拉辛格 (Georg Ratzinger) |
| 編著 | 米歇爾·黑澤曼 (Michael Hesemann) |
| 譯者 | 鄒麗 |
| 校訂 | 房志榮 |

| | |
|-----|--|
| 准印者 | 洪山川總主教 |
| 發行者 | 鄧秀霞 |
| 出版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00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電話：(02) 2901-7342 傳真：(02) 2902-7212 讀者服務e-mail: wisdompress@pauline.org.tw |

| | |
|------|---|
| 服務處 | 聖保祿孝女會 242新北市新莊區三泰路66號 |
| 台北書局 | 郵撥：上智文化事業 19399740 100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電話：(02) 2371-0447 傳真：(02) 2371-7863 訂購服務e-mail: stpaul@pauline.org.tw |
| 台中書局 | 郵撥：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 21999096 400台中市光復路136號 電話 傳真：(04) 2220-4729 |
| 高雄書局 | 郵撥：高雄聖保祿文物中心 42006873 802高雄市五福三路149-1號 電話 傳真：(07) 261-2860 |
| 香港書局 | 聖保祿書局 www.paulineshk.org e-mail: stpaulhkshatin@gmail.com 電話：(852) 9127-9624 傳真：(852) 2601-6910 |
| 澳門書局 | 澳門聖保祿書局 e-mail: Paulinas@macau.ctm.net 澳門主教巷11號 電話：(853) 2832-3957 |

| | |
|----|---|
| 印刷 | 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246-9928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9號3樓 |
|----|---|

| | |
|------------|---|
| 基督教 總經銷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 235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36號3樓 電話：(02) 8228-1318 傳真：(02) 2221-9445 |
|------------|---|

| | |
|-----|--|
| 總經銷 | 寶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02) 8227-5988 傳真：(02) 8227-5989 |
|-----|--|

2013年3月初版

定價：4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認識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第一手傳記， 收錄48張彩色與黑白珍貴照片！

教宗本篤十六世是當今最優秀的神學家，追尋真理，為人正直，做事一絲不苟，在就任教宗前，曾被冠上「總是說『不』的樞機主教」的雅號。本篤十六世公開承認自己年邁體弱而辭位，全為了讓教會青壯的聖伯多祿繼承人，好為天主帶領教會和服務天主子民。本篤十六世這項非比尋常的勇敢決定，對舉世立下了領導的典範：只求公益，不謀己利。本篤十六世致力於促進世界和平、關懷人類福祉、推動互助互愛等普世價值不遺餘力，寧作醒世光鹽，不媚流俗、不畏爭議，博得世人的愛戴及尊崇。

洪山川/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兼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教宗本篤十六世是卓越的神學家，他對天主真摯的愛，熱忱而無私地為基督的教會付出，令我由衷欽佩。

狄剛/前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從拉辛格兄弟的生平經歷回顧人類歷史，好像站在兩座不同的瞭望台上，觀察整個世界的變局。

房志榮/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授

Mod E

見證·聖賢傳記

L0012

NT\$ 400



上智文化事業

ISBN 978-961-6031-06-6

00400



9 789866 036088

Printed in Taiwan